MAR. 7.1957

新建设

学术性月刊

PLEASE RETURN TO
CHINESE SECTION
ORIENTALIA DIVISION
SOURCE UNKNOWN
MAR 11

2

1957

P
C403
H83
2nd set.

新建設　一九五七年　二月号(总第101期)

我国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計划的生产与消費 ……朱澄平（1）
論需要在生产發展中的作用 ……陶　容（7）
論工業專業公司的性質和作用 ……汪鴻鼎（12）

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革命精神 ……任訪秋（17）
批判梁漱溟的思想方法 ……張若达（23）

·專　　載·

中国哲学史講授提綱（初稿）（一）……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29）

·討　　論·

論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 ……关夢覚（42）
心理学的对象究竟是什么 ……章志光（47）
論美 ……高尔太（52）

一得之見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名称問題 ……王　瑤（58）
定息与对抗 ……澤　厚、亦　讓（59）

学术动态：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討論尙鉞主編的"中国历史綱要"一書（袁良义）……（61）

讀者意見：停止咬文嚼字的爭論（王雪松）……（41）

編后記 ……（51）

編輯者：新建設杂志編輯委員会　北京东單区小甜水井1号
出版者：光明日報社　北京石駙馬大街90号
总發行处：邮电部北京邮局
代訂代售处：全国各地邮局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排版印刷封面：光明日報印刷厂
印刷正文：北京市印刷二厂

預定价目
全年十二期　4.20元
半年六期　2.10元
三个月三期　1.05元
定費一律預收

上期本刊实际出版日期：1957年1月3日　印張：4　定价：（5）0.35元　本期印数：34,000

我国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計划的生产与消費

朱澄平

一 在發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仅仅是党和国家重要的經济政策，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目的。

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無論生产与消費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进行了大規模的建設，到1957年底，預計大約有五百个新建和改建的限額以上的工業建設單位可以建設成功。我国工業生产，在大規模工業建設和积極利用現有生产企業的条件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根据第一个五年計划規定，我国工業总产值1957年比1952年增加90.3%，而我国1956年便可达到这一水平，到1957年將有可能比原計划超額完成15%左右。生产資料工業的产值在过去三年中增加了91.8%，1956年較1955年还可能增長23%①。我国鋼的生产1952年仅135万吨，到1957年將达到550万吨，增加了三倍以上。由于国民經济各个部門發展速度的不同，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中国民經济部門結構便有了变化。預計到1957年，在工农業总产值中工業总产值（包括手工業）的比重將达到50%左右，而工業总产值中生产資料产值的比重將达到40%以上。我国經济建設所需要的机器設备，到1957年將有60%左右可以自給。我国国民經济新的部門結構已开始建立。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建立工業化初步基础的任务不仅可以完成，而且可以超額完成。

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中，不仅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且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也已超額完成了。

随着我国生产力發展与生产关系改变，我国人民的生活也有了初步改善。而我国农業、輕工業的發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則是居民生活改善的主要条件。这是因为农产品和輕工業产品是居民消費的物質来源，而居民收入則是居民消費的价值来源。

我国农業生产，在农業合作化与工業支援的条件下，也有了不少的發展。1956年全国粮食生产量，預計可以达到第一个五年計划規定的1957年的水平，即可以較1952年多生产570多亿斤粮食。1957年在主要粮食作物和某些經济作物方面都可以超額的完成第一个五年計划。

随着我国农業与重工業的發展，我国輕工業的發展也很快。我国工業消費品生产1955年較1952年增加了48.4%，1956年又較1955年增加17%②。1957年我国棉紗生产將达到560万件，較1952年多生产198万多件。

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中，居民的收入增加得也很快。职工平均工資1956年比1952年增加33.5%，农民的全部收入1957年預計有可能增長30%左右。

由此可見，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生产与消費是結合着的。我国生产的發展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成为推动我国生产發展和国家建設的力量。我国工業化事業与人民切身利益的一致，这是我国工業化事業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拥护和取得偉大成就的根源。

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中，从总的方面看，生产与消費的关系虽然配合得很好，但并不意味着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生产与消費的配合便不存在缺点和矛盾了，应該說在某些年份缺点和矛盾还是比較大的。正視这些缺点和矛盾，对于正确的了解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編制的方向和掌握其执行，都有現实的意义和理論的意义。古人說，“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

① 周恩来：“关于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的报告”。以下凡引自“八大”决議、报告和国家統計局：“关于1955年度国民經济計划执行結果的公报”的部分，均不一一注明出处，以省篇幅。

② 李富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議上的發言：“关于我国發展国民經济第一个五年計划的执行情况”。

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生产与消費配合中缺点的表現：（一）农業落后于工業：①我国1953年和1954年农業落后于工業是显著的。1953年工業总产值（不包括手工業）增長31.7%，农業只增長3.1%，粮食只增加2.1%；1954年工業总产值（不包括手工業）的增長是16.7%，农業只增加3.3%，粮食只增加1.6%。（二）輕工業落后于重工業的發展：突出的表現在1955年，重工業增加17.1%，而輕工業只增加1%，棉紗較1954年少生产63万件。（三）非生产建筑过于迟緩，居民住宅严重的感到不足。全国各工業部在1955年有53万人未分得住宅，已分得住宅的职工由于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实际居住面积也逐年下降。（四）消費落后于积累的增長：我国1952年积累在国民收入中只占15.7%，而在1956年便增加到22.8%，即較原来的比重增加45%以上。因此，1953年至1956年积累增加了106.5%，而消費只增加29.7%。（五）平均工資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1954年国营、合作社及公私合营企業劳动生产率增加了15%，职工貨幣平均工資只增加2.3%，实际平均工資只增加1.1%；1955年劳动生产率提高10%，貨幣平均工資只增加0.7%，实际平均工資只增加0.3%，一部分企業实际平均工資还有降低。

以上的材料說明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中，尤其是某些年份，存在着生产与消費的失調現象。这些現象所产生的后果，首先是在我国人口增殖速度快，每年达2%的条件下，职工在1954年及1955年便不能維持原有的生活水平。1953年粮食生产只及人口增長速度，1954年不及人口增長速度，棉布生产还有下降，这就决定了在这些年份人民在粮食和布匹的消費方面会下降。因此，它障碍着社会日益增長的需要得到滿足。其次是商品供不应求，消費品价格有一定的上漲，实际工資的增長速度慢于貨幣工資的增長速度，影响市場稳定。最后是农業生产落后，障碍輕工業發展，农業、輕工業發展的迟緩又造成了發展重工業的困难，并給整个国民經济帶来不利的影响。

为什么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中生产与消費会有失調現象呢？这里不仅有客观原因，同时也有主观原因。

在客观原因方面：

首先，我国經济落后，前几年小农經济在农業經济中占优势，而农業經济在我国又具有举足輕重的作用。这种作用，我們不能仅从农業在工农業产值中的比重去理解，还应当从它对工業以及整个国民經济所發生的影响来考查。以1954年来說，我国工業（不包括手工業）直接和間接用农業原料生产的占工業总产值的44.6%②。小农經济的特点是簡單再生产，这种特点在我国1953年及1954年由于我国农業恢复性質的潜力已經發揮以后便充分的暴露出来了，又加上这两年农業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便形成了我国1952年到1954年农業生产增加速度基本上是处在逐年下降的狀态。由于农業生产增長速度的这种逐年下降狀态，便造成了輕工業1953年到1955年生产增長速度的逐年下降狀态。农業、輕工業增長速度逐年下降，便影响了重工業市場的扩大，粮食和輕工業品的供应，利用农業和輕工業生产出口換回更多的重工業建設所需要的器材，以及重工業投資資金的来源。由此可見，我国农業、輕工業增長速度逐年下降（1953年农業3.1%，輕工業28.4%；1954年农業3.3%，輕工業14.5%；1955年輕工業1%）是我国大規模重工業建設期中重工業生产增長速度逐年下降（1953年36.7%，1954年19.8%，1955年17.1%）的重要原因。

其次，因为我国前三年国民收入增長比較緩慢，分配存在矛盾。由于我国人口多，經济落后，我国1955年在开始大規模建設时，国民收入的規模与国民經济需要对比来看便显得很小。我国1953年至1955年社会产品增長速度比較緩慢，又加以物資消耗比重在增加，我国国民收入1955年只較1952年增加29.7%③，增長速度是比較慢的。在分配上，大規模工業建設才剛剛开始，投資需要急剧增加，但投資一时不能發揮多大的效果；又加上这个时期国防开支还很大，人民生活水平很低，要求迫切的改善生活，因此，国民收入在积累、消費和国防分配的比例关系中便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矛盾，国民收入生产增長速度的緩慢对于这一矛盾起了加重的作用。当然我們不应忘記，这一矛盾的性質，从总的方面看并非敌对的，但却是很突出的。而消費落后于积累的增長，平均工資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長等，便是这种矛盾的具体表現。

最后，我国建設社会主义事業，是我国先人所未有做过的翻天复地的偉大事業，經驗缺乏，又加

---

① 根据"政治經济学教科書"，落后便意味着失調，不是說两者速度不一致。

② "統計工作通訊"，1956年第21期，第3頁。

③ "統計工作通訊"，1956年第18期，第4頁。

上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同其他国家許多不同的特点，因此，存在缺点和錯誤是很难避免的。这主要的表現在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农業合作化在我国的有利条件及其巨大意义，我們还不能一下子認識得很充分；我們还不善于了解在我国具体条件下生产与消費的統一与矛盾，并將它們完滿的結合起来；我們还一时来不及根据我国生产与消費的关系建立各种有效的制度，以便刺激生产的發展和保証人民生活更好的改善。

处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中，生产与消費的增長矛盾比較显著，这是很难避免的。但是在我国1953年至1955年三年中消費有些过分的落后于生产（农業与农民是1953年及1954年农历年度，工業与职工是1954年及1955年日历年度），以致产生了失調現象，則不能簡單的归結到客观原因上，同时还有主观的原因。但主观原因只起着加剧和推迟解决矛盾时間的作用，在我国还不是决定的因素。

在主观原因方面：

首先，在生产方面，对我国农業生产的作用、农業合作化在我国的有利条件及其对我国农業生产發展的意义、我国农業生产的潜力等估計不足，有些片面强調工業、工業对农業發展的作用，存在机械的搬用苏联經驗，强調农民的保守和落后的方面，因而产生了对农業生产的領导与支持不够，农業合作化保守的傾向。对于輕工業的特点及其在我国的作用也認識不足。这表現在对于沿海旧的輕工業基地，尤其是上海、天津注意的不够，以致产生沿海工業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甚至1955年在上海产生了生产下降，折旧額大于对它的投資的畸形現象。对于地方工業注意不够，也与对輕工業、人民需要注意不够相联系的。地方工業注意不够，这便阻碍了地方的积極性和充分的利用地方資源来滿足人民的需要和支援国家的經济建設事業。五年計划原来对輕重工業投資分配的比例为8：1，也少了一些，这也影响我国輕工業速度尽可能的發展。

其次，在分配方面，关于消費对生产的反作用認識不够，有些片面的强調了生产和积累，因而产生了压縮工資的增長速度，削减了必要的非生产性建設的現象，有許多有可能改善人民生活的事都未能做。

总的来看，我認为在主观原因方面，主要是在一定程度上，片面的强調了重工業建設，生产和积累，因而便將生产資料与消費資料的發展，工業与农業的發展，消費与积累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对立起来，对于它們在一定时期、一定資源条件下，生产与消費不能同时追求兩者最大限度地滿足，考虑的多；对于它們的統一，考虑的少。这主要表現是对农業、輕工業的發展，消費的增長对生产所起的推动作用考虑不够。

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批判了农業合作化的右傾偏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同时也出現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高潮，我国生产澎勃發展，而人民的生活也逐步在改善，我国的生产和消費便密切的結合起来。

1956年，我国农業生产在重大的自然灾害的条件下，由于实現了农業合作化，国家通过农業貸款、增大对农業投資、大力供应农業生产資料等給予了农業以有力的帮助，因而較1955年丰收的年度粮食还增产了5.4%，棉花生产增产將近4%①。

由于1955年农業丰收，輕工業的原料供应比較富裕，国家对輕工業也采取了积極發展的政策：（1）將輕重工業投資的比例改为7：1，增加了輕工業投資的比重；（2）确定了进一步發揮沿海工業作用的方針；（3）注意地方工業在滿足人民需要中的作用；（4）私营工業全行業合营的实現和手工業合作化的胜利也为輕工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我国1956年輕工業發展速度也相当快，較1955年增長17%。

1956年农業、輕工業的迅速發展，便为我国1956年重工業的發展在資金上、市場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我国1956年重工業便有可能規定其發展速度为23%，是近年来發展最快的一年。

1956年在社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基础上，全国平均工資提高13%。农民收入由于农業生产的增長，在农業生产的分配上实行多分少扣，再加上农民負担稳定，农副業不合理价格适当的調整，絕大多数的农民收入都可以增加，1956年农民消費基金將比1952年增加28.5%②。

但因1956年农業遭受自然灾害，未能完成計划，投資增長过大，居民收入增加也快了一些，因此，便产生了建筑材料、消費品供应有些紧張，貨幣增加超过实物供应的缺点。这不意味着消費增加的多了，积累增加的少了。

---

① 見华恕："我国农業增产速度是快还是慢"，載"人民日报"1957年1月9日。

② 見薄一波在"八大"的發言："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費的关系"。

二

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即將胜利实現，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及时的拟訂我国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二个五年計划，在全面的檢查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生产与消費执行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發展我国国民經济的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这个建議是發展我国国民經济和提高人民生活的偉大綱領，它贏得了我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的中心，在生产上是基本消灭剝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巩固基础；在消費方面是采取积極的态度进一步發展消費品生产，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

依据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的任务，在我国生产發展和基建投資方面：要求第二个五年期間工农業总产值比1957年計划增長75%，工業总产值（包括手工業）增長一倍左右，生产資料工業的增長还要快一些。重工業中鋼的产量要求1962年达到1050万吨到1200万吨。第二个五年国家的基本建設投資，可以比第一个五年大約增加一倍左右。上述建議数字在工农業总产值、工業总产值、农業总产值的增長速度方面，都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計划的規定。依据建議数字，到1962年，工業总产值（包括手工業）在工农業总产值中的比重將提高到65%左右①，重工業在工業总产值中將达到50%左右，設备自給率將达到70%左右。整个国民經济部門結構的这种改变，必然的將进一步加强工業在国民經济中的主导作用。

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議对發展消費品生产与增加居民收入都采取了积極的政策。1962年农業总产值將比1957年計划增長35%左右，粮食增長38%左右，棉花增長47%左右。輕工業生产增長也很快，預計在1957年發展的基础上再增長60%以上②，其中棉紗較1957年計划增長60%至80%。职工的平均工資增加25%至30%，农民的全部收入可能增加25%至30%。

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在大力發展重工業，建立我国工業化巩固基础的同时，其所以还有可能采取积極的政策發展消費品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是与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生产与消費的結合具有有利的条件和特点相联系的。

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生产与消費結合的有利条件和特点的表現：

第一，这个計划期中的整个社会生产，基本上是在消灭了資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占統治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生产与消費的对抗性的矛盾基本上完全消灭，先进的生产关系必然的成为推动生产力發展的巨大力量。从而形成国营經济領导下社会主义劳动竞賽新的高潮。

第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居于統治地位，这就为社会主义經济規律作用的扩大开辟了道路；这就使得我国更有条件来發展生产，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去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这就使得我国有条件通过計划將生产与消費直接配合起来；并有可能进一步消除价值規律的破坏作用，發揮其积極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服务。

第三，由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中建設的企業大批的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才能动用，限額以上工業建設單位的絕大部分企業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才能充分的發揮潜力，同时又加上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中积累了建設的經驗，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建設可以提早动工和动用。动用与生产能够得到更好的結合。我国工業生产中，按照大体計算，到1957年由新建改建企業所生产的將占15%左右；而到1962年由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期間完工的新建改建企業所生产的將占50%左右，便是証明。

第四，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是在国民收入規模已經比較大的条件下开始的，国民收入生产的增長速度又很快，而国民收入分配中，国防費用所占的比例有可能减少的較多，因而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扩大再生产的部分便有可能增大，因此，国民收入在消費和积累方面的分配便有可能更好的結合。

第五，我国通过第一个五年計划积累了長期計划的經驗，我国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經济管理和計划管理的水平將会有很大的提高，从而便有可能更好地利用發展我国經济的有利因素，来克服經济發展中消極的因素，促进我国經济的迅速發展，保証我国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此外，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中在生产与消費配合方面所积累的經驗，也有助于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生产与消費的正确結合。

由此可見，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生产与消費不仅像第一个五年計划在总的方面不存在对抗性矛盾，而且在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各个部分上，基本上或完全都不具有对抗性的矛盾。建設先进的工業国与人民目前物質文化需要的滿足相对的矛盾也趋

---

① 根据"建議"数字推算出来的。

② "計划經济"，1956年，第10期，第5頁。

于緩和，但它依然存在，它突出的表現在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与發展消費品之間的矛盾，迅速增大积累与增大消費之間的矛盾上。

为了在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建立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巩固基础，必須堅持大力發展重工業的方針，迅速增大积累，將我国积累比重仅仅保持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中所达到的水平是不够的。

第一，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生产建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国工業生产規模仍旧很小，絕大多数的企業技术水平很低，許多新的部門沒有建立或非常薄弱。以机器制造業来說，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所需要的机器40%依靠进口，許多大型的精密的机器和成套的設备都不能生产。因此，在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应当大力發展机器制造業，特别是發展我們所需要而又缺乏的各种重型設备、專用机床、精密机床和仪表制造業。爭取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設备自給率达到70%。黑色金屬和有色金屬是机器制造業的材料，冶金工業是重工業的基础，因此，冶金工業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的另一个重点。要求我国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不仅能够生产普通鋼，而且能够生产各种高級合金鋼，增加有色金屬产品种类，使我国冶金工業的生产基本上能够滿足我国机器制造業和其他部門發展的需要。他如像我国工業中的薄弱部門，如無綫电工業、石油工業必須很快的加强；缺少的工業，如合成化学工業、原子能和平利用都必須积極的發展。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国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进行大量的投資。

第二，因为世界科学技术在飞速的进步，世界先进国家的工業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我国为了迎头赶上，因此，我国工業化的水平和标准的要求便不应当过低。旣不能与19世紀英国的工業簡單相比，同时也不能与20世紀30年代苏联当时的工業化簡單相比。从技术水平看：我国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新建和改造的机器制造、冶金、化学、电力、石油、煤炭和無綫电等主要工矿企業，都是依据可能的条件，采用先进的技术設备和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因此，对于这些企業的新建和改造技术水平的要求，并不低于先进的国家。从工業的体系看，要求在我国三个五年計划或者还多一些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先进工業国家所有的主要部門基本上我国都应該有，主要产品我国都应該自己能生产或基本上都能生产，以便使我国重工業的生产基本上能够滿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經济技术改造的要求，輕工業能够适当的滿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証我国經济的独立自主。当然，我們也不应該对我国工業化的标准要求过高，即使在三个五年計划以后建成了工業国，但是从經济上看，我国較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仍然是落后的。像我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經济原来十分落后，要想在經济上赶上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建設成为高度工業化的国家，沒有几十年的長期努力是办不到的。正因为我国原来經济落后，而我国实現工業化的标准又不能过低，这就决定了我国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建立我国工業化的巩固基础是一項極为艰巨的任务，它要求我国在这个时期进行大量的重工業建設。

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旣然必須繼續堅持大力發展工業，优先發展重工業，增大积累的方針；这就要求我国人民必須繼續發揚勤儉建国，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于生活标准要求过高，認为消費品生产与消費的增長可以与生产資料和积累增長的速度一样，这是不对的。

但是另一方面，認为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不需积極發展消費品生产，增大消費，以較快的速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为我国积累比重提高到苏联目前的水平"沒有什么困难"①，也是值得商榷的。

从我国人民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增大消費看：我国居民原来生活水平很低，目前居民基本需要还不能得到正常的滿足，广大农民收入和低級职工的工資都很少，迫切要求改善生活。即使工資水平比較高的职工，生活也还不富裕。再加上我国人口增殖快，失業人口需要安排，社会文化設施需要迅速的發展。这一切都要求我国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必須以較快的速度来增大消費。对于这种情况和願望估計同認識不足，是不对的。

与苏联比較看：李富春副总理在談到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期中积累比重时曾經这样談道："同苏联几个五年計划相比，我国积累基金所占的比例較苏联低（苏联大約为25%左右），而消費基金所占的比例則比苏联高（苏联大約为75%左右）。考虑到我国人多，生产不發达等因素，积累基金的比例还只能稍低一些。按照这一比例，一方面可以保証国家建設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人民的生活得到适当的改善。"李副总理这些話，不仅适用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也适用于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我国旣然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生产力的發展水平要較苏联目前低很多，苏联目前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只占25%左右，那么要求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积累比重同苏联目前一样，为什么会沒有困难呢？其次，我国目前工業化的处境与苏联已有所不同，因此，我国便沒有必要像苏联当时那样，在

① 参閱吳景超："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的积累与消費"，載"新建設"，1956年，11月号。

生产力發展水平还不高的条件下，压縮消費的增長以增大积累的比重，而在我国今天是有可能將生产与消費更好的結合。最后我們还应該考虑到苏联自第一个五年計划以后，积累比例并沒有增大，是下降的。1932年积累基金占26.9%，1937年占26.4%①，1940年占26%②，第五个五年計划期中和目前占四分之一左右。即使如此，苏联一直到現在还沒有完全克服消費落后于生产的矛盾。这里我并不打算全面談苏联消費落后于生产，我只想通过这些材料說明我国不应該盲目追求积累比重的增大和低估增大积累比重所存在的困难。

由此可見，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国民收入消費和积累分配的界限是：积累的最低界限不应低于第一个五年計划所已达到的水平，最高界限应該低于苏联目前积累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即25%。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于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时期大力發展重工業，增大积累；积極發展消費品生产，重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針。片面的强調生产与消費，消費与积累，都会破坏我国生产与消費的关系，在經济上、政治上造成不良的后果。

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国民收入在消費和积累分配的上述界限，是否能够保証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基本任务的实現呢？回答是肯定的。根据"建議"，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积累的标准是必須將基本建設投資增長一倍左右，才能保証在我国建立工業化的巩固基础。为什么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积累基金比重低于25%，略高于第一个五年計划期中所达到的比重的条件下，能够將国家基本建設投資增長一倍左右呢？（1）第二个五年国民收入將增長50%左右。（2）国营經济的迅速發展，及其在整个国民經济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国家所能够掌握的資金比例將进一步增大，按照現行財政制度預算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將略有提高。（3）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国防和行政开支在整个財政支出的比例也將由第一个五年的32%，下降为20%左右。我国国防費用在預算中占的比重較大，主要是用作購置国防物資的开支，国防物資在未消耗以前按照現行的計算方法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計入儲备部分，至于国防支出的另一部分和全部行政开支是屬于社会消費。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中縮减国防和行政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它不过表明：縮减国防物資儲备部分在积累基金中的比重，或减少用作国防和行政开支的社会消費部分，以增大国家基本建設的投資。（4）第一个五年計划并沒有包括資本主义投資，而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由于全行業公私合营进而改造为国营，这些企業投資列入了国家基本建設投資总額，基建投資計算范圍的扩大也是国家基建投資增長快的一个原因。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消費的标准：在社会生产超过第一个五年計划規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的积累比重只略为提高一点，而第一个五年計划积累比重則增加的比較多，这便决定了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消費的增長速度可以与第一个五年計划一致，并有可能爭取超过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消費增長速度的規定。依据"建議"，我国1962年比1957年工業总产值增長一倍，重工業增長快于一倍，农業增長35%，并依靠兄弟国家的帮助，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积累与消費的計划与社会产品实物来源相对照也是可以实現的。

在我們解决我国第二个五年計划生产与消費間的矛盾时，不仅要正确的掌握国民收入消費与积累分配的比例，还要求我們充分發揮生产潜力，必須考虑經济效果，节約物資消耗，以增大国民收入。

我国工業化不仅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帮助，采用先进国家所积累的科学技术成就的便利条件，同时我国还存在物資資源和人力資源十分丰富的便利条件。由于我国計划管理和經济管理經驗不够，我国物資与人力資源的潜力并沒有充分發揮。为了使我国这些資源能够充分利用，我們不仅应該总結我国建設的經驗，学習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設的經驗，同时也应該学習資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先进經驗，学習像日本这样人多、地少、資源比較貧乏，善于利用資源的經驗。

充分利用資源最主要的一个环节便是应当充分的考虑生产的經济效果，發揮价值規律积極方面的作用。我們不仅要求为生产資料生产的生产資料的發展对于其本身的發展能够达到多、快、好、省、全面發展，同时还要求它对于为生产消費品的生产資料也能够达到多、快、好、省、全面發展的目的；而为生产消費品的生产資料則应当对消費品的發展能够做到多、快、好、省、全面發展，以便更多、更好和全面的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生产更多、更好国防制备来巩固国防。因此，我們应当以多、快、好、省、全面發展生产、滿足人民和国防需要，作为檢查生产資料与消費資料發展中經济效果的尺度，即我們必須利用价值規律在生产中严格核算劳动消耗的效果。我們不能簡單的以生产資料生产增長比消費品快，消費品生产的多就是好。当然在掌握这个标准时，我們必須注意重工業建設長期性的特点。但这絕不意味着我們可以允許生产經济效果低的生产資料是無足輕重的正常現象。

發揮經济效果的主要途徑便是节約物資消耗。"节約生产資料，可以使社会总产品中用来补偿已消耗的生产資料的那一部分减小，从而構成国民收入的那一部分增大。"③因此，节約物資消耗对增大国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我們应該充分的估計到由于社会主义經济已占統治地位所产生的劳动人民在节約物資消耗方面的积極性与創造性，和进一步改善經济制度与計划制度的有利条件，来克服我国物資消耗的各种浪費現象，从而使得我国国民收入能够更快的增長。

---

① 諾特京："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論概要"，中华書局版，第156頁。

② 維更捷夫："第四个五年計划时期苏联經济發展概要"，三联書店版，第142頁。

③ "政治經济学教科書"，人民出版社版，第561頁。

論需要在生产發展中的作用

——需要論批判

陶　容

唯物的历史观点的主要思想就是說：社会發展的决定力量是生产方式。

这个問題初看起来似乎是很容易解决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問題往往是这样的明显起来，社会發展是由于生产的發展，生产的發展是由于生产力的發展，生产力的發展又是首先从生产工具开始①，那末什么东西引起生产工具的發展呢？人口論与地理条件論早已被斯大林所駁倒，一般書上都是不厭煩地重复着这些，实际上这兩种謬論是比較容易解决的。至于科学論也比較好解决，科学本身是生产發展的产物（固然它在發展上有相对的独立性），科学成就只是給生产力的發展以可能，这种可能要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人們主观感到有發展生产力的必要时才能变成現实。帝国主义时代，技术科学比壟断前还要發展，可是此时壟断資本家不像以往的資本家那样迫切的想改进技术了，因此科学提供的巨大的發展生产力的可能性，只被利用了一点点，例如原子能不但沒有被利用在生产方面，反而被利用在破坏生产的战爭上。

我們不应当單純地重复經典著作中已經解决了的問題，虽然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我們要結合人們当前的实际思想情况，解决他們存在的对重大理論問題的一些錯誤認識　这样才能使馬克思主义思想在他們的腦中眞正地生根成長。

人們在学習生产、生产方式这一問題时的主要錯誤是往往自發的陷入唯心主义的需要論，認为生产工具改进的根本动力，首先是人們在劳动中想减輕自己劳动的需要。他們并援引斯大林在論及生产的第三个特点，即新的生产方式产生过程的自發性时所說的下面一段話，作为自己的理論的依据：“第二个原因，就是人們在改善这种或那种生产工具，这种或那种生产力要素时，不会覚悟到，不会了解到也不会想到这些改善將会引起怎样一种社会結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减輕自己的劳动，謀得某种直接的，可以感触到的益处。”的确，斯大林的这一段話是容易叫人誤会的，似乎生产工具的改进完全是由于人們想减輕自己的劳动。可是斯大林原意并非如此，紧接着这段話，他在下面举了兩个例子，一个是原始公社社会中人們是想减輕自己的劳动而改进工具，另一个是資本主义社会中却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潤而推进生产力。（“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莫斯科中文版，第76頁）人們有这种錯誤認識的根源，是由于对生产力發展的后果，对工具改进的后果，沒有結合一定的生产关系来观察，只是抽象的看待，以为生产力一發展，生产工具一改进，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給全人类帶来眼前的直接利益，都可以减輕劳动者的劳动。其实历史并非完全如此，有时甚至有相反的結果，阶級社会中的情况就是这样。恩格斯曾經說过：“文明的基础既是一个阶級剝削另一个阶級，那末它的全部發展便是在經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領域里每前进一步，同时也就意味着被压迫阶級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狀况后退一步。对一个阶級的利益，必然是对别一个阶級的灾难，一个阶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别一个阶級的新的压迫。机器的采用，可作为最显著的例子，这一采用的后果現在已为众所周知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版，第

---

① 这里根据的是斯大林在“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提法。可是，大家都知道，資本主义的簡單协作，是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起点，它創造了新的社会生产力——集体劳动力，这并不是从改进工具得来的。馬克思說：“生产方式的革命，在手工制造業，是以劳动力为始点；在大工業，是以劳动手段为始点。”（“資本論”第一卷，第446頁）因此，生产力的發展，是否始終是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發展上开始，还值得研究。

170頁）

在資本主义制度的發展过程中出現了机器，机器使人的劳动摆脫了生理的限制。即使人的劳动从用手直接操縱工具过渡到以工具操縱工具，从而使广泛的利用科学成就有了極大的可能，使社会生产力的發展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規模。可是在資本主义社会中，机器从它一出現起就是手工業劳动者及雇佣劳动者的对头与灾难。它使手工業劳动者破产，使雇佣劳动者被排挤而成为失業人口，并使在業工人的劳动强度日益提高。机器的产生与發展决非由于工人想憑借它来减輕劳动，历史說明在資本主义工業革命初期，机器才出現时，曾广泛地發生过工人搗毁机器的运动。机器的产生与使用，是由于資本家想依靠机器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获得更多的利潤。这可从兩方面来进一步說明：

第一、机器的产生和使用，是由于資本家想更好的剝削工人。机器可以帮助資本家延長劳动日，提高劳动强度，使用廉价的童工、女工，并因工作簡化、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降低劳动力价值，因广大失業軍存在而压低工資等等。并且机器可以帮助資本家对付工人的"騷动"与罢工。因为改进机器、使操作簡化，就可以使資本家用簡單技术工人（童工、青年工人）来代替較复杂的技术工人（成年工人），而这些工人正是"騷动"与罢工中的主力。因此不是工人阶級减輕劳动的需要使資本主义社会技术进步，而是工人阶級反对資本的斗爭使得資本主义机器不断發展。馬克思說："劳动者为反对資本的專制，而举行周期的暴动罢工等等时，机器便成了压抑这种运动的最有力的武器。……我們可以写一部書，指出自1830年以来，这一切發明，都只是資本压制劳动者反抗的武器。"（"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29—530頁）

第二、机器帮助資本家在互相竞爭中占取优势，因为机器可以給資本提供超額利潤。資本的竞爭实际就是瓜分整个工人阶級为社会总資本生产的剩余价值总和的斗爭。每个資本家都想在这个总額中得到比較大的份額，而全体資本家都極希望这个总額能够增加。因此这种竞爭是資产阶級与無产阶級間阶級斗爭的反映，是基于資本主义所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而产生的。

所以，不論就第一点或第二点而言，資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發展的根源在于資本主义生产关系本性，也就是根源于基于这种生产关系而产生的阶級斗爭。因为沒有了資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沒有了剩余价值規律，也就沒有了資本对剩余价值的貪欲，也就沒有了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的斗爭以及資本互相間的竞爭；資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發展就成为不可想像的了。

可是，人們至此，往往又产生另一种誤解，他們同意阶級社会中生产工具的改进不是由于减輕劳动的需要，而是由于阶級斗爭；但却認为，在無阶級社会中，如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工具發展的动力的确是减輕劳动的需要。我們認为，在無阶級的社会中，减輕自己劳动的需要是推进工具改进的动力之一，但此时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改进工具的动力，正是由其生产关系决定的。因为生产資料的公有制度使得工具的改进能够减輕劳动者的劳动，并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給他們帶来更大的物質利益。反过来說，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破坏了社会主义本性所具有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一致的原則，那么情况是要翻过来的。比如在苏联农業集体化的初期，在一些农庄中由于采用了不正确的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則（分配是生产关系組成部分之一），就使很多农民把想减輕自己劳动的需要轉化为逃避劳动与偷懶。只有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則，因为它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力發展的水平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性，才能使人們减輕劳动的需要轉化为提高劳动技能与改进工具的动力。近来我国实行了工資改革，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决定要合理的調整一些农業产品的价格，合理地处理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其原因也在于此。

最后我們还应該指出：减輕劳动的需要也不能說明为什么在社会發展各阶段上生产力的發展各有不同的速度。原始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資料都是公有制，生产工具的改进都可以給劳动者帶来减輕劳动与改善生活的后果，可是这兩个社会在生产力發展的速度方面有着極大的悬殊。同样的，奴隶社会与資本主义社会，都是剝削社会，生产工具的改进对劳动者不能帶来眼前的直接利益，可是奴隶社会在技术方面是保守的，而資本主义社会在技术方面本質上是革命的，發展是迅速的。这种差异，也只能由生产关系的性質来說明。例如，資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發展之所以大大超过以前各社会形态，是由于它是商品經济的最高阶段；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自然經济占优势。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資本家对剩余生产品的需要是無限的。因为資本追逐的是以价值形态存在的剩余生产品。而以往剝削者对剩余生产品的需要是有限的。因为他們

追求的是以使用价值形态存在的剩余生产品，即剩余生产品本身。对奴隶主与封建主来說，并沒有什么强制的力量迫使他們必須經常扩大生产；但对資本家来說，竞爭的規律强制他必須不断的积累資本扩大生产。因此，“資产阶級除非使生产工具經常發生变革，因而除非使生产关系，亦即除非使全部社会关系革命化，便不能存在下去。”（“共产党宣言”）这就創造了資本主义生产力發展非常迅速的局面。

概括以上的叙述，我們可以得出三点結論：

第一、减輕劳动的需要可以成为生产工具發展的动力，如果生产工具的改进能够减輕劳动者的劳动。但是工具的改进是否可以减輕劳动或者甚至相反成为加强劳动的手段，那是由生产关系的类型来决定的。

第二、减輕劳动的需要并不是生产工具得以改进的唯一需要，例如还可以有資本家追求利潤的需要，但是，这些想改进工具的需要，归根到底，都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喚起的。

第三、减輕劳动的需要不能解釋为什么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生产力的發展有着不同的速度，这一点也只有生产关系的性質才能說明。

二

有些人往往这样提問：“不錯，减輕劳动的需要能不能对生产起到推进作用，是由生产关系的狀况决定的。但是無論如何，在任何时候，生产的根本目的仍然是滿足人們的需要。如果沒有对生活資料的需要，人类是不会进行生产的。因此，需要总是生产力發展的根本动力。”

現在我們就来研究需要是不是生产發展的根本动力。在这里不得不談到康士坦丁諾夫同志主編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書，因为它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一本历史唯物主义教科書。这部書对需要論进行了批判，他的結論是这样：“所以，需要的增長給予生产力的發展以影响，但不是它發展的原因；需要的增長本身依賴于生产，而它对生产力發展的影响只有在估計到当时生产方式，当时生产关系的特点时才能了解。”（該書第116頁）这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还有两点需要商榷的地方：

第一、簡單的說需要不是生产發展的原因，是不恰当的。作者自己在前面也談到：“在社会主义經济制度下，群众需要（購买力）的增長經常超过生产的增長，因而推动生产前进。”

第二、用“需要的增長本身依賴于生产”这个論点，作为反駁“需要是生产發展的动因”的依据，理由是不充分的。

康士坦丁諾夫同志在論証自己論点的时候，曾經引用了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导言”中的一些話，并且从这些話得出結論說：“生产和消費的辯証的統一与相互作用中，生产是他們發展的基本的因素。”不錯，这是对的，这是馬克思的原意。可是，馬克思絲毫無意用这个論点来証明需要不是生产發展的动力。为了搞清楚这个問題，不得不簡單的提一下馬克思在“政治經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这个問題的一段論述的本意。

馬克思在这“导言”中是就社会生产一般（即撇开各种具体形式的抽象生产）来研究作为生产总体諸环节（生产、消費、分配、交换）之間的联系与关系的，并不是研究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生产与消費（以及分配、交换）的关系。

馬克思認为在生产一般中，生产与消費的关系是这样的，即：生产直接也就是消費，消費直接地也就是生产。不过，“生产合一于消費与消費合一于生产的直接統一性，并不排斥它們的直接两立性。……每一个直接就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間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他指出，一方面，消費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第一，“因为要在消費中生产物才成为实际的生产物，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实际上成为衣服；一間房子無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为实际的房子”；第二，“因为消費給新的生产創造出需要，因而創造出成为生产前提的观念上的內在动力”。另一方面，生产創造着、生产着消費，“它生产出消費的对象、消費的方式和消費的动力。”因此，他指出生产与消費的同一性表現在三方面：——直接的同一性、相互依存性、以及“每一方在完成自己的时候創造着另一方，把自己当作另一方創造出来”。

在研究生产与消費这一段的結尾处，馬克思說：“这里要特别指出的要点不过是：如果人們把生产和消費当作唯一的主体或孤立的个人的活动来观察，它們总是表現为同一个过程的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出發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消費，当作必需、当作需要，本身是生产活动的內在的要素；但后者是实际出發点，因而是它的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政治經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版，第153—7頁）

現在我們指出下列三点：

第一、馬克思不是用生产創造需要来証明“在生产和消費的辯証的統一与相互作用中，生产是它們發展的基本的和决定的因素”。他是用：生产是过程的“实际的出發点……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来証明的。可是康士坦丁諾夫同志似乎沒有注意到这一点。

第二、康士坦丁諾夫同志引用“生产产生消費”来証明消費需要不是生产的动力，就更歪曲了馬克思的原意，更不正确了。因为你既然可以用生产产生消費的論点来反駁需要論，那末别人也可以用消費生产着生产的論点来維护需要論了。生产决定消費的論点不能成为需要不是生产力發展动力的充分理由。我們都知道生产力的性質决定生产关系，可是这完全沒有否定掉生产关系又是生产力發展的动力。

第三、进一步看，馬克思既然說消費需要生产着生产，那就是說，他認为，就生产一般来說，固然生产决定消費需要，可是消費需要又是生产發展的动力。馬克思說：“因为消費給新的生产創造出需要，因而創造出成为生产前提的观念上的內在动力。消費創造出生产的动力，……”显然，这里所謂“动力”，指的就是需要。

如果怕有断章取义的毛病，我們可以看一看馬克思对“二，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費的一般关系”整个一节所作的結論：“……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費、分配和交换，以及这些不同的要素相互間的一定的关系。当然，生产在其片面形式上也被其他要素决定，……最后，消費的需要决定着生产。在不同諸要素之間，存在着相互作用。凡是有机的整体总是这种情况。”由此可見，馬克思已經說明了消費的需要在片面的形式上影响生产的發展。我們应当承認需要也是生产力發展的一个原因，就好像我們应当承認地理环境与人口、科学也可以成为生产力向前發展的一个原因一样。这样并不会使我們成为历史唯心論者。問題在于什么是生产力向前發展的根本动力。地理条件、人口、科学都可能成为生产力發展的动力，可是这些可能要轉成为現实都决定于生产关系的性質与狀况。因此，在很多生产力發展的原因中，只有生产方式的內在矛盾是根本的。我們不必一方面承認“需要的增長給予生产力的發展以影响”，同时又勉强的說它“不是生产力發展的原因”。实际上我們应該着重說明：需要能不能成为生产力發展的动力，以及它能給生产力的發展好大的推动力量，都决定于生产关系的性質与狀态。

在原始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中，沒有阶級的存在，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使生产与需要的統一直接地表現出来，因此，这时需要能对生产起到直接的、而且很强大的推进作用。这一点是經典作家已經闡述过了的。

（一）关于原始社会：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指出：“第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为滿足……需要所必需的資料的生产……。第二件事实，就是第一个滿足了的需要本身，滿足的作用和已获得的滿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了新的需要……”。

（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說：“劳动者物質狀况的一貫改进和劳动者需要額（購买力）的不断增長，……是有增無已的扩大生产的源泉。”（“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員会政治工作的总結报告”，人民出版社版，第81頁）

（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說：“共产主义社会……將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生产將由社会的需要来調节，而計算社会的需要，对于計划机关將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20頁）

最近兩年来，在苏联学术界也已有很多人認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無限增長的社会物質文化需要和当时所达到的生产發展水平之間的矛盾。”这在斯捷潘年的一篇文章中已有較好的說明，可是并沒有进一步闡述这一基本矛盾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之間的关系。我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議中也同样的指出：“我們国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業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業国的現实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对于經济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当前經济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况之間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質，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經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当然这里还有很多問題要求我們去探討，但已足以說明一概而論的說需要不是生产發展的动力显然是錯誤的，基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需要实际上成为生产發展的重要推进力了。

三

在对需要論批判时，最后还应提到的就是，有些人还这样說：“不管怎么样，如果人类根本就沒生活上的需要，

人类总是不会学会劳动生产的，因此追至最初，还是先有需要后有生产，需要决定生产。”这种說法虽然非常幼稚，可是却常常有人提出来。要搞清这个問題，首先应当把問題本身具体化起来。我們要問清楚，这里指的是什么样的需要，是社会人类的需要呢，还是一般动物的需要。这兩种需要是有着重大差别的：

第一、一般动物的需要單純是由生理条件决定的，人类的物質需要虽然也是由生理条件所决定，可是劳动使这些需要在內容上起了很重大的变化。例如，自从人类学会了用火熟食，就能够吃很多按其生理条件原来是不能吃的东西——魚、蚌等；特别重要的是人类有着特有的精神需要。

第二、因为一般动物只能适应自然，而人类能够改造自然；所以一般动物的需要只能用自然界固有的东西来滿足（人类飼养的牲畜例外，但这不是它們本身的能力决定的），而人类则主要是用自己的劳动产品滿足自己的需要。

第三、一般动物的需要只是本能的冲动，人类的需要，基于語言与思維能力而成为一种意志、意圖。因此，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动物的需要，我們应当承認，这种需要是先于生产而存在的，而且这种需要的确也是人类学会生产的一个条件。因为像石头一类沒有需要的东西(無机物)根本就談不上生产。我們說劳动創造人，意思只是說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劳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此外当然还要很多其他的条件，例如古猿的群生性，古猿的生理条件等等。可是决不可認为动物性的生理需要既然是先生产而存在，因而就是动物式的需要产生出生产。事实很清楚，一切动物都有生活上的需要，可是只有人这一种动物学会了生产。

如果这里指的是人类的需要，那末很明显，社会人类的需要是生产的結果，正如人类的語言、思維能力是生产的結果一样。所以追至最初，既不是动物的需要，更不是人类的需要产生引出生产，而是动物式的本能劳动創造人类的需要。因此生产是第一性的，人类需要是第二性的，人类的需要断不是人类生产的前提。①

不論是說减輕劳动的需要、或生活消費的需要是生产力、生产工具向前發展的根本动力，都可总称之为需要論。需要論可以概括成如下的提法：“需要改进生产工具的思想是生产工具向前發展的动力。”这句話当然包含有千眞万确的“眞理”，因为人是会思維的有意志的动物，正常的人們做一件事总是受一定思想的支配的。人們当然是在感到有改进工具的必要时，才去改进工具的。可是在这里我們不应当忘記：科学的任务就是通过現象去揭露本質。就历史唯物主义来說，基本的原理就是不要把人們的意識作为历史事件發生与發展的根本原因，而要找出产生这意識的社会物質基础。在生产力、生产工具發展的动力問題上，如果追到需要就停止，那末就沒有深入社会現象的本質，而陷入唯心史观的泥坑。

由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人們有沒有改进生产工具的需要，以及这个需要具体地說来是什么（是减輕劳动呢，还是获得利潤），都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質与狀态决定的。因此，生产發展的根本动力不是人們的意志而是客观存在着的生产方式的內在矛盾。可是也不能簡單地否定需要对生产發展的作用。需要虽然不是生产發展的根本动力，但却可以是生产發展的动力。并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需要已經成为生产發展的重大推进力量之一。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决定的。也就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与社会人民的生活需要一致。这就使得社会主义社会的全体人民都能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極地去發展生产。党与政府如果在領导国民經济生产上忽視了人民的需要，或者不能正确地处理人民的長远利益与眼前需要的关系，人民的生产积極性就將消沉下去。長此以往国家的政治生活就要發生不良的波动。因此在研究生产一般的發展規律时，特别是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經济規律时，簡單地說“需要不是生产發展的原因”，是不对的，对革命实踐是不利的。

---

① 至于人类的需要同劳动在产生的时間先后上，我們認为是同时的，沒有先后。正如鷄蛋同鷄是同时产生沒有先后一样。凡是統一体矛盾的双方在产生的时間关系上总是这样。

論工業專業公司的性質和作用

汪鴻鼎

1956年，我們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偉大的胜利，在年初短短的时間內，政府接受了全国大中城市工商業者的要求，批准了全行業公私合营，并且在几个月內，全面地进行了清产核資、財务处理和人事安排，还开始了經济改組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但都是在健康正常的狀态之下进行的，而且能作到快而不乱。这种史無前例的偉大的变革已經成为国际上光輝的范例，指出了由資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另一种道路。

因此，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經驗应当及时地加以总結。專業公司是这次社会主义改造中新的組織机構，在改造过程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今后还將要繼續發揮它的作用。但是它的組織制度和工作方法都还在总結經驗研究建立中，它的許多工作方式和方法还沒有定型，这时候对它加以研究应該是有現实的意义的。目前为了研究条件的便利，我准备先从上海工業方面的專業公司来进行研究，通过重点分析，探討其性質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發展生产中的作用，以便再进一步进到全面的研究。

專業公司的建立与發展

專業公司的开始建立，根据現有的資料来看，是由上海开始的。

1955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社論中曾經指出："为了实行金笔、鋼笔、鉛笔業的全行業改造，上海的地方工業机关專門成立了一个制笔公司，吸收私营企業的重要人員参加工作，大大便利了合营、改組、逐戶安排的工作的进行。这一經驗証明，成立各种專業公司来主管对于私营工商業的各行業的改造，是实行統筹安排的一种必要的措施。"我們知道，过去政府对于私营工業虽然在总的政策上充分貫徹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但是在具体的管理上却是处在大家都管，又都不完全管的情况中。像工商行政部門管理私营工業，只是管工商登記，处理違法行为以及监督三按（按質按量按期）方面；至于商業部門只管到加工訂貨戶，非加工訂貨戶就不發生关系，就是对加工訂貨戶也只管它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銷售，而不管生产；在地方各个工業局的專業处中也有管私营工業的，但是只管其技术方面；其余像劳动局管劳动力調配，税务局和人民銀行管企業財务，各个机構大都只管其与本身業务有关的个别方面，因此可以說对私营工業沒有較深入的全面的領导。这也是由于过去对私营工業的政策所决定。但是今后要进行全面深入的領导，首先就要考虑企業不同的情况，应該从横的領导方式改变为按条的領导，就是根据历史上自然形成的經济形式按行業来进行管理，在这一个行業中，不管是那一方面的問題，都由一个單一机構来全面管理，使这一个行業中所有不論大小、不論多么分散的企業，都得到統一的領导，能够全面的考虑問題。因此成立各行各業的專業公司就有其必要。

上海市在合营改造的初期，有些工業局中設立了專業处来加强領导，可以說是專業公司的前身，像上海市紡織工業局曾設立染織处、毛巾被單处和复制处，上海市第一輕工業局曾經設立过專門管理制笔工業的处，后来为了事实上的需要，在1955年3月間設立了一个制笔公司，把全市六百多个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金笔、鋼笔、鉛笔工厂，从安排生产、領导生产、指导技术一直到經济改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工作都管起来。事实証明，这样的專業公司对于資本主义工商業的全行業合营改造和統筹安排起了很大作用。国务院在1956年2月8日通过的"关于目前私营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項的决定"中規定："各地国营工業、商業部門应該迅速筹备建立各行各業的專業公司，尙未建立的应該首先成立筹备組織，已經建立的，应該加以充实，以便使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和業务工作有分工管理的机关。"在1956年上半年合营高潮以前，上海已經成立了51个專業公司，其余都在合营高潮以后，根据行業归口的需要，开始建立。到1956年五月間，在上海的工業、商業、交通

运輸等系統中，共建立了113个專業公司（包括不采取公司形式的專業管理机構），它們都按行業归口的原則管理了全市二百多个工商行業；工業方面多数是一个行業一个公司，像制笔工業公司、石油机械制造公司、第一机床公司等；至于商業方面，很多是一个公司管几个行業，像福利事業公司就管理理髮、沐浴、旅館、洗染四个服务性的行業；还有些种类复杂难以归口成不了独立行業的，就由一个杂品公司管理。由于这些專業公司的建立，就使得各个行業的合营改造和生产經营工作迅速地走上正軌，推动各个企業进行了清产核資、人事安排和經济改組等一系列的工作，并且开始統一的进行生产經营的領导和計划工作，初步改变了过去私营企業生产的盲目性。它們还采用專業会議、評比会議和表演会等方式組織生产經驗的交流，改进操作技术，提高产品質量。像食品工業公司总結了公私合营福利农場制造軟糖的經驗，在許多国营和公私合营的糖果厂中大力推行，提高了产品質量；制鋁工業公司在制造皂盒和烟盒方面，举行評比会議，交流了大中华、源昌和永業三个厂的提高产品質量的經驗，对各个企業的工作上起了很大的影响。

工業方面：在上海市的八个地方工業主管部門下面成立了58个工業專業公司，按行業領导25,853家新合营工厂（参閱"解放日报"，1956年7月14日）。并且在專業公司的領导下，按照产品相同、地区相近的原則，把大部分工厂进行編組，每組选擇一个較大的組織健全的或管理能力較强的單位做中心厂，每一个中心厂兼管几个厂；一部分难以維持的困难戶和个体手工業戶，以及并进大厂对生产有利的小厂就进行裁并；也有一部分厂仍旧是独立厂，因为它的产品比較特殊和品質牌号比較有名，这样可以保持它生产經营的特点。在这样調整以后，就变成了2,936家中心厂和637家独立厂，納入了地方工業的体系，对于企業改造和發展生产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專業公司的組織关系

專業公司是对資本主义工商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当中的产物。將近一年来，它从开始在个别行業試办，到在各个行業当中全面建立，虽然还沒有完备的規章制度，但是它的作法和組織大致已經定型，我們可以从几个公司的現有情况，来了解它的組織关系。

一般說来，局領导公司对所屬企業通过組織生产来进行生产改革和企業改造。公司是局下面一級的机構，是局和厂的中間环节，它負責貫徹局的指示到企業中去。局对所屬的工業，制定决策，全面領导；專業公司根据局所制定的决策具体执行。公司負責所屬全部企業的对外業务联系，它接受外面的訂貨，并把这任务分配到各个工厂；对于工厂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由它負責供应，并解决技术上的問題。也有些公司在所屬各厂的銷貨和进料方面只对外訂总的协議，至于具体合同和業务执行由企業直接进行。

因此公司对所屬工厂的关系是管理、領导关系和業务关系。公司确定中心厂和独立厂，并按定点划片的原則划定各中心厂所領导的一般厂，它根据局的規定將計划指标下达各厂，布置各厂的生产任务，执行对各厂的改革和改造，对外統一領导各厂的訂貨及产品銷售与原料供应，通过中心厂領导各个一般厂并直接領导独立厂的各項生产工作和技术改造，它的費用都不是由国家財政撥發而是由下面企業上繳。各厂上繳有不同的形式，或由各厂在履行加工訂貨的工繳中，或在企業上繳的上級机关企業管理費中开支。

局和公司可以說都是管理机構，它們之間的分工根据目前实际情况和有关方面的意見大致是这样：在对各行各業的改革改造方面，由局統一領导并及时总結檢查，公司具体执行。在生产計划工作方面，局負責生产計划的平衡，审核各厂的年度計划和季度計划，核定产品价格，根据各厂的具体情况制訂技术經济定額，向公司頒發計划指标，在經济改組工作中拟定生产方向和規模以及各厂行業归口的安排工作；公司則根据局的計划指标下达各厂，組織指导各厂編制年度計划和季度計划，并彙总編制公司的計划。在供銷工作方面，局根据以銷定产的原則統一組織銷售及原材料供应和供銷的平衡工作，核定下面各單位产品的分工和进行調整，統一向上級申請原物料，掌握所屬各公司使用的材料和它們的余料的回收；公司則直接对外承接任务，簽訂合同，对下布置任务，并办理撥料、交貨、結算等手續。在生产技术方面，局布置工作，拟訂合理化建議、先进生产者运动和劳动竞賽的管理奬励办法，研究解决技术問題和各厂間及公司間的协作問題，总結推广先进經驗和作業計划，推动健全企業管理和圖紙管理，計划进行新产品試制和旧产品补課；公司就处理以上各項的日常工作并对各厂进行督导。在基本建設方面，局統一进行計划并組織协

助各公司的土建設計、施工、安裝、驗收工作，掌握調度动力設备和基建的物料分配以及动力申請，审批在規定限額以上的基建費用；公司則办理規定限額以下的基建費用的支撥和供应。在財务方面，局督促企業建立財务会計制度、預决算制度和各种表报制度，平衡資金，核算成本，并处理供銷帳务，公司审核彙总所屬各厂的供銷帳务并对各种制度的执行进行监督。在劳动工資方面，由局統一規定工資标准、劳动組織、編制定員、劳动保护和职工福利的各种办法，并决定在若干人数以上的人力調配和若干元以上的物質奬励；公司具体执行。在人事方面，局掌握中心厂正副厂長、公司科長和工程师以上人員的任免、調动、奬励和考勤，以及各級机構的变动調整；其余由公司掌握。

以上所談專業公司的組織关系虽然各个公司的情形不完全一样，但就一般說来，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現在根据上述的一般情况来分析它的性質和作用。

專業公司的性質

根据前面所談到的資料，由專業公司的建立和發展以及其組織关系，我們就可以分析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質的机構。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它和資本主义的公司虽然同样用"公司"的名字，但是在本質上是有絕对的区别的；虽然它所屬的絕大多数的厂原来是私营厂，但是在公私合营之后，生产关系已經起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这个公司的本身就是国家設立的，它的目的是改造資本主义企業，發展社会主义工業，与資本家的公司之以营利为目的，有本質的不同。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其次，在性質上，專業公司也和一般的国营工業企業不同。一般国营工業企業都經过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也經过不同阶段的技术改造，已經进入了正規生产；而目前各專業公司所屬各厂的生产都还不能达到这个地步，并且由于它的所屬各厂即使在今后逐步的經济改組过程中也还不可能像国营厂那样的整齐划一，必定还要保持相当的分散生产，在經营上还要照顧到过去私营企業的特点。特别在对于企業改造和人的改造上，專業公司和国营企業的工作是有所不同的。同时它和老合营企業也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如果把在国营企業和老合营企業中的工作方法硬搬过来，也是不合适的。

特别应該指出專業公司不是工厂，它和个别企業不同；它虽然具备行政上的自主性和生产技术上的統一性，但是它不是企業，它是許多企業之上的領导机構。固然它本身对外能够签訂合同，是一个經济核算單位；但是它下面的許多厂也是經济核算單位，和工厂中的車間不同。因此專業公司本身也就不能算作企業。同时它也和像鞍山鋼鉄公司之类的联合企業的性質不同，因为鞍山鋼鉄公司包括采矿、选矿、燒結、煉鉄、煉鋼、軋鋼、煉焦、耐火材料等許多不同性質的复杂的生产，而專業公司則是向專門化方向發展。

那末專業公司究竟是什么性質呢？許滌新同志的提法是比較确切的，他說："为了适应全業的生产安排、經济改組和全業公私合营，在組織形式上，需要成立全業性的專業公司。專業公司就是托辣斯，但是它并不是資本家的托辣斯，而是社会主义性質的公司。"（許滌新："把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載"学習"．1956年1月号）我們看看苏联的托辣斯，苏联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起在各个經济时期都有这种托辣斯的組織，它是一个行政單位，对于所領导的企業的財务和技术方面都有統制的权力。它的任务如下：（1）促进所屬各企業間技术經驗的交流。（2）督促各企業尽速利用科学技术研究所实驗室及其它研究机关的成就。（3）供給各企業以国外工業技术發展的最新材料，并設法使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尽速应用于苏联各企業中。（4）保証各企業內部資源的充分利用，倉庫堆棧能有适当的組織。（5）建立各企業內部的合理紀录制度及会計制度。（6）督促所屬各企業尽速采用各种及特殊机关所建立的标准化制度。（7）設立特殊机構，用以推行合理化建議运动。此外它对所屬各企業的重要負責人选也有决定权力，在經济恢复时期它除了傳达和执行政府的命令和决議并代表所屬各厂的利益以外，还对所屬各厂担負供銷的任务，到工業化时期又將供銷任务划出，只担任技术方面的监督。从以上的任务可以見得，虽然它在各个时期有过变化，但是基本上和我国的專業公司是相同的。然而二者究竟不可能完全等同。苏联的托辣斯不負担像我們的專業公司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任务；它們包括国营工業和共和国工業，我們的專業公司主要限于地方工業的范圍（直屬中央的專業公司占極少数），而且照趋势看来，它現在負責推动改造，并集中領导生产，这任务今后將愈細致、愈深入，今后它們可能权力更逐漸集中，对所屬企業会拥

有較托辣斯更大的权力和能动性。

苏联的托辣斯是經济核算單位，下面厂不独立．我們的專業公司本身不完全是經济核算單位，下面厂却都是独立經济核算。

目前还要解决的一个問題，就是專業公司究竟是行政机構还是業务机構。因为在組織制度上、工資标准上和許多設施方面，行政机構和業务机構是有所不同的，必須解决了这个問題，才能使它肯定地按照某一种制度办事。如果說它是行政机構，它却有些是自己直接承接業务、签訂合同并担負盈亏責任。購进原料和銷售成品也都是由專業公司进行的，它应該是一个業务机構。但是它明明有权力也有任务来推动改造，来組織生产和布置生产，来进行人事安排和經济改組，并規定計划指标，还有前面所提到的一系列的行政机構的任务，因此它又似乎是一个行政机構。綜合上面情况，我認为．專業公司应該是一个業务机構而兼有行政权力，同时也是一个工業管理环节。

專業公司的作用

根据前面所說关于專業公司的具体情况，單就上海来說，各个專業公司成立最早的像制笔工業公司已經有了一年半以上的历史．大多数的專業公司也快到一年的时間．在这一段时間中，專業公司担負了很大的历史任务，也完成了很大的历史使命．并且也經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它究竟發生了些什么作用，是值得我們分析研究并加以評价的。

总起来說，專業公司在这一段过程中，利用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質的規律，推动了生产力的發展，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經济的优越性。事实証明，各个專業公司已經胜利地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現阶段中对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阶段，胜利地进行了改变生产关系和解放生产力的斗爭，并且还正在胜利地通过企業改造和人的改造向着企業国有化前进，这是一个空前的历史性的胜利。根据我国原有工業的特点来說，分散、落后、小厂占多数、大多数只能裝配修理不能独立制造、設备簡陋，尤其机器制造工業都是些"万能"工厂，工業部門內部缺少專業分工，阻碍了生产的發展；在專業公司成立以后，就开始改变了以上这些情况，把原有龐杂混乱的私营工業初步地进行了分类，划分了較細的工業部門，將各个企業和技术力量进行了归口，規定了生产方向，使生产力能够充分發揮，对發展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

像这些原来最能体現上述原有工業特点的机电工業，現在已經划分为第一机床制造公司、第二机床制造公司、动力設备制造公司、石油机械制造公司、內燃机配件制造公司、輕工業机械制造公司、通用机械制造公司、紡織机械制造公司、自行車制造公司、旋轉电机制造公司、电力設备制造公司、机电仪表制造公司、鑄煅工業公司，这种工業生产的进一步專門化．是我国工業部門在社会主义工業化的道路上的一个飞躍。同时通过專業公司把原有的盲目發展的資本主义工業进一步納入了国家計划的軌道，使它們能够根据国民經济的需要并按照国家的計划指标来进行生产，并且逐步地淘汰那些国民經济不需要的企業和發展那些国民經济需要的企業，这就充分地反映和体現了社会主义基本經济規律和国民經济有計划按比例發展的規律的作用。

專業公司有經济作用和政治作用，这二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从專業公司的政治作用来說．它具体地执行了党对資本家的統一战綫工作．在工作方法上．它根据党的政策創造性地塑造了在落后的国家中通过和平方式消灭資本主义所有制和消灭資产阶級的新的典范。具体說来，它正确地执行了贖买政策，根据資本家自願与在大势所趋的条件下，通过全行業公私合营逐步地向企業国有化發展。在这个过程中，專業公司要进行一系列的工作，从企業的全行業公私合营到进行合营后企業內部生产經营的改革，还进行对資本家的思想改造，这是一个長期而艰巨的工作，必須作好这些工作，才能达到企業的国有化，才能完成在这一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目前，企業公私合营阶段还要搞好公私共事的关系，使各个企業的生产能够由于各方面积極性的充分發揮而得到大大的發展，这就是專業公司对資本家的統一战綫工作，也就是它对于企業改造和人的改造的重大作用。同时根据中央的政策．为了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發揮地方的积極性．除去关系到整个国民經济而帶全局性、关鍵性、集中性的企業由中央管理以外．都尽可能地多交給地方管理，这样就要使地方政府要管理数量相当大和种类相当复杂的工業單位，如果不設立專業公司按条按行業地由安排生产、領导生产、改进技术到經济改組一攬子地管起来，那是不堪設想的。

从專業公司的經济作用来說，主要表現在改造和生产兩方面：在改造方面，由于專業公司的建立才划分了工業部門和各类生产，使每一个企業能够

按照它自己的生产技术条件、历史經驗和国家需要来分别进行归口，使每一企業都有了生产方向，不会再盲目生产，也使国家和人民所需要的产品能够有了制造的場所。在各个企業归口之后，就可以按照各个行業不同的情况，进行清产核資、財务处理、人事安排和經济改組等工作。这些工作，每一行業有其不同的特点，像在机器制造工業中清估財产主要是机器和工具，在日用化学工業中就主要是原材料；人事安排方面，在机器制造工業中資方的絕大多数都是技术人員，而有些行業中就不是这样，在安排方面就要有不同的处理；在經济改組方面，有些行業以集中生产比較有利，有些却适宜于分散生产；这些各种各样的特点，必須通过專業公司在它自己的行業中摸深摸透，抓住关鍵来进行，这也就是在对資本主义工業社会主义改造前一阶段能够稳步地健康地順利地完成的主要原因。如果用芝麻綠豆一把抓的方式进行是作不好的。这不但在过去的一个阶段需要如此，在今后的进一步的經济改組过程中，还是需要这样的。

再从生产方面来說：領导生产更是一个細致的工作，不同的工業部門有不同的作法，也有不同的生产技术問題。專業公司对企業生产的領导要求具体深入，尤其这些原来私营的大大小小的企業，大多是制度紊乱，經营方法不一，許多企業根本談不上制度，要从这些一团乱絲的企業中理出一个头緒来，領导它們进行正規生产，是困难的。必須根据各行各業不同情况，进行生产規划，在改造过程当中抓紧安排生产，并較長期地布置生产，按工業部門进行技术改造，来有領导地进行正常生产。各个專業公司在这方面已經發揮了它应有的作用，并且在今后的进一步改組改造中，在改革企業內部生产經营制度和管理方法方面，还要起相当大的决定性作用。

結　　語

專業公司在过去已經完成了对資本主义工業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阶段的任务，今后还要担負起更艰巨的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过去在改造工作的执行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今后在繼續进行企業改造和人的改造上也还要發揮重要作用。如何搞好进一步的經济改組？如何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主要的責任是在專業公司。

而在更長的时期中，像苏联的托辣斯一样，它的主要工作將轉移到根据部門特点領导生产上。这是一个長期的任务。今后随着工業的發展，新的工業部門的建立，專業公司的划分还可能更細，像机床制造公司已分为第一、第二，輕工業机械制造公司还可能划分为造紙机、印刷机和食品机械等。

專業公司应該是一个業务机構并且兼有行政权力，应該也是一个工業管理环节；本身經营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銷售，是一个独立的經济核算單位；除去計划生产、改进产品質量外，还要領导生产，改进企業經营管理制度，提高生产管理水平。

專業公司既然是一个独立經济核算單位，它除对外購进原料并銷售成品外，对所屬各企業在業务上也要有一个正常的制度。現在一般采用工繳形式，这就体現公司与企業在業务上是加工訂貨的关系，在今后如果使企業和公司在業务上更具灵活性和独立性，应該采用企業价格和工業价格的方式，我国目前固然还沒有实施周轉税，我以为可以暫时通过近似商業加价的办法，在这二者的差别上，使專業公司在業务經营上更能發揮积極性。

在專業公司的行政权力方面，現在的情况是权力集中在專業局，公司只是一个政策的执行机構，这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为求得政策能够正确地和統一地掌握，保証不犯錯誤和少犯錯誤，是正确的。但在今后的工作主要放在發展生产和改进生产的具体情况之下，各行各業在生产上就更会具有各种不同的特点和要求，这时候專業局就应該將一部分决定政策的权力往下放，使專業公司更能充分發揮它的灵活性和积極性。

專業公司在中国是一个新的东西，对于專業公司的研究缺少文献資料，但是摆在目前的事实是有很多活的資料等着我們去吸取，我希望各專業公司和業务部門的同志今后能够將各自的作法和效果多多提供出来，总結經驗，交流推广，这不但对我們今后的工作有現实的意义，也会具有很大的国际意义的。我这篇短文只能作为对專業公司問題研究的开始吧！

代　　邮

1、讀者来稿来信，請把姓名、地址用正楷書写清楚，以免發生差錯。

2、許爭鳴同志：請告通訊处，以便联系。

3、延安师范某同志："試論'西廂記'"一稿已收到，請告姓名，以便联系。

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革命精神

任訪秋

章太炎是19世紀末叶、20世紀初叶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一位大师。早年从事学术研究，并尽瘁于民族革命事業，晚年脫离群众，漸趋于頹唐保守，因而不免逐漸被人遺忘。但我們若就中国近代学术以及人民革命事業的發展来看，章太炎的确还是起了不小的繼往开来的作用的。因此对于章太炎似乎还有加以研究的必要。本文拟就他的生平、学术思想与革命精神，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簡略地加以論述。

一

章太炎（1867—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后因仰慕清初学者顧炎武的为人，又改名絳，别号太炎。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由古老的封建社会淪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同时也正是中国人民为推翻封建統治与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革命运动的时代。而这客观現实，也就影响了他的思想和行动。他生于清末同治六年，正是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运动被清王朝鎮压下去后的第四年，当时清王朝的統治虽然暫时得到了稳定，但是各地方的革命火焰，仍然不断地在点燃着，例如1853年的捻党起义，1854年的苗族起义，1855年的云南回族起义。同时，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884年法帝国主义的入侵，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其結果清王朝連續地同外人訂了些丧权辱国的条約。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不使一些敏感的知識分子来注意并考虑祖国的命运問題。

章太炎当他幼年，从他外祖父朱左卿讀書的时候，就听到了明末清初大学者顧炎武、王船山兩人关于民族思想的言論，因而就种下了民族革命思想的根。后来不久又讀到了明季稗史十七种，因而排滿的思想就益發蓬勃了起来。1892年从德清俞樾問学，但他并不是埋头治学，倒是非常注意当时社会政治的發展情况。他在1895年就开始了政治活动。戊戌前曾参加过康有为的强学会和梁啓超的时务报社。由于梁的介紹，才知道当时革命家孙中山的为人。正因为他和康、梁有着那样的关系，所以当戊戌变法失敗后，他的名字也在被捕之列，于是不得不逃亡到台灣。不久轉赴日本，因得与孙中山相識。1902年在上海因給鄒容的“革命軍”一書作序，并且为文駁斥康有为保皇主义的荒謬，而被捕入獄。①

1906年出獄，即东渡赴日。这时他把他所領导的光复会和孙中山的兴中会会合，改組为同盟会。并且創办了“民报”，他担任了主笔。当时在东京的中国人，从事政治活动的派别很多，但主要的則为革命派与改良派。改良派以康、梁为首，他們創办了“新民叢报”，宣傳君主立宪。这种改良主义的言論，在当时起了很大的混淆革命思想与削弱革命力量的反动作用。和康、梁对立的就是同盟会所創办的“民报”，他們树立了鮮明的革命旗帜。于是在革命与改良兩派之間，就掀起了一个对国体問題，实际也就是革命的方向問題的激烈論爭。这一論爭繼續了三、四年之久，反映了当时阶級与民族双重的矛盾和斗爭。最后革命派終于获得了輝煌的胜利，粉碎了君主立宪派改良主义的幻想。

章太炎在当时是“民报”的主笔，参与了这一次的激烈战斗，先后發表了“討滿洲檄”、“排滿平議”、“革命道德說”、“箴新党論”、“代議然否論”、“駁神我宪政說”、“再复吳敬恒書”等具有强烈的战斗性的文章。这些文字給当时讀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鲁迅后来在紀念太炎的时候，曾追述他个人当时的感受道：

> 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獄，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說佛法，談“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啓超斗爭，和“××”的×××斗爭，和“以紅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爭，眞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講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記得了。②

---

① 以上均見“制言”半月刊第25期。

②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見“且介亭杂文末編”。

1912年清王朝垮台，民国建立，接着北洋軍閥袁世凱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盜窃了国柄。太炎最初曾被任为东三省筹边使，但不久就看穿了袁世凱的帝制陰謀，毫不顧忌地加以揭發，大罵袁世凱为包藏禍心，于是又被逮捕。直到袁垮台后，才恢复自由。但由于历史的發展，新事物不断的出現，用旧的眼光来看新的一切，往往鑿枘难入。太炎晚年也不免如此。他反对白話文，对中国共产党所領导的人民革命，也进行了盲目的誹謗，都說明了他思想的停滯和阶級的局限性。1931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暴發后，曾去北京，关于备边守險問題，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北方当局有所建議，但并未被采納。回上海后不久，即定居苏州，創立章氏国学講習会，1936年6月卒于苏州，著有"章氏叢書"及"章氏叢書續編"等。

二

关于章太炎的学术思想的淵源問題，我認为应該从兩方面来說明。

一是清代学术中的皖南学派，或称徽州学派。这派始于戴震，一傳而为王念孙，再傳而为俞樾、孙詒讓。太炎早年受学于俞樾，因而得以繼承皖派的治学精神。太炎在"檢論：清儒"篇中說：

> 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經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得名家支流，非汉世凡將急就之儕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参密严栗，上溯古义，而断以已之律令，与苏州諸学殊矣。

太炎繼承了皖派的精研小学的傳統，而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摆脫了小学一向为經学附庸的地位，使之独立成为一种專門学問。梁啓超評太炎謂：

> 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謂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創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国故論衡"中論文字音韵諸篇，其精义多乾嘉諸老所未發明。应用正統派之研究法，而扩大其內容，延辟其新徑，实炳麟一大成功也。①

二是明末以来的浙东学派。太炎"清儒"中說：

> 然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說礼經，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繼之，尤善言明末遺事。会稽章学誠为文史校仇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約近史通而說礼者羈縻不絕。定海黄式三傳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書通故，三代制度大定，唯浙江上下諸学說亦至是完集云。

太炎早年虽承学于俞樾，但也曾問学于黄以周，故又繼承了浙东之学。浙东学术最突出的特点有三：

（一）浙东学派多系史学家，特别是到了章学誠，明确地提出"六經皆史"的口号，这样就批判了过去的經学独尊的看法。其次从学术的發展上又指出"六經皆史，而諸子又皆出于六經"，这样又把經子并列，于是又批判了过去儒家一尊的看法。另外，他指出"賢智学于聖人，聖人学于百姓"，以及"集大成者乃周公而非孔子"②。这些道理和事实，都与旧說不同。还有他根据刘歆的"七略"而倡所謂古者官师合一，諸子出于王官之說，这对后来学术上影响都非常的大。太炎在經学上宗古文，他对中国秦汉学术發展的看法，受章实齋的影响很大。他非常推崇刘歆，竟至刻一圖章文为"刘子駿私淑弟子"。但太炎治学有皖派精神，就是"不好与先儒立异，亦不欲为苟同"，所以他对于实齋見解不合时宜与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多有批評，决非盲目的因襲。

（二）民族思想。浙东学派中从黄宗羲以下如万氏兄弟与全謝山，都是具有民族思想的历史学家。他們記述明末遺事，目的都是为了要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来喚起汉民族的民族思想。太炎的民族思想，以及积極地从事排滿活动，一面系受顧、王兩位大师的影响，同时也与他繼承浙东学术，熟悉明末掌故有关。梁啓超謂：

> 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極謹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誠影响頗深，大究心明清間掌故，排滿之信念日烈。③

这充分說明了太炎民族思想的淵源。

（三）言天人性命，必有切于人事。拿現在的話說，就是理論必与实际相結合，而决不应空談理論。章实齋講：

> 史学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經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則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所以浙东学派中的人物大抵有着卓越的表現，如戴山之节义，梨洲之隐逸，万氏兄弟之史学，实齋謂其"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④这种反对單純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主張"經世"，主張"各有事事"，正是浙东学派的优良傳統。太炎繼承了这种傳統，才使他不甘于以經

---

① 梁啓超："清代学术概論"第二十八节。
② 以上均見章实齋："文史通义"。
③ 梁啓超："清代学术概論"第二十八节。
④ 以上均見章实齋："文史通义"。

师終老，而从事革命活动，这就是太炎之所以在清末能成为民族革命家的思想根源。

此外，太炎在思想上也受有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很深的影响，特别是前者，他認为“釋迦玄言，出过晚周諸子，不可計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論”。①而終于以佛釋庄、以庄証孔，会通三家，一以貫之。

总之，太炎的学术自成体系，不論其評騭古人，衡量时人，批判学术，諷刺时政，都有他自己的尺度。这种尺度，最显明的就是民族思想与民主思想。

先就民族思想而論，这是从事排滿的革命运动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貫穿在他的整个学术思想中。具体到史学上，就成功为一种民族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主要表現，有下列几点：

（一）尊重民族历史。太炎認为历史关系一个民族的存亡。历史亡，民族亦將因之而亡。他說：

> 国無史，則人离本。……史亡，則国性灭，人無宗主，淪为腐夷。

所以自古灭人国的，沒有不灭其历史的，他說：

> 露西亞灭波蘭，而易其言語；突厥灭东罗馬，而变其風俗；滿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遺緒，滿洲之穢德，后世不聞，斯非以遏吾民之發憤自立，且剗絕其由根耶！②

因而他强調地指出要發揚民族思想，必須用民族的历史知識，来对人民进行培养灌溉才行。他說：

> 故僕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类，为之灌溉，則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漸就萎黄也。③

这就充分地說明了太炎之重視历史，提倡历史，完全是为复兴民族的，从民族主义的观点出發的。

（二）尊重祖国文化的卓越成就，反对抱着民族的自卑感，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他說：

> 旁求显学，期于四裔。四裔誠可效，然不足一切頡画以自輕鄙。何者？飴豉酒酪，其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校术誠有詘，要之短長足以相复。④

太炎的看法在当时或不免为国粹主义者所借口，但对那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的民族虛無主义者来說，应該說是一个很好的批判。所以当时有不少人以不类远西为耻，而太炎則以不类方更为荣。从这里可以看出太炎是具有民族的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的。

（三）从民族思想的观点上来評論历史人物。太炎評論历史人物，主要的标准就是民族思想，他推許孔子，并不像今文家那样，認为孔子是托古改制，而認为他是一个具有民族思想，和中华民族历史的保存者与傳播者。他說：

> 繼志述事，繕老之績，而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廢兴，中夏所以創業垂統者孔氏也。

又說：

> 春秋作，史道兴，則禘之說可以不知，振引豪末，而膏澤天下者，其惟春秋。綜观春秋，乐道五伯，多其攘夷狄，扞族姓，虽仲尼所以自任，亦曰百世之伯主也，故曰窃比于我老彭。⑤

由此可知，仲尼之功乃在其作“春秋。”而“春秋”之价值，又在于它叙述了我們民族的历史，使人人知前世廢兴，中夏所以創業垂統。其次是它强調了夷夏之防，激發了我們的民族思想，从而繼承先人的“攘夷狄，扞族姓”的勛業。

其次在政治上，太炎盛推刘裕与刘基，原因在于裕能兴师蕩平了中原，基能輔佐明祖，推翻了异族統治，光复了旧物。特别是对于刘基有無限仰慕之情，預先把自己的墓安排到基墓的旁边，准备將来一旦死了，埋到那兒。至于对清初諸大师，太炎盛贊王顏，对黄不免尙有微辞。至对于鎭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曾国藩，則直斥之为“大盜”，对于主張保皇的康有为，則詆訾其为“無人心”。

統观以上所述，可知民族主义思想实为太炎的中心思想。基于这种思想，而从事排滿的革命运动。又由于从事排滿运动，于是从各方面表現其民族主义思想，宣傳其民族主义思想，因而也就益發影响了当时社会，而推动了排滿的革命运动。

其次是民主思想。我們知道在清末西方的民主主义已經介紹到中国来了，即以康、梁的改良派，也沒有不是以“民主”相号召的。孙中山所組織的兴中会，代表了当时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政派，他們更是以民主主义相号召的。太炎在那样的时代潮流下，自不能不受到影响。特别是当他所参与的光复会与兴中会会合后，在革命的方向和道路上，二者基本上一致了起来。即如太炎在“討滿洲檄”中，提出的口号是“扫除韃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

---

① 章太炎：“菿汉微言”。
② 章太炎：“檢論”卷四。
③ 章太炎：“別录”二。
④ 章太炎：“国故論衡”下。
⑤ 章太炎：“檢論”卷二。

平均地权。”这基本上就是孙中山当时所提出的革命的政治綱領。同时在他“駁康有为論革命書”中，明确地闡明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駁斥康有为的民智不开不可革命，而可立宪的反动謬論，提出了人民的智慧是在革命斗爭中逐步提高的論点。他說：

> 長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將日尋干戈，偸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頓內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豈有立宪之世，一人独聖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显然，以此譏長素，則为反腐相稽，校勘無已。吾曰不可立宪，長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則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爭而后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佗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拿二聖，而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飢寒，揭竿而起，固無革命观念，尙非今日广西会党之儕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賑飢济困之事兴。豈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爭旣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則賑飢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則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賑飢济困結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梟雄。以合众共和結人心者，事成之后，以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爭以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則知扫清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則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灭滿洲，剿除官吏为能事矣。……人心近化，孟晉不已。以名号言，必方略言，經一竞爭，必有胜于前者。今之广西会党，其成敗虽不可知，要之，繼此而起者，必視广西会党为尤胜，可豫言也。然則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剂，而实补瀉兼备之良藥矣。

这些看法都符合于辯証唯物主义的观点，从革命实踐中得出經驗教訓，总結經驗教訓，进一步指导革命实踐。所以一次有一次的进展，最后必然取得胜利。

太炎的民主思想，不止是表現在反对立宪，主張革命上，同时还表現在他对历史人物的看法，与对古代学术派别的評价上。对历史人物，他非常同情那些反抗压迫，領导人民起义的革命領袖。最突出的，是他对盗跖的看法。他認为盗跖是痛恶少数人剝削多数人，压迫多数人，而且常常由于統治者的爭夺权位，構成战爭，使人民遭到塗炭的政治制度。所以他有点近于今日之無政府主义派。伯夷之餓死，也是如此。盗跖、伯夷兩人的行徑虽不同，但他們目的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眞是石破天惊的說法。但也只有站在人民立場上，才会有这样的理解。此外，为了發抒民憤，反抗压迫，太炎并且歌頌了古代的刺客。至对农民起义領袖如李自成、洪秀全也無不加以称道。

在学术思想上，更突出地表現了他的民主观点。他把几千年来大家所崇拜的至聖先师孔子和所奉行的儒教，給以無情的揭發与抨击。他在“諸子学略說”中，首先給孔子刻画了一幅令人生厭的面貌，他是那样热中利祿，終日奔走，同时还好用机詐，田常弑齐君，孔子实是謀主，但他对哀公还要假裝好人，沐浴請討。他本是老子的弟子，后来竟背弃了老子。他所提倡的中庸，实际形成一种国愿，比乡愿更要坏。由于他的影响，后来的儒者多半醉心利祿，冒沒奔竞。接着他給过去的儒者下了这样的評語：

> 用儒家之道德，故堅苦卓厉者絕無，而冒沒奔竞者皆是。俗諺有云，書中自有千鍾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貫于征辟科举之世，而無乎不偏者也。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間，論議止于函胡之地。彼耶苏天方教崇奉一尊，其言在堵塞人之思想，而儒术之害，則在殺乱人之思想，此程朱陆王諸家，所以有权而無实也。

这种大胆的非毁孔子与反对儒教的言論，在当时思想界不能不說是一种革命的言論，而这种言論的根源，乃是民主思想与革命思想。

至于这种民主思想，也就是当时人所說的平等自由思想。太炎的民主思想的根源，一方面系受西方的影响，同时也受有古代学术的影响。太炎最初研究佛学，后来又精研庄子，因而从哲学上树立了他的平等自由論的思想基础。正因为太炎有这样的思想，所以以民主的眼光来看待先秦的各家学术，因而对孔子和儒家才有那样革命的言論。

最后是太炎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最突出的表現，首先是他在上海被捕之前，为鄒容的“革命軍”作序，并在“駁康有为論革命書”中，直斥当时皇帝为“載恬小丑，不辨菽麦”。后虽被逮下獄，而革命之志不屈，犹作詩贈鄒容，表示临危不惧的决心。其次出獄后，即去日本，到后在留东学生欢迎会上演說，备述个人历史和遭受到清政府的压迫：“算来自戊戌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才拿到。”①因而他提出学習佛教，要学那勇猛無畏的气概，像华严宗所說，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腦髓都可施舍与人。其次要追步我国古代建功立業的人，那种俊偉剛严的气魄。不久他就主編了“民报”展开了与改良派康、梁等人的斗爭。这一时期太炎的文字，是他平生作品中最富于战斗性，也是最精彩，最具有积極意义的作品。他感动了不少的青年讀者，魯迅当时就是被感动者里

① 許寿裳：“紀念先师章太炎先生”。

边的一个。民国以后，袁世凯陰謀帝制，太炎由于反对袁的帝制，指斥了他的陰謀，遂被囚禁。太炎在囚禁中，曾憤而絕食者二次。魯迅后来称他“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①，也就是指的他排滿反袁的斗爭精神說的。

至于太炎給后人最大的影响，首先是他的民族思想。这种思想在清末来說，也就是一种爱国主义思想。因为目的是在謀取民族的自由与解放。为了实現这一目的，所以才不顧一切地向当时的封建統治者进行斗爭。太炎在排滿运动中，写了許多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的斗爭文字，如“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紀念会書”、“張蒼水集后序”、“南疆逸史序”。特别是像后边的序，据許寿裳的叙述，魯迅非常爱讀，而受到很深刻的影响。②此外，太炎弟子中如許寿裳、錢玄同、吳承仕，都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的学者。

其次太炎早期的反孔教思想，到了五四时代，竟發展而形成为一个反孔教运动。当时倡言排击孔教的，首先是吳虞。在他的文章中一再提到太炎对于孔教的抨击。他說：“知政治儒教当改革者，章太炎諸人也。”③又說：

> 明李卓吾以卑侮孔孟，專崇釋氏，为張問达所劾，逮死獄中。所著“焚書”兩次禁燬，言論出版皆失自由，則儒教徒之心里与獷悍可以想見。謬种流傳，至今日，某氏收取章太炎“諸子学略說”，燼于一炬，而野蛮荒謬之能事極矣。④

又說：

> 惟孟子性剛，竟以草芥寇仇之語，被朱元璋逐出文庙，而孔氏仍要享太牢無恙，章太炎目为“国恩”，可以思其故矣。⑤

这都說明吳虞的抨击孔教，实受太炎的影响不小。至他对孔教的批評，如說孔子之学本于老子，礼运大同之說，乃孔子窃道家的余緒，尊道家而抑儒家，称孔子之学为官僚主义，这些見解，几無不源于太炎，而又进一步加以引申与發揮。

其次，陈独秀当时反对儒教的文字也很多，內容要点，不外：（一）孔子之道不适于現代生活，（二）孔子思想根本与共和政体不相容，（三）不应以孔教为国教。这三点，試和太炎的“与人論朴学报書”及“駁建立孔教議”兩文相較，大旨也是多半相同的。最后是魯迅，他是亲承太炎之学的，在当时反孔教的运动中，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魯迅繼承了太炎早期的反孔教的革命精神，向前更跨进了一步，而成为徹底地反封建的革命思想。这就不局限于傳統的儒家思想，而是要把所有足以阻碍社会前进的封建社会的东西，都要摧垮它。所以我們可以說五四时代的反孔教运动，导源于太炎，而又向前跨进了一步，是無庸置疑的。

前边我們說过，太炎在学术上是繼承了清代学术中皖派的正統，同时又繼承了浙东之学，其結果竟会产生了反孔教的革命思想，似乎有点講不通。实际我們要从發展上看，这一点也不奇怪。我們知道朴学的精神，是客观的实事求是，其方法是重証据，破偶像。發展历程，第一步为救王学的空疏，于是由小学以通經学，并考索古代的典章制度的沿革与利病，顧炎武可为代表。第二步，由对經学的研究考索，而覺宋儒解經多非孔孟本义，因进而排击程朱，戴震可为代表。第三步由經学而旁及諸子，最初对諸子仅限于章句的校勘，与故訓的發明，由此更进一步，而研究其思想，取以与儒家相較，因而理解到道、墨、名、法也都有他們的独到之处，而且有許多見解是儒家所不可及的。孙詒讓的“墨子閑詁”，就不單單是为墨子作注，而且盛推墨子的学行。俞樾也著有“墨子評議”。到了太炎，一面承俞孙之学，一面又受章实齋的影响，特别是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民族与民主革命風起云涌的时代，所以他特别推尊庄周，說“庄生之玄，終身以为师資”。这时不但在理論上他認为儒家思想已成为社会發展的桎梏，而且就人的品質而論，孔子以及以后的儒者，也頗有値得非議的地方，于是他就对儒家以及作儒家开山的孔子，就倡言排击，因而就开了以后五四时代反孔教运动的先河。所以从明末顧炎武的反王学，乾隆时期戴震的反程朱，直到清末太炎的反孔教，大有大江归海，不达目的而不止之势。

五四时代另一重大事件，是文学革命。一般的从表面看来，太炎是反对白話的，但殊不知他的弟子中如錢玄同与魯迅，在竭力提倡文学革命上，反

---

① 魯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② 許寿裳：“亡友魯迅印象記”。

③ 吳虞：“讀荀子書后”，“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

④ 吳虞：“儒家主張阶級制度之害”，“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⑤ 吳虞：“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說”，“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

而是受了他的影响。

其次，太炎对中国古代文章，最推尊的是魏晋名望之文，对两汉文既不满意，对唐宋文亦多微辞。同时对清末与他并世的作者如严复、林紓等，也多不满。清末的选派既承两汉和齐梁，而桐城派又为唐宋之后繼。所以在文学革命时，錢玄同才提出了"桐城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这是在文学形式方面。至于在創作思想上，魯迅的反封建思想导源于太炎，前边已有論述，这里就無須多講了。

另外，太炎的繼承浙东学派的那种理論，結合实际，不忘怀現实，和实現自己的理想，而坚强的斗争精神，它的影响也是值得我国注意的。在他的弟子中最能繼承并發揚他这种精神的，就是魯迅。魯迅是深受他这种革命精神的影响的，特别是浙东学派的精神，不是为学問而学問，而是为改革現实，为探求解放民族的道路而学問。学問是为了实現自己的理想而服务的。这种精神，魯迅是完全繼承而又加以發揚了的。

三

最后，我們評論太炎，和我們評論历史上其他的人物一样，应該是全面的考察，給以应有的肯定和批判。

就肯定的来說，太炎确不愧为19世紀末叶、20世紀初叶中国学术界的一位大师。在中国学术的發展上，他的确尽了他的"繼往开来"的历史任务。就前者而論，他一方面繼承了清代朴学正統派的优良傳統，而加以發展，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从事对中国文字声韵之学，以及先秦以来各派学术思想的研究与批評，終于有了超迈前人的巨大成就。就中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各家思想的批評，敢于破除偶像，發前人之所未發，把儒家降到道墨各家的地位，把孔子降到諸子的地位，揭發了他們的眞面目，終于开后来五四时代反孔教运动的先河。

其次，又繼承了浙东学派的精神，为学而有所事事，学术与經世相結合，为求汉民族的解放，而从事排滿的革命运动，与孙中山所領导的革命团体相結合，終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

就后者而言，太炎平生到处講学，弟子滿天下。五四前后很多执教于南北各大学，从事声韵文字、經学、史学与文学的教学，影响非常的大。弟子中如魯迅，可以說是一位最能批判地向太炎学習，繼承并發揚了他的优良傳統的偉大的思想家与革命家。魯迅对乾嘉学派优良傳統的繼承，应該說是与他师事太炎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是繼承了太炎所繼承的浙东学派的研究学术，不忘祖国的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革命精神。当然我們也还必須了解，魯迅从太炎那里所繼承的，只是魯迅整个思想泉源的一部分。另外，他还接受了西方的科学，特别是进化論和馬克思主义，这才使魯迅成为中国当代的一位偉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談到这里，我們还必須指出太炎到辛亥革命以后，在思想上的停滯。他在辛亥革命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但这是屬于資产阶級革命范疇的东西。这种民主主义思想，既不徹底，而民族主义思想又有其反动的本質。当推翻了异族的統治后，就形成为大汉族主义，因而就必然構成对少数民族的歧視与压迫的民族偏見。这种思想在清王朝沒有推翻之前，在革命斗争上还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在辛亥革命以后，他的革命鋒芒，就很快地被封建的复古主义所打退了。他的民族主义似乎只局限于对清王朝的統治，辛亥革命后，好像目的已达，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压迫中国人民，好像有点視若無睹。他的民主主义，似乎也只限于推翻清帝制，对辛亥革命以后封建統治势力的压迫人民，也有点不大介意。同时时代前进了，对于現实中出現的新事物，已不能理解。正如魯迅批評他的"既离民众，漸入頹唐"，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牆，和时代隔絕了"。他的思想不仅不再前进，有时还不免于向后倒退。一方面由于"希踪古賢"想作一个醇儒，因而不免悔其少作，手定"章氏叢書"的时候，把早年具有战斗性的文字，如"諸子学略說"一类作品都删掉了。其次为一般仕紳阶級与复古主义者所包圍，所利用，借他的声望，来进行反动的宣傳。特别是1926年北伐革命的时期，和当时一些官僚軍閥，联名發了一些反共反苏的通电和宣言。同时接受餽贈，参与投壺，像这一系列的悖妄而荒謬的举动，就必然会遭受到革命人士的詆訾与抨击，認为他已成为一个極其頑固而反动的分子。但是根据他晚年的处境，要是揣情度理的話，魯迅所說的"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終"①的話，还是有其一定的道理的。不过一般的知識分子，从这里也就值得深以为鑒，并且吸取应有的教訓了。

1957，1，7，脫稿。

---

① 以上均見魯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批判梁漱溟的思想方法

張若达

梁漱溟是五四运动以后，四十年来一直代表殘余的封建势力，維护腐朽的綱常名教，維护地主阶級利益的發言人。在同时代中，他并不是唯一的代表，不过确实是典型的也是最后的一个。四十年来，他講学，著書，办学校，搞运动，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麻醉青年，反对革命。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中国文化要义"这些主要著作中，正如他自己所說是"一脈衍来"，貫穿着这样一条黑綫。这条反革命的黑綫披着宗教式的学究的外衣。从表面上看去，好像使人覺得有些"神秘""超絕"，莫測高深的样子；其实揭开来看，"才曉得原来沒有什么"。梁漱溟常常吹嘘自己"好用心思"，他这心思究竟是怎样用法的，又用在什么上面？他是从哪里出發，如何自圓其說，达到那些荒唐的結論的？从思想方法这一角度来加以揭露和批判，我們才可以了解他的"学問"的"玄妙"所在。

一

梁漱溟的根本观点是極端的主观唯心論。他否認物質世界的客观存在。他以为"科学起自人对物，物亦起自人的科学。离开人还有沒有物，且置不談，但人所知之物，总是从人才有的"。这就是說，沒有科学，就沒有"物"，沒有人的"知"，"物"也不存在了。梁漱溟在这里故意閃避了物質世界的客观存在这一極重要的哲学問題，假惺惺地說"离开人还有沒有物，且置不談"，想把自己的主观唯心論掩飾一下，可是接着在下文中就完全露了底。他說，"冷靜地向外看……空間遂展开于吾人之前，物体遂展开于吾人之前。就在这一瞬間，是物之始，亦是知之始"（以上均見"中国文化要义"，第304頁）。显然，按照梁漱溟的說法，如果人不存在，或者有了人而不向外看，那么"物"就是不存在的了。

沒有人，就沒有物。由此引伸，就必然会达到沒有我，就沒有宇宙的謬論。梁漱溟正是这样。他以为"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無宇宙。由生活相續，故尔宇宙似乎恒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70頁）。又說"宇宙只是一个'我'……如果我們精神不断的向上奋进，生命与宇宙通而为一，实在分不开內外，分不开人家与我"（"朝話"，第80頁）。至于什么是生活，他說"生活就是相續"，"所謂生物，只是生活。生活生物非二，所以都可叫作'相續'"（"哲学"，第70頁）；"生活就是沒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滿足与不滿足罢了"（"哲学"，第34頁）。这就是說，宇宙是并不眞正存在的，只是由于生活，它才"似乎恒在"。在生物出現之前，宇宙是根本沒有的；生物出現以后，宇宙也只是"沒尽的意欲"、"要求"的"綿延"而已。而这所謂"意欲"，他主要指的是人，是我。因之，梁漱溟的結論就只能是我就是宇宙，我的"意欲"主宰一切。

梁漱溟的主观唯心論的世界观，近来已受到各方面的駁斥，我們这里不打算重复这个工作。但仍須指出如下几点。

列宁在批判馬赫主义的認識論时，曾提出一个对唯心主义"特别惡毒"的問題："在人类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1頁）。这是一个極普通的問題，連小学生也会回答。因为自然科学早已証实，在人类以至任何生物出現以前，地球是早已存在的。其所以"特别惡毒"，不过是因为馬赫主义者只承認"世界是我們的感覚"的緣故。說世界只是我們的感覚，而事实上地球在我們出現以前的多少万万年就已經存在，这一命題和科学上的鉄証之間就不能不發生矛盾。如果你坚持主观唯心論的命題，那就只能閉着眼睛否認科学事实；如果你还願意承認科学事实，那就只有老老实实收起你的主观唯心論。梁漱溟在大談其沒有人就沒有物，沒有我就沒有宇宙的哲理时，并沒有敢提出地球在人类出現以前是否存在的問題，大約他已經意識到这个問題的"惡毒"。可是不管你提也好，不提也好，这問題，对于梁漱溟的哲学，正同它对馬赫主义一样，也是"特别惡毒"的迎头一棒。在这个問題面前，

在公認的科学事实面前，梁漱溟的主观唯心論也是無所遁形的。

从主观唯心論出發，梁漱溟当然否認对客观世界的認識的可能性。他以为"宇宙人生本是巧妙之極，而一般人却是蠢笨之極；各在極端，当然兩不相遇"。而能理解宇宙人生的巧妙的，只有"天才"："你有巧妙的头腦，自然与宇宙的巧妙相契無言，莫逆于心，亦不以为什么神秘超絕"（均見"朝話"，第161—2頁）。那么，誰是"天才"？"孔子，是千載不遇的"（"朝話"，第65頁）；次之就是王陽明；再次，大約就是梁漱溟了。

你看他的"眞理"論。他說："任何錯誤意見都含有对；較大的眞理是錯誤很少，最后的眞理是錯誤的綜合。錯就是偏，种种的偏集合起来，容納起来，就是眞理"。又說"眞理是通天下之見，是一切对或一切錯誤的总匯"（"朝話"，第56頁）。

梁漱溟在这里不是說明眞理，而是取消眞理。他把錯誤和正确混淆起来，消灭了是和非的界限，說什么眞理是"通天下之見"，这明明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客观标准的存在。

否定眞理，否定客观标准的存在，其目的是存心在讀者头腦中制造混乱，以便为他的主观唯心論开辟市場。所以他說，"标准是随人的，沒有一个絕对标准；此即所謂相对論。相对論是眞理，是天下最通达的道理"（"要义"，第101頁）。这就是說，張三有一个标准，李四也有一个标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这就是所謂"相对論"，这就是梁漱溟的"眞理"。

其实这并沒有什么新奇之处，馬赫主义者之流早就自称是相对論者。經典作家們对这种相对論也作过無情的駁斥。列宁指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辯証法無条件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并不归結为相对主义，就是說，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眞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們的知識之接近于这个眞理的限度是为历史所决定的意义上，承認我們的一切知識的相对性"。列宁并且指斥馬赫主义者的錯誤正是在于他們自認为"相对主义者"这一点上，"因为把相对主义作为認識論的基础，就是說不可避免地把自己或者是陷入絕对怀疑主义、不可知主义和詭辯主义，或者是陷入主观主义"（均見"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9頁）。梁漱溟否認客观眞理，强調相对論，正和馬赫主义者一样陷入了主观唯心論的泥坑。

主观唯心論否認宇宙的客观存在，当然也不承認宇宙間有任何規律可以認識，可以把捉。梁漱溟既然否認眞理，自然也否認科学。他鄙視科学，以为科学只是靜的机械的知識，是低級的东西。他推崇玄学，反对科学，尤其反对社会科学。他以为"生物有生命，即有其超于物質者在。生物愈高等，其生命愈强大，其离物質乃愈远。至于人，其生命之强莫匹，其超离于物，更不待言。……从生物科学到社会科学，所把捉愈少，所略去愈多，就愈不精确而难語于科学。社会科学只算得是'准科学'……"（"要义"，第305頁）。

科学，就其正常的意义說来，因为是从实际出發的，不能不帶有自發的唯物論成分。其遭到唯心論者的反对是很自然的。梁漱溟之鄙視科学，反对科学，是以柏格森的"生命論"作根据的。他在这里抓住了"生命"不放，把生命硬說成是超于物質的东西，人更是远远超离物質的"宇宙大生命"的"核心"。因而以为生命与人都是科学研究所不能处理的精神世界的事物。其实，生命并沒有什么神秘，它不过"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重要因素是在于与其周圍的外部自然界不断的新陈代謝，而且这种新陈代謝如果停止，生命也就随之停止，結果便是蛋白質的解体"（"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56頁）。这是恩格斯早在七十年以前就作了明确的論証的。至于人的精神意識活动，自从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动学說确立以后，也已获得了科学的說明。梁漱溟以为强調生命和人类的"超物質"現象，就可以把社会科学从科学領域中驅逐出来，殊不知無論生命現象也好，精神現象也好，科学早已証明并不能超离物質；而关于社会、社会發展的学說，早自馬克思、恩格斯以后就已成为完整的科学部門，并为一百年来的历史事变所証实。梁漱溟完全抹杀这些鉄一般的事实，妄圖在社会科学的范圍內打开一个缺口，以建立他的主观唯心論的文化史观，眞是太不量力了。

梁漱溟并不掩飾他的主观唯心論，自承"是釋迦慈氏之徒，不認客观"（"哲学"，第64頁）。可是他也覺得从主观出發总不大妙。他說，"人的心思，每易从其要求之所指而思索办法；观察事理，亦順着这一条綫而观察。于是事理也，办法也，随着主观要求都有了。其实只是自欺，只是一种自圓其說"（"朝話"，第43頁）。这一段話，梁漱溟当时是指責别人"为感情所蔽，不能靜心体察事理"而說的。其实，就我們看来，他这番話却正

好是夫子自道。梁漱溟的一切謬論，包括他的“文化三分法”和中国“特殊”論，無一不是从主观要求出發的。这些“事理”，这些“办法”，其实也“只是自欺”，只是自以为是的“一种自圓其說”而已。

二

梁漱溟还講究什么做学問的“方法”。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使用了所謂“四步法”；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四步法”却变成了“兩步法”。下文我們將分別談到这些“方法”的怪誕。現在先看他的“八步法”。

“八步法”是梁漱溟郑重地作为研究哲学的方法提出来的（見“朝話”，第157—176頁，“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一文）。这在当时是他“心里認为最要紧的話”，大約要算是他的半生治学經驗总結之类的东西吧。

他說自己二十余年所走的一条路，就是不知为什么“特别好用心思”，“爱留心問題”。其实好用心思、爱留心問題并不是坏事，問題在于心思是如何用法的。唯物主义者研究問題是从实际出發，从調查、搜集材料入手，充分占有材料以后，再从事整理，从事分析和綜合的研究，最后才作出判断的。唯心主义者却是从主观出發，將事物的假象或片面、側面的东西当作根据，加以腫脹，甚至自己制造材料作为論据，經过一番弥縫罗織，然后奔到預定的主观結論上去。正如列宁所說的，“哲学唯心論是把認識的諸特点、諸方面、諸界限之一片面地、夸大地、过度地發展（吹腫、脹大）为与物質和自然分离的、神化了的絕对”（“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第219頁）。这样的“用心思”，当然不能認識事物的眞相。而由于片面夸大的緣故，人的認識和事物的眞相只有越离越远，最后引导到僧侶主义的泥坑里去。梁漱溟的根本观点既然是主观唯心論，他的“方法”，他几十年来所走过的路，就只可能是通到僧侶主义的路。

梁漱溟以为“肯用心思所以有主見”，說“哲学家一定是極端的！甚么是哲学的道理？就是偏見！”“何謂学問？有主見就是学問”。“有所見便想把这所見貫通于一切，而使成普遍的道理。固执于其所見而極端排斥旁人的意見，不承認二或二以上的道理。美其名曰主見亦可，斥之曰偏見亦可”。而且这种偏見不怕淺薄，只要說出来“能动人就行了！他就能成他一派”。

这便是梁漱溟的“八步法”的第一步。他在这里公开揭露了自己的秘密。原来“哲学家”不是别的，不过是一、有偏見，二、把自己的偏見貫通于一切，三、固执这种偏見，極端排斥旁人意見，四、偏見不怕淺薄，說起来能“动人”就行。这眞是梁漱溟的現身說法！同时也不妨說是所有唯心論者的供狀。

偏見既然是片面之見，自然談不到反映客观事物的全面实际情况。偏見而从“好用心思”产生，尤其可能完全脫离实际，流于独断。在观察事物，研究問題时如果首先从偏見出發，起点一錯，其結果一定是一無是处的。看不到自己的偏，而極端排斥旁人，并硬要把偏見去貫通一切，这即使說起来“动人”，也不过是一种概念的游戏而已。

而且，偏見就是我們所說的主观主义，它除了来自無知，还来自阶級本能。尤其在社会科学領域內，偏見必然帶有濃厚的阶級性。梁漱溟在这里故意避开这一点不說，却要人存偏見，固执偏見，并把偏見貫通一切，这就是教人以自己的阶級偏見去代替客观事物自身的規律，去概括一切，說明一切，去从事反革命的阶級斗爭。他所極端排斥的“旁人”也不是别的，只是唯物論者和进步的民主主义者的代称。因为在梁漱溟的著作里，繁征博引，都不过是为了排斥攻击历史唯物論和革命民主主义。而所謂只要說起来“动人”，“就能成他一派”，其着眼也显然不在“学問”上。“偏”才能“超”，他站稳地主阶級的立場，要以自己的“一派”来和历史唯物論作战到底。

梁漱溟以为“有主見乃感覚出旁人意見与我兩样”，“而触处皆是問題”。“要自己有了主見，才得有自己；有自己，才得有旁人”。这是他的“方法”的第二步。

这一步是教人如何去發現問題。唯物主义者認为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問題。因此，要發現問題，就必須从事实踐，深入到事物內部去观察、体驗，然后才能發現其間的矛盾，才能提出問題。我們在实际工作中是如此，在研究工作中也只能如此。梁漱溟的办法完全不同。他不是从实踐着手，而是从偏見着手，固执自己的偏見来看人家的意見与他不同的地方，从这里来寻找問題，再进一步求解决。殊不知偏見既然是自己的阶級成見，在看待旁人意見时又始終以自己思想作主，这样比較来提出問題，問題的提法就不是实

事求是的。梁漱溟所以要这样作，不过是为自己的偏見加工，使偏見發展成为一套反动的思想体系。他把这样提出問題、解决問題称之为“求学問的生机”，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有自己，才得有旁人”，从“旁人”（即唯物論者）与自己的不同处看出問題，然后据以修补自己的偏見，并增添对于对方的攻击，这是一面。另一面就是他的第三步，即所謂“此后看書听話乃能得益”，“古人今人所曾用过的心思，我乃能發現而得到，以融取而收归于自己”。前者是从“不同”处“看出問題”，后者是从相同处寻求論据。

这里他所說的“看書听話乃能得益”，并不是取長补短，改正錯誤的意思，他只是將古今人思想中合乎自己偏見的材料抄襲过来，“以融取而收归于自己”，以糊裱自己的偏見。从他的著作中不难看出，他所“融取”的不是反动的封建思想的糟粕，便是腐朽的資产阶級思想的殘渣。因为物以类聚，正是这些东西才对梁漱溟有用，才能使他“得益”的緣故。

經过以上的东拼西凑之后，梁漱溟在第四步中提出了“学然后知不足”，要人“虛心”。怎么样“虛心”呢？“第一，担心他的出乎我之外；第二，担心我的出乎他之下”。他还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書就为了上面这兩个“担心”产生的。

“学然后知不足”是好的，“虛心”也是好的。只是他在这里提出的却明明不是虛心，而只是“担心”。“担”什么“心”呢？眞金不怕火，眞理愈辯而愈明。人家的見解对，可以改正你，即使不对，也可以提醒你，何必这样“担心”？原来他“担心”的不是别的，所謂“內”“外”也不是学术上的高低，而是指他在理論斗爭上的成敗。四十年来，梁漱溟費尽心机，要拼凑起自己的唯心史观体系，以与历史唯物論抗爭。可是，他自己所有的不过是一点偏見，一个以阶級成見为基础滚起来的雪球，而雪球是經不起推敲，見不得陽光的。这就無怪他要“担心”起来了。

从以上四步来看，我們至少可以归納出兩点。第一，梁漱溟在他的方法論中一点也不敢提到事实，說来說去还是“主見”，即“偏見”。因为他的“学問”是以个人的偏見作基础的，是远离实际，甚至完全違背实际的。而事实最雄辯，在事实面前，个人的偏見就立即显得黯然無光，梁漱溟的“路”就要一“步”也走不动了。第二，梁漱溟的“方法”显然不在于探求眞理，不在于眞正的認識問題与解决問題。从表面上看去，他的目的似乎只在“成一家”言，以标奇立异，欺世盜名，可是更深一層去看，就会發覺他“見聞思辨而外，大有事在”（“要义”自序）。不要以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眞是为了兩个“担心”而写出来的。無論梁漱溟說得多么“神秘超絕”，裝扮得多么玄妙，他的动机，以及这本書的实質，誰都可以看出是在于进攻科学，进攻历史唯物論，誘导人們离开革命，放弃斗爭，回到封建主义統治的黑暗时代去。从他的“理論”看是这样，从他的“方法”看也是这样。

經过了以上的四步，梁漱溟就以为“可以算成功了”：就可以“以簡御繁”，“举重若輕”，“很复杂很沉重的宇宙，在他手心里是异常輕松的”；說起話来“总不过一兩句”；“名詞便可用，可不用，或随意拾用”。这便是他的“方法”的第五步。“这时对于一切异說杂見都沒有摇惑，而身心通泰，怡然有以自得”，一切的問題都沒有了；而“旁人得失短長一望而知”；“自己說出来精巧透辟”；这是他的最后三步。

所謂“成功”了是什么意思，就是反动的“理論”体系已經拼凑起来了，牛角尖已經鑽到底了。这时要鑽也無可再鑽，只得回过头来，向外一看，原来世界是那么“小”，宇宙是那么“輕”，一切都是那么“簡單”。“如說当初覺得有什么，現在才曉得原来沒有什么”，一切問題都只要一兩句話便“解决”了。你問人类文化史么，他有“三分法”；你問中国的出路么，他便送上一套“特殊”論，要我們回到百年以前的“黃金时代”去。

梁漱溟所謂“以簡御繁”，“举重若輕”，“通了”，“透了”，实际上便是这样。他就是这样“解决”問題的。

原来所謂“学問”是这么輕而易举的事！就难怪梁漱溟要自我陶醉起来，“身心通泰，怡然有以自得”了。而所謂“旁人得失短長一望便知”，“自己說出来精巧透辟”者，就是在这种自我陶醉狀态下的幻覺。試想一个为阶級偏見、阶級感情所蒙蔽的人，如何能看得出旁人的長短得失？自己所有的只是一点偏見，即便鼓如簧之舌，也不过自以为說来“动人”而已，如何說得到什么“精巧透辟”呢！

总之，梁漱溟这条路是一条絕路。他自己在四十年前走上了这条路，直到今天还沒有完全走出来，

就是很現实的証明。作为方法論看，正如他所自承的，是“此路不通”的方法；作为他“一生劳攘”的經驗談，也只是“荒唐失敗”（見1951年10月5日“光明日报”“兩年来我有了那些轉变？”）的經驗。这也是我們批判了他的抽象的“八步法”之后所应該得出的結論。为了进一步了解他的具体的思想方法，我們还要就“文化三分法”加以分析。

三

“三分法”是梁漱溟的基本“理論”。这套理論是他比較“东西文化”的异同时制造出来的。作这种比較时，他着重講明的是“西方化”。他先將西方化的結論提出，然后环繞这結論分作四步論証。

“如何是西方化？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有了結論，然后“先从西方各种东西抽出他那共同的特异彩色，是为一步；复从这些特异的采色寻出他那一本的源泉，这便是二步；然后以这一本的精神攬总去看西方化的来历是不是如此，是为三步；复分别按之各种事物是不是如此，这便是四步”（“哲学”，第35—6頁）。

在“四步法”中，第二步应該是很重要的一步，結論——所謂“西方化”的“一本的源泉”正要从这里“寻出”。梁漱溟在第一步中“抽出”了“西方化”的“共同的特异采色”之后，本該就接着进行第二步的工作，从所謂“征服自然”、“科学精神”和“德謨克拉西精神”去寻找“西方化”的“一本的源泉”。他沒有这样作，却先把他所說的“唯物史观”加以歪曲，批評了一陣，接着就大談其“生活”，即所謂“現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奋斗”等等来了。談着談着，这时忽然凌空掉下了一套“文化三分法”的理論来，然后急轉直下地說，“从第一步所求得的西方文化的三大特异采色，去推看他所从来之意欲方向，即可一望而知他們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哲学”，第80頁）。“三分法”且留待下文去解剖，光就这“四步法”說，就梁漱溟的邏輯說，眞是好一个“一望而知”！就这么“一望而知”，“西方化”的命运就一言而定了。他在“八步法”中所謂“举重若輕”，“很复杂很沉重的宇宙，在他手心里是异常輕松的”，原来如此！

由此可見，所謂“四步法”也和“八步法”一样，完全是空話，是迷惑人的手段。既然在推論的重要一步中可以“一望而知”了事，那其余次要的三步更可以“一望而知”，論証的过程就毫無分成“四步”的必要。他所以还是要分成“四步”，要不是为了裝腔作势，好似他也懂得形式邏輯的样子，借以騙人，就是从“西方”的“共同的特异采色”实在推論不出那“向前面要求”的“根本精神”来，为了自圓其說，他只有急轉弯，“一望而知”是多么簡單而富有急救效用的一句話！

我們說“三分法”是凌空掉下来的，梁漱溟一定不服气。不过事实上他从“生活”、“奋斗”这些玄論，怎样也沒有說出为什么和如何“斗”出三个不同的“路向”来。原来他在具体論証“西方”时只能“一望而知”，論証中国只能“我可以断言”（“哲学”，第94頁），也就無怪在“抽象”“人类文化”时要运用先驗的独断了。

这就是“三分法”的来历。明白了这点，我們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它的本身了。

梁漱溟以为“东西文化”的不同，在于“人生态度”不同；“人生态度”的不同，在于彼此遇上了三个不同的問題，走上了三条不同的“路向”。近代“西方”遇到的是“人对物的問題”，采取“向前要求”的态度，因而成就了“第一路向”的文化；古代中国遇到的是“人对人的問題”，采取“調和持中”的态度，因而成就了“第二路向”的文化；古代印度遇到的是“人对自己的問題”，采取“厭离出世”的态度，因而成就了“第三路向”的文化。而“由于問題之深淺不等……人类文化表現，依之应有三期次第不同”（“要义”，第290頁）。

这是多么奇妙的“理論”，而其邏輯又多么混乱！

文化是什么？“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經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毛澤东选集”，第2卷，第688頁）。可是梁漱溟的“文化”却不是这样，它不論社会，也不論政治和經济，而是由“人生态度”所决定的“生活的样法”。这一“抽象”，就把文化这观念架空起来，成为虛幻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了。从而梁漱溟的文化史論証就只能在“态度”、“問題”、“路向”中打圈子：“态度”决定于“問題”，“問題”决定于“路向”，“路向”决定于“态度”。甚至反过来也可以說。这眞是玄妙而簡單的三連环！梁先生連文化究竟是什么也沒有弄明白，就凌空祭起这样的三連环，要和馬克思主义“对战”。

在阶級社会里，任何社会現象都必然帶有阶級的烙印。文化更不能例外。判断一个民族的文化，

首先要研究它的社会性質，看它处在社会發展的什么阶段，还要看这种文化屬于当时的統治阶級还是被統治阶級。梁漱溟把人类文化分成什么“西方化”、“东方化”的提法就是根本錯誤的。他把資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算在“西方”的范圍內；把近代資本主义社会和古希臘的奴隶占有制社会等同起来；說“西方”时截去中世紀一段，而說到中国、印度时則截去近代一段；并把孔家教义代表古代中国的文化，佛家教义代表古代印度的文化：这样的比較就尤其不能不混乱一团。可是这就是“三分法”的邏輯基础！

混乱显然还不止此。梁漱溟所謂“人对物的問題”和“人对人的問題”，其实是人类从其最初出現的那一天起就不能不同时碰到的問題。人要生活，就必須同自然打交道，向自然界寻求他的衣食資料，就必須生产。而人們的生产一开始就是社会的生产，并不是各个人孤立地进行的，他們在生产中必然發生相互的关系。“西方”如此，“东方”也如此，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梁漱溟却硬說什么近代“西方”遇到的是“人对物的問題”，而古代中国所遇到的是“人对人的問題”，好似在“西方”，人們彼此之間就不發生什么关系，而在中国，人們就沒有物質資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样。这难道有半点是合乎历史实际的么？

梁漱溟以“三分法”来对抗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論，他自称是以“流派观”反对“阶梯观”。可是說到头来，三“路向”又还是三“期”次，“流派”又变成了“阶梯”。这显然是自相矛盾，且不去說它。更奇怪的是，他以为人类文化發展的最高阶段是所謂“第三期文化”，即“厭离出世的人生态度”；說“人总是若明若昧地，或直接或間接地，傾向于出世，若不容已”（“要义”，第107頁）；說宗教对于人类生活不但“可能”，而且“必要”。他还以为“人类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要义”，第105頁）。照梁漱溟說来，宗教旣是文化的起点，是它的中心，也是它的終点。

“但是，一切宗教，不是別的，正是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們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們头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間力量的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論”，第333頁）。在历史的初期，宗教的产生是由于人的軟弱無知；而在阶級社会出現以后，宗教就成为剝削者的愚民工具，成为剝削制度的掩护，这时宗教的創設和發展都不过是人为的結果。归根到底，創造宗教的是人，而当人实际上能支配自然，并完全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时候，神話就必然消失，宗教就必然衰亡。如果在过去宗教对于人类生活曾經“可能”，那么，最近百多年来科学事業的飞躍發展和四十年来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这种“可能”就已經在消失。这就証明了梁漱溟所謂“人总是……傾向于出世，若不容已”，和所謂宗教对于人类生活的“必要”都是胡說，都是独断。而以为人类文化的过程是从宗教到宗教的謬論也就不攻自破了。

原来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蒲魯东先生旣探溯不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便給我們奉上一套怪論，奉上一套妄圖充当辯証怪論的怪論。他覺得沒有必要談到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紀，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像的云霄中發生，并且高高超越于时間和空間范圍的，一句話，这是黑格尔式的廢物；这不是平常的历史——人們的历史，而是神聖的历史——观念的历史”（“馬恩选集”，兩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中文本，第444頁）。对于梁漱溟的“文化三分法”的批判，馬克思在百多年前說过的这段話依然是很适宜的。

* * *

梁漱溟的“方法論”以及他在“文化三分法”中所运用的具体思想方法，大体說来就是如此。說来令人难信，四十年来，他就是以这样的本事，以这样的貨色在中国的学术界里活动，而且还曾迷惑过一些天眞的人。当然，所有这一切今天都已經在历史車輪的飞躍前进中压得粉碎了。

历史前进了，人民胜利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历史唯物論和阶級斗爭学說在这古老的国家里获得了鉄一般的印証。今天思想战綫上的任务是徹底打扫反动思想的殘余，以迎接学术上新的“百家爭鳴”时代的到来。至于梁漱溟先生呢，总也該从自己的小天地里鑽出来，为他的“一生劳攘”作出必要的結論吧。

中国哲学史講授提綱（初稿）（一）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编

这是我們教研室近来在“中国哲学史”这門課程中所用的講授提綱。原稿曾請校外同志，特别是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同志，討論和提意見。我們也已作了必要的修正。但是問題仍然很多，錯誤一定也还不少，請讀者們把宝貴的意見，告訴我們，以便作进一步的修正。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

第一部分　奴隶社会發展和崩潰时期唯物主义哲学的形成及其反对宗教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爭（先秦）

第一章　殷周奴隶制統治时期科学知識的萌芽及其与宗教世界观的对立（公元前十四世紀——八世紀）

第一节　殷和西周时代意識形态發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大約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前，在殷王朝統治的年代，中国已經进入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一部分的生产工具从石器过渡到銅器，形成了青銅器高度發展的时代。生产力得到了發展，畜牧業、农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活躍起来。奴隶主占有大量的耕种土地，强迫奴隶們（众人）在土地上进行集体耕作。

殷王是最高的奴隶主，此外还有大小不同的奴隶主分别統治各区域。在奴隶中也存在着不同的阶層，为奴隶主从事各种劳动。

伴随着社会經济的發展，殷代奴隶主和奴隶之間的阶級矛盾，日趋尖銳化。奴隶們时常起来反抗奴隶主。到了殷王朝末期，由于暴君紂王的野蛮的統治，終于爆發了規模較大的奴隶暴动，动搖了殷王朝的統治秩序。

大約在公元前十一世紀，西方周族的統治者，联合其它各部族，在战爭中依靠殷代奴隶部队的倒戈，推翻了殷王朝，建立起以周族貴族奴隶主为首的周王朝。

在周王朝統治初期，古代奴隶社会得到了發展。周代的奴隶制具有濃厚的宗法性質，是和家長制的氏族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奴隶主貴族是当时土地的占有者，土地轉移的方式主要是賜与而不是买卖。奴隶們在貴族的土地“籍田”或“公田”上进行集体耕作。奴隶主貴族还豢养了許多从事于手工業生产和商業的奴隶，工商業大部分控制在貴族的手中。

周代的奴隶社会也建立起以血緣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严格的世襲等級制度。在統治阶級中，按着等級成分的不同，分成了“王、公、卿、大夫、士”許多阶層，在被統治阶級中有奴隶和自由农民，奴隶們也被区分成不同的等級。每一阶級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拥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而且等級成分是世代相傳的。

殷周兩代都建立起巩固奴隶制生产关系的国家机器，奴隶主們拥有軍队，监獄和刑罰制度，用来鎮压奴隶和农民的反抗。这就是所謂“刑”。

在周代維持世襲等級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的工具就是“礼”。“礼”是貴族們按其等級成分所遵守的一定的生活方式，是从風俗習慣上維持世襲等級制度的社会規范和道德規范。

“刑”和“礼”是古代奴隶主用来巩固奴隶制的兩种重要的上層建筑，“礼”的作用在維持貴族之間的等級秩序，“刑”的作用在維护貴族們对奴隶和农民的殘酷統治。

周代也建立起奴隶主貴族專政。政权壟断在貴族的血亲集团手里，形成了“世官”和“世祿”的

制度。一般人沒有参加政治的权利。

周代的諸侯——大奴隶主——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每个貴族也都拥有自己的封地和奴隶，因此，周王朝实际上又是一个貴族割据和政权分散的国家。

在奴隶制的基础上，殷周兩代的文化生活得到了繁荣。

殷代創造和發展了象形文字，为古代中国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殷代的文字标志着古代文化的巨大成就，表現了古代人对自然現象和社会現象精密的观察能力。殷代的艺术也有惊人的成就，尤其是青銅器的鑄造，在世界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周代繼承和發展了殷代的文化傳統。从周代傳下来的古代統治阶級的政治文献（書）以及古代的詩歌(詩)音乐和舞蹈(礼乐)中，可以看出古代的学术、文学和艺术已經达到了相当高度的水平，它們对后来的古代中国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大的影响。

殷周兩代的文化是奴隶和劳动人民創造的。但是，古代的文化和知識，和社会的物質財富一样，壟断在貴族奴隶主阶級的手中，奴隶主們豢养了大批的知識分子和官方学者，为他們掌管各种学术和文物典章。他們是古代最初的天文学家、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和古代的宫廷詩人及音乐家。他們的工作也是世襲的，而且全部腦力劳动是为貴族們服务的。他們对古代文化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殷周时代出現的兩种对立的意識形态——科学和宗教——就是在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在当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影响下逐漸形成起来的。

第二节　殷周时代神話迷信的傳播和宗教世界观的形成

当原始社会發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極端低下，人們便产生了对周圍自然界和对自己本性愚昧無知的观念，出現精灵崇拜和自然崇拜等原始的宗教迷信。后来随着社会經济的發展，随着剝削現象和阶級的出現，在自然力量以外又加上了統治人們的社会力量，原始的宗教观念又获得了社会屬性，变成了剝削阶級奴役人民群众的工具。随着原始公社的瓦解和奴隶制的逐漸形成，作为氏族公社崇拜的氏族神，后来又轉变为部落神和部族神，最后轉变为單一的“全能”的神。古代中国宗教的形成正是按着这样發展的阶段进行的。

（1）**自然崇拜**　在殷周兩代傳流下来的文字記載中，保存了古代人对日月星辰、風雨、山川、社（土神）稷（谷物）、四方和各种猛兽崇拜的資料。他們把自然現象人格化、精灵化，看成为一种可怕的神秘力量，作为祭祀的对象。这是和当时的农業生产狀况联系在一起的。

（2）**祖先神**　殷代的宗教信仰，除自然崇拜以外，还把祖先当作具有人格意志的鬼神来崇拜。祖先崇拜的信仰起源于氏族公社成員对已經死去的領袖的追慕，是和氏族社会中血緣的宗法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但殷人的祖先崇拜已經具有了鮮明的阶級性質。他們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奴隶主的祖先——“先公先王”，并且把最高統治者殷王的远祖看成是殷族的部族神。貴族和僧侶們宣称，殷王的先祖在天国监視着人間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人們如果違反了奴隶主祖先的意志，就会遭到严重的灾难。商書記載殷王的話說：“失于政，陈于茲，高后（指先祖湯王）丕乃崇降罪疾”（盤庚）这种祖先崇拜的信仰是建立在相信死后灵魂不灭的思想基础上的，也是跟奴隶主的財产繼承和王位繼承的宗法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是为殷代的奴隶主服务的。殷代的祖先崇拜也体現了等級制度的精神，祭礼祖先是奴隶主的特权，奴隶們沒有祭神的資格。

（3）**上帝**　殷人在祖先崇拜的基础上又建立起“統一之神”的信仰。他們相信在天上存在着一个具有人格和意志的最高神，主宰着自然和人类的命运。他們把这个最高的主宰称为“帝”或“上帝”。他們認为“上帝”的意志不仅决定着气候的变化和农業生产的收获，而且决定着国家的政治事件和軍事行动。卜辞記載說：“帝不令雨”，“帝其降堇(饉)”，“伐邛方，帝授我佑”。奴隶主們宣称他們認为上帝能降給人灾害，因而人对上帝的意志只有絕对的服从。卜辞說：“帝其降禍”。他們对奴隶們說，如果不服从国王的命令，“上帝”就要处以極端殘酷的刑罰，使人們短命早死（見商書，高宗肜日）。殷人所崇拜的“上帝”具有着凶暴殘忍的性格。

殷代所信仰的“上帝”可能从部族神轉变而来。“上帝”观念的形成反映了当时已經出現了各部族联合的統一的帝国。恩格斯說：“沒有統一之君，就永远不会有統一之神”，“唯一神”的概念“只是統一的东方暴君的副本，这个暴君在表面上或实际上統一着各自的利益而互相冲突的人們”。殷代的“上帝”正是地上最高統治者殷王的統治力

量在人們思想上的反映。殷代的宗教观是奴隶主貴族阶級用来压制奴隶反抗的思想武器。

殷人相信人和上帝、鬼神可以溝通消息的，而探听鬼神意志的媒介就是“龟卜”。他們用“卜”来預測生产活动和政治活动的成敗。“龟卜”的迷信支配着殷人的全部生活。殷代的奴隶主們正是依靠这种原始的宗教迷信来巩固他們对奴隶的殘酷統治。

* * *

周代的貴族繼承了殷代的宗教信仰，而且在反对殷代奴隶主的政治斗爭中，發展了古代的宗教观点。

（1）天和天命 周人所崇拜的最高的人格神称为“天”或“天帝”。他們所信仰的“天”已經摆脫了祖先崇拜的性質，成了超自然的，超部族的宇宙中最高至上的主宰。周初貴族們宣称，上帝是历史上和世界上一切民族的統治者。他們說：“帝命率育，無此疆而界”（詩經，周頌，思文）。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意味着周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应当成为各諸侯国家的盟主。

周人把上帝的意志和命令称为“天命”。周代的貴族和僧侶們認为，自然和社会的秩序都是上帝安排的，等級制度和道德規范是上帝制訂的；奴隶主們的政权、土地和人民以及他們的聪明智慧和寿命也都是上帝所賜与的。周書說：“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及)厥(其)疆土于先王，……先王受命”（梓材）。在他們看来，世界是按着上帝的意志發展的，人們的行为应該以上帝的意志为准則。他們宣称，人們如果違反“天命”，上帝就要“疾畏降丧”，使人們遭到处罰，这是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是为巩固周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服务的。他們所謂“天命”实际上就是国王的命令和意志，是奴隶主貴族用来奴役人民群众的工具。这种宗教的世界观是古代中国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态，是周代貴族文化的核心，而且一直成了古代中国唯心主义哲学的支柱之一。

（2）天子 周代貴族在宗教世界观的基础上又建立起神权政治的理論体系。周代的統治者宣称，他們是上帝的長子——“天之元子”，受上帝的命令来管理地上的人民，認为帝王只对上帝負責，政权就是神权的体現。他們企圖利用人們对上帝的迷信来論証自己奴役人民群众的合法性。

（3）“天命靡常 周初的貴族在反对殷王朝的政治斗爭中又提出了“天命靡常”的理論。認为上帝并不是無条件的和永远的把政权賜給某一个統治者，上帝对他的代理人——“天子”——是要經过选擇的。地上的統治者是可以改变的。“詩經”說：“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雅，文王）。他們把王朝的的兴廢和政治历史的演变看成是“受命”和“墜命”的交替过程。周初的貴族就是借用这种理論来論証他們夺取殷王朝政权的合理性。

（4）明德保民 周初的貴族又根据“天命靡常”的理論提出了“明德”和“保民”的政治观点。在殷代奴隶暴动的刺激下，他們認为統治者要取得上帝的信任从而保持自己政权的長久，首先要“敬念天畏”和尊守祖先的遺訓，还必需“勤劳”“勿逸”，对人民群众施些小恩小惠，要謹愼刑罰，知道“小人”（指自由民）的苦痛，使人民能够过着比較安靜的生活。他們特别指出，人民的生活情况是上帝考驗統治者的一面鏡子。他們說：“人無于水监，当于民监”（周書，酒誥），認为如果对人民进行过分地杀戮和殘暴的奴役，就会有丧失政权的危險。他們吸收了殷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訓，借用上帝的名称，从而提出了这种緩和阶級矛盾的統治政策。这种观点对周初的社会經济的恢复起了一些积極的作用。

周初貴族和僧侶們所提出的宗教世界观和神权政治理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作为向殷王朝統治者夺取政权的思想武器；一方面作为巩固自己內部統治势力的工具。殷周之际的政治斗爭和奴隶暴动就是周代的宗教观点和政治观点發展的泉源。

周代的神权的政治理論对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發展起了很大的影响，一直成了历代帝王統治人民群众的理論根据。在“書經”中保存下来的西周的古代統治阶級的政治文献，变成了历代統治者所尊奉的神聖的經典。后来封建社会的某些思想家們也都把这种理論奉为“正統”，为巩固旧制度和封建政权而服务。

第三节 殷周时代科学知識的萌芽

殷周时代也产生了古代中国的科学知識，跟神話和宗教迷信逐漸对立起来。当时生产力的發展，尤其是农業生产和手工業技术的进步，就是殷周兩代科学知識产生的物質基础。

（1）农業和手工業技术 殷周兩代已經知道种植各种农作物，而且在栽培的方法上已經积累了不少的經驗。殷代已經知道使用肥料。周代創造了

輪流休耕的“三圃法”，提高了农業生产力。殷周兩代的青銅器的制造，标志着古代手工業技术的巨大进步。

（2）**天文学** 中国古代最早發达起来的自然科学就是天文学。恩格斯說：“單單为了定季节，游牧民族和农業民族就絕对需要天文学”。殷周兩代的农業生产进步促进了当时天文学的初步發展。为了便利进行农業和牧畜業生产，殷代創造了陰陽历并用的历法，以三百六十天为一年。并且發明了十二干支記日的方法。而許多干支的名称也是和当时生产工具和生产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殷代历法的出現，說明了古代人已經具有相当准确的时間观念，对殷代的社会政治生活起了重大的影响。

殷周时代天文知識的另一貢献，就是对月日星辰等天象进行了观測。殷代已經依据黃昏星宿的出沒确定春耕的季节。周代已經知道二十八宿的星辰名字并用来推算四季的变化。在甲骨文和周代的典籍中保存了世界上最早关于日蝕和月蝕的記录，而且周人把月蝕看成是不足为奇的現象。古代的統治者都把观測天象看成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天文知識發展的需要促进了古代人从事于数学的研究。殷周兩代的数学知識也有了进展。从殷代的历法中可以看出当时人們早就采用了十进位法。中国古代数学知識的發展是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

殷周时代科学知識的萌芽标志着古代中国文化的进展。这个时期的科学知識还沒有完全摆脫宗教迷信的束縛，例如当时的天文学还是和古代的占星术結合在一起。但是，这些科学知識的萌芽，說明了古代人在生产斗爭中努力去理解和研究自然現象，并且企圖掌握自然的規律为人們的生产服务，这种精神实际上包涵着一种自發的唯物主义因素，包涵着对宗教迷信否定的傾向。古代中国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念正是在殷周兩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学發达的影响下形成起来的。

本章参考文件

（一）恩格斯：論古代宗教观念的形成和發展——“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第64頁），“反杜林論”（第410頁），“給馬克思的信”（1846年10月）。

（二）关于殷周时代宗教信仰的史料——“盤庚”、“康誥”、“召誥”、“無逸”（“書經”），“文王”、“思文”、“皇矣”（“詩經”）。

（三）关于殷周时代宗教思想的分析，参看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發展”（青銅时代）。

第二章 春秋时代奴隶制的沒落、古代無神論和唯物主义观点的产生（公元前八世紀—五世紀）

第一节 春秋时代进步哲学思想發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到了公元前八世紀，中国奴隶社会开始發生了变革。各地方的經济逐漸繁荣起来。春秋中叶以后，鉄制的生产工具开始出現，耕种的方法得到了改进，提高了农業生产力。在农業生产进步的基础上，工商業得到了發展。

在这个时期，土地占有制度發生了变化。私人开辟的土地，逐漸增加，土地所有权逐漸从貴族奴隶主的控制下解脫出来。有些諸侯国家实行了新的“稅亩”制度，公开允許土地兼并和土地分割等行为，許多貴族的附庸也获得了私有土地。

由于社会經济的向前發展，阶級矛盾和阶級斗爭更加尖銳了。在奴隶主阶層之間进行着激烈的斗爭。各諸侯国家統治势力展开了土地兼并和掠夺劳动力的战爭。这些国家統治势力內部，統治阶級上層和下層之間也进行着掠夺土地和夺取政权的斗爭。在斗爭中，許多貴族丧失了政权和土地，許多統治阶級中下層人物取得了政治上的实权。

这个时期，剝削者与被剝削者之間进行着尖銳的斗爭。統治阶級間長期兼并战爭的結果，加重了人民的負担，自由农民和其他小私有者阶層遭到了破产，到处流亡。許多地方發生暴动，进行反抗奴隶主貴族的斗爭。手工業生产奴隶和其他奴隶跟貴族們也进行着斗爭。这样，就使古代奴隶制生产关系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春秋时代的阶級斗爭加速了古代阶級分化的过程。一部分奴隶主貴族开始沒落，有的变成了自由农民，甚至下降为奴隶。过去受奴隶主貴族压制的社会下層群众，有的成了統治阶級中的官吏，也有个别上升为貴族。这样，就动摇了世襲等級制度所規定的阶級秩序，引起了旧貴族統治势力的危机。另一方面，伴随着土地私有化的加深和工商業的發展，社会上出現了新兴的財富占有者。他們是从統治阶級下層和小生产者中逐漸分化出来的、新的土地占有者和富商大賈，其中还有的参加了当时的政治活动。一部分奴隶主貴族，为了在兼并战爭中保持自

己的政权，被迫放松了对农民和工商業者的控制，并且部分地釋放了奴隶，社会上出現了大批的自由貧民。这就为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准备了前提。

随着新的社会經济因素的萌芽，在某些諸侯国家也出現了某些新的政治措施和政治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訂和公布了成文的法律。这个措施实际上是以法律的形式保护新兴的財富占有者的利益，防止旧貴族的特权，从而引起了旧世襲貴族奴隶主們强烈的抵抗。

春秋时代社会經济的变化引起了古代文化生活的变革。过去为貴族阶級所独占的知識和文化开始在民間和社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傳播。随着貴族阶級的沒落，过去为奴隶主們所豢养的知識分子和官方学者开始流落到民間；同时，从小生产者阶層中又滋長出一批知識分子；这样，社会上就逐漸形成了販卖文化知識和技能但也依靠統治者生活的"士"阶層。他們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艺，統治者很需要他們提供各种办法以巩固自己財产权和統治权。因此，社会上就出現了專門訓練和培养"士"的大师和集团，促进了古代中国最早的学术流派的产生。因为"士"所服务的对象各有不同，所以他們便成了当时各阶層在思想上的代言人。他們对古代中国学术思想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春秋时代也是古代中国科学知識初步發展的时期。农業生产的需要促进了水利和灌溉事業的發达。手工業的發展促进了器具制造技术的提高，出現了著名的机械制造專家。在"周礼""考工記"中保存有这个时期的丰富的手工業生产的知識。在天文学方面也有着重要的成就。这个时期改进了古代的历法，發現了十九年七閏的方法，調和陰陽历。人們用土圭測量日影来推算冬至和夏至的日期，并且采用了岁星紀年法。这时对天象的观測有了显著的进步。在古代最早的一部編年史書——"春秋"——二百四十年中，記載了三十七次日食的时間，其中也保存了世界上第一次关于哈雷彗星出現及其軌道的記录，还包括着世界上最古的关于流星群發現的記載。这个时期人們对五大行星的运行也进行了初步的观測。这是古代天文学家經年累月辛苦考察天象变化的劳动結果，对古代文化思想的發展起了一定的影响。

奴隶主貴族統治秩序的开始瓦解和文化科学的进步，引起了古代社会意識形态的变革。西周以来的宗教的世界观和旧信仰的支配人們的作用开始动摇了，反映新事物的新观念逐漸形成，統治阶級內部进行着新旧思想的斗爭，在古代思想界醞釀着啓蒙运动。

新观念要求摆脫原始宗教迷信的束縛，独立地去思考和探求自然和社会所發生的一切現象，要求建立新的社会政治观点，要求对旧文化和旧制度进行新的估价。这样，就促进了古代中国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产生。

这个时期出現了許多进步的思想家、詩人和学者以及著名的政治家。他們反映了当时新兴財富占有者的利益和小生产者的要求，向代表旧世襲貴族势力的意識形态进行了斗爭，他們是古代中国啓蒙思想的先驅者，对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形成尽了前驅的作用。

第二节　西周末年以来进步思想家对古代宗教信仰的批判

（1）西周末年傳統信仰的动摇　西周末年以来的社会政治的变化和阶級斗爭，首先在古代詩人的思想中得到了反映。在古代傳留下来的最早的一部詩集——"詩經"——中保存了这个时期的史料。

由于小生产者生活的破产，古代的民間詩人对貴族們的压迫和剝削进行了抗議。他們指出貴族（君子）和人民（小人）是彼此对立的，貴族不劳动但过着享乐的生活，而人民終日劳动却得不到休息和温飽，这是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他們斥責貴族們"不稼不穡"是不劳而食的寄生者，并且要求摆脫貴族們的榨取，寻找自己理想的"乐土"。

他們对奴隶主貴族的殘暴統治也提出了抗議。指出統治者彼此互相傾軋是国乱民貧的主要原因，而人民群众对統治者的怨恨和咒駡，是統治者殘酷奴役和压迫的結果。他們認为善良的国君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而暴虐的君主自然要被人民所唾弃。"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維彼不順，自独俾臧；自我肺腸，俾民卒狂！"（大雅，桑柔）他們把当时的政治黑暗和人民所遭到的天灾和人禍，归結为統治者的暴虐，并且把人民群众的反抗看成自然的事情。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意义，是古代中国社会中最早具有民主性的进步思想。

这个时期富有正义感的詩人們，从对社会上統治者的攻击，轉向对上帝的批判。他們揭露了奴隶主貴族把上帝說成是具有善良品質的虛伪的欺騙，認为上帝是暴虐的，邪僻的，是不誠实和不同情人民

的痛苦的。他們說："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大雅，蕩），"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小雅，雨無正）。"天命不徹"（小雅，十月之交）他們認为上帝已經丧失了正直公平的意志，变成了沒有头腦的糊塗东西，否認了上帝的道德屬性。他們也駁斥了把人民的痛苦遭遇說成是上帝降予的迷信，他們說："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小雅，十月之交），認为社会的灾难是人自己造成的。

古代詩人們对上帝的咒罵和憎恨，是当时被压迫阶層对地上的統治者仇恨和憎惡的反映。他們并沒有因此否定上帝和鬼神的存在，但却严重地打击了宗教信仰的威权。

在古代的"詩經"作品中，存在着兩种对立的文化傳統——貴族文化和被剝削群众文化的傳統。进步的詩人們以生动的文学語言表达了当时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渴望自由的心情。他們的作品不仅是古代中国現实主义文学傳統的典范，而且是中国思想史上宝貴的和富有人民性的文化財富。

（2）对鬼神和灾异的怀疑 在"左傳"和"国語"这兩部著名的古代历史著作中，也保存了春秋时代进步的思想和唯物主义的史料。

这个时期在統治阶級中出現了一批进步的和开明的貴族知識分子和官方学者，对西周以来的旧信仰和原始的宗教迷信也进行了批判。

有人認为盲目地依賴鬼神是得不到幸福的，神所重視的是人的道德品質。他們說："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左傳庄公三十二年）。又說："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左傳僖公五年）。郑国的大政治家子产認为人的疾病是由"飲食哀乐"所造成的，与鬼神沒有任何关系。士伯指出，用鬼神的权威，来为自己的行为作辯解是十分錯誤的。他說："薛征于人，宋征于鬼，宋罪大矣"（左傳定公六年）。他們以"人"的立場否認了鬼神的威权。不仅如此，他們也駁斥了精灵崇拜，反对祈禱、咒术和卜筮等各种原始的迷信。有人認为所謂"妖异"只是自然現象的"反常"，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神秘东西，伯宗說："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左傳宣公十五年）。魯国的开明貴族臧文仲認为只要人們努力从事于农業生产和节約財富，就可以預防天灾，与"巫"沒有关系。他說："修城郭，貶食省用，务穡劝分，此其务也，巫尪何为"（左傳僖公二十一年）。齐国的政治家晏嬰指出，国君生病是由于"縱欲厭私"和"斬刈民力"的結果，祈禱也是無用的。他認为虽有"善祝"，也抵抗不了千百万人民群众对統治者的詛咒。随着天文学的进步，人們对占星术的迷信也發生了怀疑。他們指出天象的变化并不能决定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子产提出了"天道远，人道邇"的著名的見解，根本否認了占星术可以預測人間命运的幻想。

这个时期的啓蒙思想家們，从現实的生活的教訓中，逐漸意識到原始宗教迷信的虛幻，要求人們摆脫迷信观念，集中人的力量，改善人間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这在当时具有重要历史的意义。社会产生的向前發展和人民群众不断地反抗，是迫使当时剝削阶級的进步思想家抛弃原始宗教迷信的基本原因。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們沒有明确地否認鬼神的存在，相反的，有些貴族分子对宗教迷信进行了新的解釋，企圖从維持社会秩序的观点来論証祖先崇拜的必要性。他們对宗教迷信的批判是不徹底的。但是，他們把人的道德实踐、政治实踐和生产实踐活动提到了首要的地位，把鬼神降到次要的地位。他們对宗教迷信的批判是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發的，他們的观点，标志着古代中国無神論思想的萌芽，对这个时期唯物主义观念的形成尽了前驅的作用。

（3）重民的政治观点 这个时期进步的思想家对代表旧世襲貴族奴隶主利益的社会政治观点，也进行了批判。他們首先对神权政治的理論进行了修正。認为对于保持貴族的政权，"神"和"民"是同等重要的，而且"神"是依賴人民的意志进行活动的，如果沒有人民群众进行劳动生产，"神"就不可能享受丰美的祭物，因而国君也得不到鬼神的祝福。他們指出，統治者必須首先使人民能够过着幸福的生活，然后才有資格事奉鬼神。季梁說："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傳桓公六年）。他們認为抛弃人民而只崇拜鬼神，必要丧失政权。这正意味着西周以来神权政治的开始沒落。

这个时期也有人認为国君应該把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看成自己的利益，政权才能巩固，認为"命在养民"。郑文公說："苟利于民，孤之利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傳文公十三年）。有人指出暴虐和过分剝削人民的統治者的地位是危險的。而"厚施"于民的統治者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楚語記載令尹子文的話說："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厚）也，死無日矣"（国語）。魯国的史墨总結了历史的

教訓，認为政权和貴族們的祿位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已然”，指出对待人民的态度是統治者取得和丧失政权的主要关鍵。这些观点实际上等于否認了把政权的起源归結为“天命”的理論，打击了世襲的等級制度。

这些进步的政治观点，是和当时激烈的阶級斗爭联系在一起的。統治阶級間的兼并战爭，造成了广大小生产者的破产，人民群众的暴动不断地發生，使当时統治者的經济来源和軍队的补充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这样，就使其中的进步政治家和思想家把人民看得比鬼神更为重要，迫使他們不能不怀疑神权政治的理論。劳动人民对貴族們的反抗是这个时期政治观点进步的泉源。先进的政治观点，也是和当时新兴的財富占有者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4）**重利的倫理傾向** 这个时期也出現了一些新的社会倫理傾向，与旧貴族的宗教道德規范相对立。有人認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質財富的利益。但是，他們認为盲目地追求物質利益，反而得不到“利”的效果，于是又用“义”的道德規范，限制人們过分地积累財富，从而保持个人財富的永久，晏嬰說：“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左傳襄公二十八年）。他們把“利”和“义”結合起来，認为“言义必及利”。他們把道德看成是保持个人利益的工具。这是不正确的。但是，他們不用神的意志来說明行为和道德的起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同样具有啓蒙的意义。这种观点是和当时新兴的土地占有者和工商業者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本节参考文件

（一）馬克思論对宗教的批判——“黑格尔法权哲学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

（二）关于这个时期进步詩人思想的参考史料——“大东”“北山”，“何草不黃”，“伐檀”“碩鼠”，“桑柔”，“节南山”，“板”，“蕩”，“雨無正”，“十月之交”（以上見“詩經”）。

（三）关于这个时期进步思想家思想的参考史料——宫之奇論“鬼神”（左傳僖公五年），子产論“山川日月之神”（左傳昭公元年），士伯論“鬼”（左傳定公元年），臧文仲論“巫尪”）左傳僖公二十一年），晏嬰論“祝”（左傳昭公二十年），子产論“天道”（左傳昭公十七年），观射父論“祭祀”（国語楚語下），季梁論“民神”（左傳桓公六年），史嚚論“民神”（左傳庄公三十一年），郤文公論“利民”（左傳文公十三年），晏嬰論“厚施于民”（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斗且延論“庇民”（国語楚語下），里革論“君民”（国語魯語上），驪姬論“亲众”（国語晉語），史墨論“社稷”（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芮良夫論“利”（国語周語上），晏嬰論“富”（左傳襄公二十八年），丕郑論“义利”（国語晉語一）。

第三节 古代原始唯物主义的产生

由于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發展、阶級斗爭的激烈化、人們对自然作用的加强和科学知識的进步，产生了古代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萌芽。这个时期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以原始的、自發的和極其朴素的形式表現出来的，而且和当时的啓蒙思想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它們都企圖从自然界本身所固有的現象去說明自然現象的变化，从而跟上帝鬼神支配世界和人类命运的神秘論对立起来，并且跟宗教迷信进行了斗爭。

（1）**五行** 古代思想家首先提出了“五行”的观念，用来說明事物構成的物質因素。“五行”最初的意义是指生活中常見的和不可缺少的五种物質形态——“水”、“火”、“木”、“金”、“土”，因此，古代人又称为“五材”。“五行”观念最初見于“尙書”中的“洪范”篇。在这篇較早的著作中，对五种物質形态的性質和作用作了簡單地說明，認为“水”具有“潤下”的性質，产生“鹹”味；“火”具有“炎上”的性質，产生“苦”味；“木”具有“曲直”的性質，产生“酸”味；“金”有被鑄成不同形狀的性質，产生“辛”味；“土”可以用来耕种，产生“甘”味。在这些論点中包含了原始的唯物主义的萌芽，他們把客观存在的物質看成是眞实的东西，而且自發地意識到人的味覺是依賴于外在的五种不同物質的性質。这是古代人从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踐中形成起来的唯物主义观点，对后来古代哲学思想的發展起了一定的影响。

在春秋时代，还沒有开始的时候，“五行”思想得到了發展。有些思想家認为“五行”是自然界所固有的五种物質現象，是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而且开始用“五行”来說明各种物品形成的物質要素。郑国史伯認为“土”和其它四种物質相配合，便产生各种各样的人造的事物，而“五行”所以能够产生“百物”，是因为它們具有各种不同性質和作用，他說：“先王与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語、郑語）。依据这种观点，他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繼”的学說，認为异質异性的

东西相結合是事物形成的基本法則，他說："以它平它謂之和，故能丰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同上）。在这些观点中，同样包涵着原始的唯物主义和自發的辯証法思想的萌芽。他們用自然界五种不同物質的配合来說明事物的起源，而且認为事物的形成必須依靠多种多样的物質因素。但是，他們所强調的却是不同因素的調和，認为調和是促成事物完美的必要条件。他們把这种观点，应用到政治实踐上，認为君主应該采納跟自己相对立的意見，而臣宰也应該提出与君主相对立的見解，才能把国家的事情办好。晏嬰对齐侯說："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是以政平而不干(犯)，民無爭心"（左傳昭公二十年）。这种理論的实际意义就是一方面用来削弱当权貴族的統治力量，一方面用来調和統治阶級內部的矛盾，从而巩固对人民群众的統治。

（2）**陰陽** 这个时期也有些思想家提出了"陰陽"的观念来說明自然現象变化的原因和法則。"陰陽"最初的意义是指日光的向背，詩經說："相其陰陽"（大雅，公刘），后来人們用来表达日月和晝夜的差别，及其互相依存和互相消長的現象。古代的天文学家又經常用"陰陽"观念說明日月运行和四季变化的过程。例如，越語記載范蠡的話說："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語）。他們看到日月的运行和寒暑的变化是按照一定秩序进行的，从而把这种規律性的自然現象称为"陰陽有序"，如果發現这些現象的变化沒有按着人們已經知道的秩序进行，便認为是"陰陽失調"。"陰陽"观念是跟古代的天文学知識緊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时期的唯物主义者从天文学知識中吸取了"陰陽"的观点用来解釋一切自然現象变化的根源。他們把"陰陽"看成是自然界兩种对立的物質势力。例如，伯陽父認为"陽"的势力受到了"陰"的势力的压迫而不能显示它的作用，因而产生了地震。他說："今三川实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韋氏解：国依山川，今源塞故国將亡也）"（国語、周語上）。他实际上是用陰陽兩种物質势力互相排挤和消長来說明自然現象变化的原因。这是一种原始的唯物主义观点，是跟用上帝和鬼神的"震怒"来說明自然界灾异現象的迷信观念相对立的。因此，当时有人依据这种观点，根本否認了精灵崇拜的宗教迷信。史官叔兴認为自然界所發生的反常的現象是"陰陽之事"，与人間的吉凶禍福沒有任何联系，人世間的禍福是人自己所造成的，他說："吉凶由人"（左傳僖公十六年）。这种观点，实际上意味着是認为自然界的灾异是自然本身固有的現象，沒有什末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在支配着，因而也就不能决定着人的命运。古代最初的"陰陽"学說又是在跟原始宗教迷信的斗爭中形成起来的。"陰陽"观念对后来唯物主义的發展起了很大的影响。

（3）**天地** 这个时期开始有人用"天地"本身来說明万物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他們摆脫了宗教的信仰，把"天"理解为自然的一部分，用来象征天空的世界，把"地"理解成与天空相对立的地上的世界，認为各种天象和气候是从"天"产生的，各种动植物是从"地"产生的。他們特别指出人类生活和"天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地"是人和社会存在的基础。有人認为人的生活并不是上帝安排的，而是依靠"天地"形成起来的，范蠡說："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国語、越語）。郑国子产把人的感覚和情感看成是起源于"天地之性"，認为人的"好惡喜怒哀乐"是效法六种不同的天时現象，而人的五种不同的味覚和声音又是效法五种不同物質的屬性。他說："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發为五色，章为五声"（左傳昭二十五年）。他們甚至認为国家的政权，社会的等級秩序和家族制度以及維持这些制度的規范——"礼"也都是依据"天地"的法則树立起来的，楚語記載范無宇的話說："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国有都鄙"（国語）。他們把客观的物質世界——"天地"——看成是一切事物的根源，表示当时人們已經把自然看成是对人类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种思想傾向是跟神創造世界的宗教唯心主义相对立的。他們企圖用自然現象来解釋社会現象，这是帶有自然主义傾向的世界观。但这种观点：在当时神权世界观占統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啓蒙的意义。

这个时期也有人注意到人和自然的关系。代表新兴大商人利益的思想家范蠡提出了"聖人因天"的学說，認为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必須和自然界的变化相配合，才能取得成功。他說："人事必將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国語、越語）。在他看来，自然条件的成熟对人类各种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說："天时不作，弗为人客"（同上），指出人們必須先知道"天地之恒

制”，然后才能获得“天下之成利”，实际上是叫人們按着自然界的規律去行动，从而取得对人們更多有利的成果。他曾經教导当时的大商人应該利用天时变化的規律，掌握时机来进行投机性的商業活动。

（4）**天道** 这个时期人們又提出了“天道”的观念，企圖說明客观世界变化的規律性。“天道”最初是古代的占星术者所使用的术語。他們把星辰运行的軌道和周期及其与人世間的吉凶禍福的关系，称为“天道”。例如古代占星术者萇弘說：岁（木星）及大梁，蔡复楚凶，天之道也”（左傳，昭公十一年），依据木星十二年繞天一周，断定人事的吉凶。但古代的占星术者同时也是古代的天文学家，“天道”的內容，实际上包涵着天体运行的軌道和用来推測吉凶的兩种因素。到了春秋时代，由于人們对自然界認識的加强和原始宗教迷信的动搖，占星术的信仰开始遭到了批判，“天道”观念中的迷信成分逐漸消失着。这样，“天道”便具有了客观規律性的意义。当时的天文学家經常用“天道”来表示天体运行的客观法則。范蠡曾經把“天道”看成是日月运行周而复始的不变的規律，他說：“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国語，越語），認为“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就是“天道”的內容。“天道”观念是和古代的天文学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从天文学中吸取了“天道”的思想，用来說明各种現象变化的总的規律。他們認为不仅天体現象，其它一切自然現象，甚至人类社会現象，都是处在不断变化和运动的过程中，世界上沒有“可常”的現象。他們指出，事物变化的过程，如同日月的运行一样，从盈滿轉向虛亏，从而从兴盛轉向衰亡的过程。史墨認为高山可以变成深谷，深谷可以变为丘陵，貴族可以变成百姓，这就是“天之道”，是自然变化的必然規律。他們提出了“盈而蕩”和“盈必毁”的“天道”观，来論証某些国家的政权走向衰亡的不可避免性。例如，邓曼說：“王祿尽矣。盈而蕩（散）天之道也”（左傳庄公四年）。伍子胥說：“盈必毁，天之道也”（左傳哀公十一年）。不仅如此，也有人認为各种事物本身都包含着缺点，美玉隐藏着瑕疵，国君应容忍着瞞怨，也是自然的規律。当时伯宗引証諺語說：“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天之道也”（左傳宣公十五年）。这些观念是和把事物看成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相对的。它們肯定了事物發展的客观規律性，并且企圖把变化理解为对立轉化的过程。这是具有辯証法因素的發展观，首先是当时天文学家从天象变化的規律中总結出来的。恩格斯說：“辯証的思維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着的在对立中运动的反映而已”。这些辯証的观念，也是当时社会上激烈的阶級斗爭在人們头腦中的反映。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对立中的运动在一切先进民族的一切批判的时代中表現得特别显著”。这个时期的“天道”观，对后来老子哲学思想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影响。

（5）**水** 这个时期也有人提出了“水”是万物根源的学說。“管子”書中的“水地”篇，保存了这方面的史料。这篇的作者認为“水”是万物的始基，“水”不仅是無机物形成的基础，也是一切生物發生和成長的泉源。他們說：“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在他們看来，草木得到了“水”，就会長得茂盛，鳥兽得到了“水”，就会長得肥大。他們特别指出，“水”的最精华的部分凝集起来就形成了人，人的“九窍五虑”都是从“水”产生的。他們甚至認为人的体質、容貌、性情和道德上的品質也是由于“水”的性質不同所决定的。他們說，汚濁的水使人愚笨，清凉的水会使人簡易和正直。因此，他們認为“水”是治理国家和教化人民的关鍵。他們說：“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樞）在水”。这是一种原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們提出了关于世界的統一性的問題，而且唯物主义地处理了这个問題。他們意識到世界的始基是物質性的，世界就是原始的物質变化和轉化的过程，不过，他們所寻找的物質的基础，却是物質的个别形态——“水”。他們的缺点就是把物質和物質各别形态混为一談，这是古代的原始唯物主义的共同特点。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种唯物主义，在其發展的最初阶段極其自然地認为具有無限多样性的自然現象的統一是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寻找这种統一，就如泰勒斯在水里寻找一样。”这种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产生，也是由于当时农業生产向前的發展，使人們認識到水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巨大的經济意义的結果。

本节参考文件

（一）恩格斯：“自然辯証法”（第45—46頁，第151頁）。

（二）关于这个时期唯物主义的思想史料——“書經”“洪范”篇，“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子罕論“五材”，“国

語”，“郑語”史伯論“五材”，“左傳”昭二十年晏嬰論“和同”，“左傳”昭二十四年梓慎，昭子論日食，“国語”“周語”伯陽父論“陰陽，“左傳”僖公十六年叔兴論“陰陽”，“左傳”昭二十五年子产論“天地”，“国語”“楚語”范無宇論“天地”，“左傳”昭公十一年萇弘論“天道”，“左傳”庄公四年邓曼論“天道”，同上昭公三十二年史墨論“天道”，同上宣公十五年伯宗論“天道”，“国語”“越語”下范蠡論“天地”，“天道”和“人与天地相参”“史記”“貨殖列傳”論范蠡‘管子”“水地”篇。

第四节　孔子的哲学观点和社会倫理思想

孔子（前五五一——四七九）是古代儒家的創始人。他的祖先是宋国沒落的貴族。他做过魯国的“司寇”，曾經到許多諸侯国家宣傳他自己的学說，晚年專力从事于文化教育工作。

孔子是在当时激烈的政治斗爭中出現的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看到了奴隶主統治秩序的崩潰，順着当时历史發展的趋势，要求在社会政治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从而使古代的奴隶制逐漸过渡到封建制。他的学說代表向封建貴族轉化的一部分开明的奴隶主貴族的利益，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某些要求，因而使他成了古代中国封建主义思想的先驅者。

孔子也是中国历史上偉大的教育家。他曾經适应当时历史發展的需要，以私人的資格，把古代奴隶主貴族們所独占的文化知識广泛地傳播給社会上一般人，抱着“有教無类”的态度，認为不分等級成分和社会地位，都可以受教育。他也是当时拥有淵博知識的学者和著名的文献家与历史家。他曾經系統地整理古代傳留下来的“詩、書、礼、乐”等文化遺产，而且进行了新的解釋并把它們傳授給后一代，对中国古文化發展起了巨大的影响。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作了重大的貢献。

（1）**天命和鬼神**　在当时啓蒙思想的影响下，他对西周以来的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进行了修正。他有时保留了古代“天命”的信仰，認为“天”是有意志的。他說：“获罪于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但在自然观上，有时又認为并不需要上帝發布什么命令，四时和万物等自然現象自己就在运动和生長着。他說：“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同上，陽貨）他并且指出，事物的变化如同流水一样，晝夜不停地、自己在消失着。他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同上，子罕）。在社会生活上，他相信上帝可以干涉人們的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他說：“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同上，述而），但是他却不贊成盲目依賴“天命”，要求重視人自己的努力。他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同上，宪問）。他和同时代的其他啓蒙思想家一样，对崇拜鬼神等原始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他不談論鬼怪。“論語”記載說：“子不語怪、力、乱、神”（同上，述而）。他沒有明确地否認鬼神的存在，但認为鬼神对人的生活并不起支配的作用，可以尊敬鬼神，但不可以太信任鬼神。他說：“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謂知矣”（同上，雍也）。他指出不了解生活的人沒有資格追問死后的事情。他回答弟子們关于事鬼神的問題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說：“未知生，焉知死”（同上，先进）对死后問題采取了存疑的态度。他虽然不相信鬼神决定人的禍福，但却拥护祖先崇拜；認为祭祀体現了“孝”的道德。他又从維持社会秩序和倫理規范的观点肯定了祭神的仪式。

孔子肯定人的現实生活的重要，教导人們不必注意于死后的事情，首先应該集中注意力建設人間的社会生活，他实际上不相信鬼神是有“神明”的，正如后来有鬼論者墨子所說的：“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墨子，公孟）。这些观点，含有無神論的因素，在当时具有啓蒙的意义，成了后来儒家無神論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并沒有能够貫徹其中無神論的观点，从而摆脫宗教世界观的束縛。他和他的学生还时常把人們無力改变現实的不幸遭遇，归結为“天命”和無可奈何的命运，他的学生子夏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甚至于教导人們敬畏“天命”。他从强調人的努力出發，但由于对現实生活的懦弱性，使他終于停留在宿命論和宗教信仰的范圍之內。他一方面不信鬼神有“神明”，另一方面又拥护祭祀，这在理論上是矛盾的。这个矛盾是和他維护宗法关系和等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孔子的学說是当时的宗教迷信思想过渡到無神論的桥梁。

（2）**学和思**　孔子在教育学生过程中也研究了关于知識的問題。他特别强調学習的必要性，把后天的学習——“学”——看成是获得知識和提高道德品質的必要手段。他說：“好仁不好学，其蔽

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蕩”（論語，陽貨）。并且教导人們从耳聞目見的感覚經驗中丰富人的知識和生活；他說：“多聞，擇其善者而从之，多見而識之”（同上，述而）。他强調耳目見聞对行为的指导作用，要求人們按着感官經驗得来的知識去行动，从而在生活中就可以少犯錯誤。他說：“多聞闕疑，愼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余，則寡悔”（同上，为政）。根据这些观点，他反对漠視后天学習的唯心主义的思辯方法，認为不經过学習，虽然終日廢寢忘食地进行默想，也不会得到任何益处。他也批判了不虛心学習和强不知以为知的态度，指出，眞正求知的态度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同上）。这些观点，是从教学实踐中累积起来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孔子关于知識問題的重要見解。不仅如此，他也重視独立思考——“思”——在学習过程中的作用，指出，仅仅“多学而識”是不够的，主張“一以貫之”，就是說，还应該把学到的东西融会貫通，寻找出其中基本的道理。他認为学習和思考不能偏廢，二者必須結合起来，才有收获。他說：“学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学則殆”（同上，为政）。他为后人提供了許多宝貴的学習方法和經驗。这些对知識的看法，成了后来儒家唯物主义認識論的萌芽。

但是，孔子对知識的看法，还含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他虽然强調后天的学習，但有时又肯定在人类中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人物，他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同上，季氏）。并且承認人类先天就有“上智”和“下愚”的区别。他說：“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同上，陽貨）。这种看法实际上是貴族們把自己看成具有天賦的才能和把奴隶看成愚笨难以改造的剝削意識的表現。依据这种看法，他認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上，泰伯），使他在政治上又导向了愚民政策的結論。他所重視的学習內容，主要限于古代傳留下来的文物典籍和統治人民的經驗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主張“好古敏求”，“述而不作”，强調从旧事物中寻找新东西。他輕視体力劳动，反对人們学習生产知識。他企圖把人的知識从宗教迷信中解脫出来，但却把知識又局限于人生修养的范圍之內，沒有进一步把知識看成探求物質世界的工具。这些弱点，是跟他的阶級性和初期儒家的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3）礼和仁 孔子在古代中国倫理学說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放弃了古代傳留下来的宗教道德的說教，不把道德看成是侍奉上帝和鬼神的手段，而是从社会生活的需要論証了道德規范的必要性。他認为道德規范在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并且把他看成政治上最高的准則。

依据这种观点，他对維护等級制度的旧的社会規范进行了新的解釋。他把規定尊卑貴賤秩序的“礼”看成是人們共同遵守的道德規范，他說：“不学礼，無以立”（同上，季氏）。但不贊成仅只在表面上执行“礼”的仪式，要求人們还应該具有与之相应的心情。他說：“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同上，八佾）。在“礼”的基础上，提出了“义”的道德，他說：“礼以行义”（左傳成公二年），把合乎“礼”的行为看成是正当的行为，实际上教导人們应該具有服从等級制度的精神。他說：“君子有勇而無义为乱，小人有勇而無义为盜”（論語，陽貨）他还指出，“义”和“利”是根本对立的，認为“君子”們通曉“义”，而“小人”才追求“利”，宣称人們不能違反“礼义”等道德去追求“富貴”，教导人們宁肯安于“貧賤”的生活。他說：“不义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同上，述而）。他也提出了維护父权家長制的“孝悌”等家庭道德，作为人們行为的指南。他所講的“孝”，含有尊老养亲的內容，但一方面也是用来巩固宗法制度。他的弟子有若說：“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同上，学而）。他也提出了“忠信”等社会道德，教导人們要尽职守，守信用。以上这些道德的实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为保存等級制度服务的。他一方面用来教导貴族們——“君子”——应該具有道德的修养，一方面用来防止人民群众的暴动，从而建立新的統治秩序。这些道德項目成了后来封建道德的基础。

孔子也提出了新的道德观念——“仁”——作为貴族們行动的最高准則。他所說的“仁”，主要是教导人們应該同情别人——“爱人”（同上，顏淵）。这种道德的具体表現就是：自己所不願意的事情，不能加在别人身上；自己願意实現的事情，也应該帮助别人实現。他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顏淵），又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雍也）。他所說的“爱人”是从“亲亲”的宗法观念中發展出来的，教导貴族們不但要爱自己的亲屬，而且也应該尊重和关心社会上其它各阶層的人。他把“仁”看成是主观的道德情操，認为人們不仅要履行“礼”的規范，而且应該实踐“仁”的道德。他說：“人而不仁，如

礼何”（論語，八佾）。他教导人們应該牺牲个人的利益，以实現“仁”的理想。他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同上，衞灵公）。“仁”的观念的提出，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是和奴隶主的意識相对立的，实际上要求旧貴族們应該尊重其他阶層的人格和照顧新兴社会势力的利益。这种道德含有人道主义的因素，在客观上反映了从奴隶制的压制下解脫出来的自由民的要求，也反映了一部分奴隶摆脫了人格上的依賴。但是，孔子的“仁”的学說也有它的局限性。他要求貴族們首先要爱自己亲近的人，然后再做“博施济众”的事情。在他看来，爱人的步驟是有差等的。他把“仁”和“礼”結合起来，主張“克己复礼为仁”（同上，顏淵），叫人們按着等級制度所規定的尊卑貴賤亲疏等級秩序去爱人。他所講的“仁”，实际上是貴族們对待其它阶層的一种道德。这种道德，后来又成了封建統治者用来緩和阶級矛盾的思想武器。

从孔子对某些道德的解釋中，可以看出，他十分强調人的道德情操，認为主观的道德意識是基本的，是衡量道德行为的主要尺度。因此，他十分重視“直”（發自內心的眞誠情感），反对虛假的道德行为和伪君子，他說：“乡原，德之賊也”（同上，陽貨）。依据这种看法，他提出了“文”“質”并重的观点，指出外表的礼节仪式和內心的道德情操，都很重要，不可忽視任何一方面。他說：“質胜文則野，文胜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同上，雍也）。从他对某些道德規范的解釋中，还可以看出，他認为追求个人利益是和道德原則相違背的。“論語”記載說：“子罕言利”（同上，子罕）。他的道德学說也是跟利己主义相对立的。他似乎承認人有共同的本性，但个人品質的不同，也是由于后天習慣造成的。他說：“性相近也，習相远也”（同上，陽貨）。由于他强調个人的主观道德情操，反对追求功利，从而認为只要履行道德的理念，可以不必过問行为的后果。他基本上倒向了动机論。以上这些观点后来構成了儒家倫理学說的理論基础。

（4）德治和正名 孔子在政治观点上，也摆脫了神权政治的理論，提出了“为政以德”的学說，認为理想的統治者应該是具有道德修养的人物。依据这种观点，他不贊成对人民群众采取殘酷杀害的办法，他說：“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殘去杀矣”（同上，子路）。主張叫人民懂得貴族們的道德規范并服从这些規范，企圖以道德上的說教代替暴力的統治。他說：“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同上，为政）。他認为統治者还应該节省开支，关心人民的生产活动，他教导統治者說：“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同上，学而）。他認为不仅要使人口繁多，还要使人民富足，并且在富足的基础上使人民具有道德和文化上的教养。他指出，貴族們不講教化而杀害人民群众是殘暴的行为。他說：“不教而杀謂之虐”（同上，堯曰）。这些观点，同样是和奴隶主的意識形态相对立的，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积極的部分。他还提出了“举賢才”的政策，主張选拔品質正派和有才干的人管理国家的事情，但却不贊成人民群众議論国家政治。他还教导当时的統治者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同上，季氏），認为使人們都能过着富足的生活，自然得到人民的拥护。孔子进步的社会政治观点，是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形成前夕在思想上的反映。

为了保存等級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孔子又提出了“正名”的学說。他所說的“正名”，主要指“正名分”，即教导人們按着等級成分所規定的秩序去行动。他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上，顏淵），認为做君的都合乎为君的道理，做臣的都合乎做臣的道理；社会秩序就安宁了。这种維护等級制度的“正名”思想，具体表現在他所修改的魯国历史—“春秋”—之中。

孔子对西周以来的旧制度，采取了保留和修正的态度。他說：“周因于殷礼，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虽百世亦可知也”（同上，为政）。在他看来，古代的社会制度有着共同之点，是不能全部否定的。他所要保留的就是等級制度和宗法关系。因为等級制度不仅适合于奴隶制的要求，同样适合于封建制的要求。这就是孔子在当时社会变革时期拥护“周礼”的实質。他企圖在保存等級制度的基础上，适应当时新兴势力的某些要求，对旧制度加以适当的改革；并且幻想通过道德說教的方式，限制奴隶主貴族的殘暴行为和过分的剝削，从而采取温和的改良办法，使古代的奴隶制走向封建制。孔子的学說，是奴隶制崩潰时期一部分奴隶主貴族和新兴社会势力互相妥协的产物。他的学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的意义。

孔子的学說，在奴隶制瓦解时期，沒有得到当权統治者的采納，因为他采取的政治路綫，在社会变

革时期是軟弱無力的。但当秦汉以后，建立起封建地主阶級的統一政权，孔子的思想逐漸得到了封建貴族的大力支持，变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态，成了巩固封建生产关系的上層建筑的一个組成部分。因为孔子的学說，不仅为剝削阶級的統治者提供了从精神上，尤其是从倫理道德上巩固封建等級制度的武器，而且在政治上，为封建統治者提供了緩和阶級矛盾从而維持其長远利益的对策。在他的学說中，也含有民主的和人道主义的因素。这样，孔子后来就成了封建时代人們所崇拜的聖人。他的学說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起了巨大的影响。

孔子的学說，在中国哲学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他是中国古代一位偉大的啓蒙思想家。他創立了古代中国最早的学术流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比較系統的理論体系。他的哲学观点，标志着古代思想开始从神权的束縛中解脫出来。他的重要貢献在于把人和現实生活提到了首要的地位，从人的实际生活的需要，观察和了解一切問題。他是古代中国人本主义的先驅者。他的学說，教导人們对現实生活采取积極的态度，其中追求眞理、热爱知識、遵守道德和为理想不断斗爭的精神，对后来中国人民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在他的学說中含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兩种傾向。他所提出的問題，被后来儒家学者發展了。孟子一派主要繼承和發展了孔子学說中唯心主义的傾向，走向了唯心主义；而荀子一派又繼承和發展了其中唯物主义的傾向，建立了儒家唯物主义的傳統。

本节参考文件

(一) 关于孔子的生平事迹——"史記，孔子世家"

(二) 关于孔子思想的参考史料——"論語"，"左傳"哀公十一年孔子論"田賦"，同上昭公二十九年孔子論"刑書"。

讀者意見

停止咬文嚼字的爭論

王雪松

百家爭鳴方針提出后，对活躍学术气氛，推动学术进展，已經并正在起着良好作用。但对这一方針理解却有各式各样的。有人說：能够爭論就是好現象，我認为却不尽然。那些咬文嚼字的爭論对提高学术水平是毫無俾益，徒徒浪費精力和紙張而已。目前因农業合作化基本完成所引起的我国生产关系是否走在生产力前面的爭論就是一例。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告訴我們：生产方式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兩个方面，这兩个方面不是毫無关联的，而是統一于物質資料生产过程，生产力最終的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依賴于生产力的發展而發展，是依賴于生产力的变更并与这些变更相适应而發生变更，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并不是毫無影响的，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的發展，它可以加速或延緩生产力的發展，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質不相适合时，它便成为束縛生产力的桎梏，阻碍和延緩生产力的發展；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質相适合时，它便成为生产力發展的形式，成为巨大的推动生产力發展的力量，加速生产力的發展。我們所以要对农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因为小农經济的生产关系束縛着，阻碍了生产力的發展，与生产力性質不相适应。而当农業合作化基本完成的今天，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生产資料的集体所有制基本上代替了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生产关系适合了生产力性質，这种生产关系便成为生产力發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它推动生产力迅速的提高和發展。散見各报刊上的关于这一問題的文章，都承認上述的論点，所分歧的仅仅在生产关系是否走在生产力前面，有的說是在前面，有的說沒有。試問在这种情况下爭論这个問題有什么理論上和实踐上的意义呢？我認为沒有，这种爭論是文字游戏。因此建議停止。

討論

論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

关夢覚

一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議"中指出来：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目前"我們国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業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業国的現实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对于經济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当前經济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况之間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質，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經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正因为这样，所以"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業国变为先进的工業国。"

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当中，一方面包括無产阶級專政性質的政治法律制度、文化教育制度、以及其他屬于上層建筑之类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同时，更重要的，是包括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經济制度、即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这一矛盾構成了当前我們国內主要矛盾的基础。

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主要表現在目前我們的工業落后和整个国民經济的技术落后方面，这种工業落后和技术落后的情况和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不相称的。誰都知道，我国过去曾經是一个在帝国主义統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工業落后的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国生鉄的产量只有24.6万吨，鋼产量只有15.8万吨，当时我国的現代工業只占工农業总产值的17%。我們就是在这样一个工業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开始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轉入社会主义革命的！1952年我国恢复阶段終結、將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計划建設的时候，虽然生鉄和鋼的年产量都超过了解放以前的最高水平，但生鉄也还只有190万吨，鋼只有134.9万吨，这一年，我国的現代工業只占工农業总产值的26.7%，而农業及其副業則占工农業总产值的58.5%。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我国的工業建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1956年，我国的工業生产就能够达到五年計划所規定的1957年的水平，而到1957年，將有可能比原計划超額完成15%左右。尽管这样，但直到1957年，我們的鋼产量也不过只有550万吨，工業（包括手工業）的比重約占工农業总产值的50%左右。所以第一个五年計划的超額完成，將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業化打下初步的基础，但还不能根本改变我国工業落后的面貌。

再就农業来說，近几年来，在农業合作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农業合作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农業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新式改良农具有了相当的推广，农業生产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但在目前，我国的农業技术基本上还停留在所謂工場手工業的阶段。例如1955年，我国只有拖拉机2839标准台，谷物联合收割机657台，机耕面积只有294.6千公頃。所以从生产工具和技术条件来看，我国的农業还是很落后的。

可見無論从工業方面或农業方面来看，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都还落后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为社会主义的物質生产基础乃是大机器生产，社会主义又同工業化、农業現代化是不可分的。关于这一点，列宁曾指示我們說："社会主义的唯一物質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業的大机器工業。"（見"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第886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眞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業。……沒有高度設备的大工業，那就一般地談不到社会主义，对于一个农民的国度，尤其談不到社会主义……。"（見"列宁文集"第七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51頁）正因为我国大机器工業在整个国民經济中的比重还小，正因为我国的农業技术落后，所以目前才發生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为什么这个矛

盾是不可避免的呢？这主要是因为在像我們这样一个經济落后的国家里，要想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須同时进行兩方面的革命：一方面是生产关系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由手工業生产到大規模現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把这兩方面的革命綜合起来，便構成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即在一个相当長的时間內，逐步实現社会主义的工業化，逐步完成对农業、手工業和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兩方面的革命虽然是互相結合、統一不可分的，但在进行的速度和完成的时間上，却有先后之分，即生产关系的革命完成在先，生产力的革命实現在后。事实上，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算起，我們在七年多一点的时間內，就基本上完成了对于农業、手工業和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在生产关系的革命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至于在社会主义工業化方面，我們在这短短的期間內虽然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內还只是为社会主义工業化打下初步的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內將为社会主义工業化打下巩固的基础，大約要經过三个五年計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間，我們才能够完成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工業化和农業現代化的历史任务，即实現生产力方面的革命。既然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內就基本上完成了，而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則大約需要三个五年計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間才能够完成，所以生产关系暫时走到生产力的前面，那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可見目前我国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乃是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快于生产力方面的革命的結果。

为什么生产关系方面的革命会快于生产力方面的革命呢？从發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說，这是因为我們过去的社会生产力太落后了，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尽管我們在共产党的正确領导下，由于工人阶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以超过五年計划所規定的每年遞增14.7%的高速度来發展工業，但無論如何，終不能在短期間內就根本改变了我国工業落后的狀况并实現农業机械化，因而不能在短期間內就实現了我国过渡时期的生产力的革命。从改造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說，我們所以能够在几年內就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个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任务，除了其他因素以外，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領导。我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而正确的領导下，無論在农業、手工業或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帶有創造性的过渡办法，保証我們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来逐步消灭生产資料私有制，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的經济制度。这些逐漸过渡的办法和步驟，看起来好像是比較慢的，但实际上却以極快的速度稳妥而健康地前进。和党的正确領导分不开的，我們还应該强調指出来無产阶級專政性質的国家政权的重大作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們說：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权問題。我們的以工人阶級为領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权，保証了我們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胜利。以上我們从發展生产力和改造生产关系兩方面，說明了为什么生产关系的革命快于生产力的革命。既然生产关系的革命快于生产力的革命，于是目前我国的生产关系也就相应地走到生产力的前面去了。

二

上面我們簡要地說明了目前我国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的一般狀况及其产生的原因。現在我們再进一步地分析一下这个矛盾的特点及其性質和作用。

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这一矛盾是指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經建立的情况下，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暫时落后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非指社会生产力發展的速度落后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今后繼續發展的速度。誠然，目前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是比較低的，但它的發展速度却是很高的。就工業（不包括手工業）来說，如果以第一个五年計划开始的前一年，即1952年的工業总产值为100，則1955年为165.6，三年內增長了65.6%；而其中的現代工業則从1952年的100增加到1955年的168.2，三年內增長了68.2%。再以現代工業中的鋼鉄工業为例，仍以1952年为100，則1955年的生鉄产量为191.1，鋼产量为211.5，比整个工業的增長速度还要快了許多。按照第一个五年計划的規定，我国鋼的产量要从1952年的134.9万吨增加到1957年的412万吨，每年平均增長25%；执行的結果，到1957年預計可以达到550万吨，每年平均增長32.5%。这个速度，远非資本主义国家鋼鉄工業的發展速度所能比拟。更就整个国民經济来說，預計第一个五年計划执行的結果，我国1957年的工农業总产值（包括現代工業、手工業和农業），可能

比1952年增長60%以上。在第二个五年計划期間，根据党中央的建議，要求1962年的工农業总产值比1957年計划（系指第一个五年計划中的1957年計划）增長75%左右，其中工業产值（包括現代工業和手工業）比1957年計划增長一倍左右，农業产值比1957年計划增長35%左右。可見我国社会生产力的發展速度是很高的。这証明生产力畢竟是生产中的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至于生产关系，那怕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一經形成以后，虽然也在不断地發展变化之中，但和生产力比較起来，却有相对的凝固性、保守性。所以，从現有的水平上来看，目前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固然是落后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从發展的速度上来看，生产力又將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正因为在社会主义的經济制度建立起来以后，社会生产力的發展速度快于生产关系今后繼續發展的速度，所以迅速發展的生产力將推动着新生产关系不断地巩固和提高。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生产發展过程中的决定因素的原理，就在生产力的水平暫时落后于生产关系的情况下，也是基本上适用的。再就生产力本身来說，它的發展速度和它的水平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正因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發展速度快，所以也就会比較快地克服了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从而在不久的將来，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將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門当戶对”，并逐漸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

第二、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在国民經济的各个部門、各个成分和国家的各个地区之間，是不平衡的。就国民經济的各个部門来說，我国現代工業的生产力水平就远比农業和手工業为高，而作为現代工業骨干的限額以上的大企業，又都是用現代先进技术装备起来的。从1953年到1955年，我国陆續投入生产的限額以上的大企業已有141个。到1957年底，預計新建和改建的限額以上企業的施工項目將达到800个左右，而完工的項目則將接近500个。在我国工業总产值中，按照大体的計算，到1957年，由新建和改建企業所生产的，將占15%左右；而到1962年，由第一个五年和第二个五年内完工的新建企業和改建企業所生产的，將占50%左右。能說这些現代化的新建和改建企業的生产力也落后于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嗎？显然不能。在这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旗鼓相当”的。至于在手工業和其他一切非現代化的工業中，特别是在农業中，生产力的水平就显然落后于其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了，而因为农業和手工業在工农業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大（以1955年为例，現代工業占工农業总产值的33.6%，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和农業占66.4%），所以就整个国民經济来說，才發生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再就各种經济成分来說，目前我們只是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非社会主义的經济成分和半社会主义的經济成分还殘存着。例如，到1956年11月底为止，全国还有3.9%的农戶尙未参加农業生产合作社；而在参加农業生产合作社的全国96.1%的农戶当中，参加高級社的占全国农戶总数的83%，参加初級社的占13.1%。此外，到1956年6月底为止，在全国手工業者总数当中，参加了合作社（組）的約占90%，个体劳动者尙有10%左右。能不能說在这些殘存的非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經济成分当中，生产关系也走到生产力的前面去了呢？当然不能。事实上，在这些經济成分中，生产关系还阻碍着生产力的發展，只有改造了生产关系才能够解放生产力。至于目前的公私合营企業，其生产关系虽然已經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了，但因为还保留着定息制度，畢竟比完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落后一步，在这里，生产关系是否比生产力先进，还值得研究。更就全国各个地区来說，即使同样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因为各个地区工業化的程度不同，生产力的水平不同，所以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的程度也就各不相同。綜合以上所說，可見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系就整个国民經济来說的，至于这一矛盾在国民經济的各个部門、各个成分和全国各个地区之間，則是不平衡的。这就要求我們在处理問題、解决矛盾的时候，除了要掌握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以外，更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采取适合于不同經济部門、不同經济成分和不同地区的不同办法。

第三、在目前我国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当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即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落后的生产力。毛主席說：“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毛澤东选集”，第二卷，第789頁）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經建立的情况下，尽管生产力落后，但因为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的，这就决定了我們的經济性質也是社会主义的。說目前生产关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不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毛

主席說："誠然，生产力、实踐、經济基础，一般地表現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誰不承認这一点，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論、上層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轉过来表現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須承認的。"（同前引書，第792頁）在一种情况下，如同毛主席所說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發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同上）；在另一种情况下，如同在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当生产关系已經起了革命、暫时走到生产力前面的时候，因为它是推动生产力發展的决定性的力量，所以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就变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即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然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是可以互相轉化的，等到过渡时期完了，我們实現了社会主义工業化和农業現代化以后，生产力又將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了。

第四、生产关系先进与生产力落后，乃是一种暫时性、过渡性的現象。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之所以能够互相轉化，如前所述，乃是因为归根結底，生产力畢竟是生产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并且是生产發展过程中的决定的因素；而生产关系一經形成以后，則有相对的凝固性、保守性。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基本上完成以后，被解放了的社会生产力正在高速度地向前發展，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間的距离將越来越近，等到过渡时期完了的时候，生产力將終于赶上并逐漸超过生产关系而变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目前生产力之落后于生产关系，乃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一种暫时的、过渡的現象。

以上这些，就是目前我国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的几个主要特点。从这些特点出發，現在我們再进一步地闡明一下这个矛盾的性質和作用問題。

首先我們要指出来，这一矛盾乃是过去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發展那一旧矛盾的倒轉形式。現在，不是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發展了，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暫时走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前面去了。現在，不是生产关系跟不上生产力了，而是生产力落后于生产关系了。从历史的發展来看，如果說过去的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旧矛盾是一个肯定，那么，現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就是一个否定，而在將来过渡时期完了的时候，我国实現了社会主义工業化和农業現代化以后，那又將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由此可見，目前的新矛盾乃是在我国过渡时期，作为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發展的那一旧矛盾的对立物而出現的。正因为新矛盾是作为旧矛盾的对立物而出現的，所以新矛盾的性質和旧矛盾的性質不但完全不同，而且是直接相反的。旧矛盾，乃是腐朽、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和束縛生产力發展的对抗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我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轉入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集中地表現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即無产阶級同資产阶級之間的矛盾，因为当时的旧生产关系、即資产阶級的生产資料所有制和产生資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主要是以資产阶級为后台老板的，而代表生产力發展的要求的，則是以無产阶級为先鋒队的。現在，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矛盾已經基本上解决了。至于新矛盾，則是社会主义經济制度在我国已經基本上建立起来以后所出現的先进与落后之間的矛盾。这是工人阶級領导人民大众所建立起来的新生产关系和工人阶級領导人民大众所正在發展中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因而除了尙未經过改造的資本主义經济成分的殘余以外，这不是無产阶級与資产阶級之間的矛盾，而是工人阶級和一切劳动人民內部的矛盾，因而这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此时，先进的是生产关系而落后的則是生产力，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是推动社会生产力迅速發展的極其强大的动力，它推动着我国生产力的革命，使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業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業国。当初是生产力發展的要求推动了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改变；現在是已經改变了的生产关系推动着落后的生产力的發展。同时，在生产力發展的过程中，又將不断地巩固和提高我們已經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果說，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乃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那么，目前我国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正是推动着我国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

三　說目前我国的生产关系先进、生产力落后，是否違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呢？

誠然，馬克思列宁主义告訴我們說：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并且是生产發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生产关系总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也就怎样，生产关系一般是落后于生产力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我們对于这一原理却不能理解得太机械、太絕对化了，認为無論何时何地，都是生产力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在任何情形下，生产关系都不能越生产力“雷池”一步。对于这一条原理，我們应当結合中国实际，从三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这是指生产关系發生变化的原因或动力，这是指生产关系的变化总是由生产力的發展所引起的、总是由生产力的性質和水平所决定的。馬克思說：“社会的物質生产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和它們向来在其中發展的那些現存生产关系，或不过是現存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产关系發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發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縛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就我国的情形来說，正因为当社会的物質生产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旧的生产关系变成了束縛生产力發展的桎梏，所以我們才通过民主革命打破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初步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更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改造了資本主义的和小商品經济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徹底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为生产力的發展开辟了無限的前途。所以我国对于农業、手工業和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完全符合于上述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

第二、如同前面已經說过的，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經建立起来以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現有水平誠然落后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社会生产力的發展速度，却不仅不会落后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今后繼續發展的速度，而且还会超过那一速度，由生产力的蓬勃發展来推动着新生产关系，不断地巩固和提高。由此可見，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尽管生产力的水平落后，但它的發展速度却还是走在前面的，从这一点来看，也符合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并起决定作用的原理。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并未包含这样一种意思，即在任何情形下，已經發生了变化的生产关系、即由生产力的变化所引起的新生产关系，不能暫时地走在生产力水平的前面。如上所述，在像我国这样一个工業落后的国家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旧生产关系的改造和新生产关系的建立，是飞躍式的，七年左右的时間，从历史發展的眼光来看，只不过是一瞬；而社会生产力的革命，無論如何，却非經过三个五年計划或更多一点的时間不可。因此，在生产关系的革命已經完成而生产力的革命尙未完成的青黃不接的期間，生产关系就暫时走到生产力的前面去了。由此也可以体会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关于生产力走在生产关系前面、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原理，只是表明一种帶有一般性的历史發展趋势，而不应当把这一原理絕对化起来，認为在任何情形下，都是确定不移的“金科玉律”。因此，說目前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暫时落后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不違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而且正是这一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表現形式。

并且还不止此。从另一方面来看，历史唯物主义还教导我們說：生产关系虽然是依賴于生产力的發展而發展的，但它并非是消極、被动的东西，它反过来又影响到生产力的發展，加速或延緩生产力的發展。当生产关系已經远远地落后于生产力的發展狀况、完全不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質的时候，它对于生产力的發展就要發生阻碍作用，生产力就要遭到破坏；反之，当一种与生产力的發展相适合的新生产关系产生出来以后，它对于生产力的發展就能够發生强大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的意义上，还可以說它是生产力發展的主要的决定力量。这还是指一般与生产力相适合的新生产关系而言的。至于在我国过渡时期，既然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暫时走在社会生产力的前面，它不仅一般地适合于生产力的發展，而且还特别适合于生产力的發展，所以它对于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就表現得特别突出、特别强而有力。这种情况，不仅一般地符合于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的原理，而且还正是这一原理的丰富和發展。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說生产关系暫时走在生产力的前面，乃是生产关系反作用原理在我国过渡时期的一种新的、特殊的表現形式。

綜合以上所說，可見“八大”决議中所提出来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从理論上說，这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帶有創造性的新貢献；从实踐上說，既然明确了我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的矛盾”，于是也就明确了我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高速度地發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業国变为先进的工業国。在这里，我們看到了創造性地运用和發展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輝的范例。在这里，我們看到了理論与实踐相結合的光輝的范例。

心理学的对象究竟是什么？

章志光

关于心理学对象問題不仅在苏联心理学界是个热烈爭論的中心題目，对于中国心理学界說来它也同样是一个引起普遍注意、討論和感到比較困难的課題。但是，中国心理学家在报紙上公开發表关于这个問題的意見要算丁瓒同志在1956年8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所写的“談談心理学对象的問題”一文为首次。这篇文章概括的介紹了苏联心理学界討論这个問題的基本情况，冷靜的指出了心理活动与一般高級神經活动之間存有目前还不能得到具体解决的一些区别，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个困难問題的一些有益的方向。我認为，文章的这些肯定方面对于中国心理学的發展將会起着积極的作用。但是为作者本人所强調、所主張的“在發展到心理水平的人的高級神經过程……也就是心理学研究对象”（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这一主要論点，是不能使人完全滿意的。

丁瓒同志一开首就援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們在反对唯心論与二元論时所無数次重复着的关于“人的心理的东西是物質的最高产物，是特别复杂的物質（人腦）的机能。”这样一个著名論点。毫無疑問，这个論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們在談到这个論点时也总是紧接着强調另一个不可分的著名論点，心理的东西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是“自然界底过程在思惟的头腦中的反映”，像列宁在“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一書中所說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头腦底机能，是外間世界底反映。”（“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人民出版社版，第115頁）如果只是片面地去强調前一論点而忽視或抛弃了后一論点，不指出人腦的这种机能就是反映，这就容易与机械唯物論的观点甚至于和庸俗唯物論所持的“思想是头腦的分泌”这样一些反动論点混淆起来。丁瓒同志的文章不仅在开首作了这样片面的强調，而且整篇文章除了个别地方輕描淡写地提到了“社会制約”“动力来源”之外，始終都貫穿了这样一种精神，因而造成了一种濃烈的气氛，使人感到心理学似乎就是一門研究人腦本身的科学。

心理学是否就是一門研究人腦的科学呢？人的高級神經过程是否就是心理学的对象呢？如果說，丁瓒同志的提法不算錯的話，那只不过是他指出了心理学对象的类似概念。“人底高級神經活动”这一概念就巴甫洛夫看来，它包括人腦的結構和人腦的机能。而人腦的机能就动力学的現象来說，它主要就是分析与綜合活动，就是暫时神經联系的形式。巴甫洛夫說：“兩半球的最主要机能之一便是条件反射的建立。”（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演講集”，人民衛生出版社版，第142頁）人腦的机能如果作为主观現象来說，它就是人的映象活动、信号作用、主观狀态。腦的結構、腦的动力过程、映象活动三者是統一不可分的。但作为專門科学来說，它們可以借着抽象的方法来分别加以研究。腦的結構是解剖学研究的对象，腦的动力过程則是生理学研究的对象，而心理学則將具有一定內容与形式的映象活动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正如巴甫洛夫在“高級神經活动客观研究的最近成就”一文中所說的：“心理学，在它涉及人类的主观狀态方面，是有权利存在的；因为我們的主观世界是我們所面临的第一个現实。”（同上書，第267頁）当然，犹如研究腦的动力过程不能离开腦的結構一样，研究映象的活动也不能脫离腦的动力过程而孤立进行。所以巴甫洛夫說：“心理学須处理意識現象。”“我們的研究和我們的成功，絲毫也不依賴他們（指心理学——作者注）的研究。反之，我相信，我們的研究会对于心理学家們有重大意义，因为我們的研究在將来必定会替心理学知識打好根基。”（同上書，第65頁）可見，心理学与生理学虽然都研究高級神經活动方面的現象，但是它們的对象并不是一样的。把心理学的对象說成是人的高級神經过程如同把語言学的对象說成是社会生活过程一样，虽然不能說它完全是錯的，但是也不能說它是很精确的，这里并沒有給我們提供出什么新的东西。

說心理学就是研究人的高級神經活动的科学，

是否就是克服了心理学社会学化取消派及心理学生物学化或生理学化的取消派之后的一种正确的途徑呢？

人的高級神經活动不仅包括着一般高級神經活动方面的东西，而且它也具有区别于一般高等动物神經活动的新質。巴甫洛夫指出："在發展着的动物界中，在人的阶段上，就产生了一种神經活动机構的特别附加物……这就是由語詞所構成的現实的第二信号系統。"（"巴甫洛夫选集"，科学出版社版）人們在劳动过程中产生了这种新的机構之后，于是也就能够在他們的基础上对現实进行抽象与概括，正是这样，在人身上就出現了意識現象，出現了外在世界底稳固而丰富的主观映象，人因此成为了自覚的、能体驗的、能动而有个性的主体。心理、意識就其內容来說，它是現实、特别是社会現实的反映，它們是社会的产物，因而是屬于社会現象之列的。但是就其發生的本体来說，則它們只不过是人腦的分析、綜合活动的結果，是一系列暫时神經联系的表現。尽管这里有着随社会的产生而出現的人的附加机構，但是巴甫洛夫認为它仍然只是"同一神經組織工作"。因此，从神經系統的动力現象上来看这仍然只是一种生理过程，一种自然現象。我們大家都知道，社会学化取消派只看到了人的映象的內容，只單純把人看成为抽象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抹煞了人的自然实質，从而否定巴甫洛夫学說对于心理学的意义，这当然是不正确的。Н·П·安屯諾夫就是这一傾向的典型。但是，生理学化的取消派却走到了另一个極端，他們忽視或拋开了映象，而只把人單純看成是具有生理結構与生理机能的实体，主張用高級神經活动生理学代替心理学，这仍然是把人設想为抽象的产物，不过是从生理学的角度出發而已。В·М·阿尔西波夫則是这一錯誤的典型。而生物学化取消派实际上是屬于后一傾向的，不过他們还加上一个錯誤，那就是在研究高級神經活动时把动物和人加以等同。

从丁瓚同志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心理学必須克服生物学化这一点在态度上是明确的。然而在涉及到克服其它兩种片面傾向时則显得含糊不清了。我們同意文章內如下的提法："心理活动是只有在人身上才可以找到的高級神經活动發展到最高水平上所出現的現象，是人的自然实質同社会实質的統一的具体体現。心理学就是要揭露这种現象的發生和發展的規律的科学。"但是我們不很同意如下的提法："在發展到心理水平的人的高級神經过程……也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

为什么我們不同意后一种提法呢？

"心理活动"不仅指主观映象的变化与發展，而且也离不开映象之賴以产生与变化的腦的生理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甫洛夫認为心理活动是相当于高級神經活动这个概念的。但是，我們知道，兩者并不是毫無区别的。在"心理活动"这个概念中，映象方面的意义是被突出了。而在"高級神經活动"这一概念中，腦的結構和动力过程方面的意义則是被强調了。前者是屬于心理学上的概念，而后者則是屬于生理学上的概念。巴甫洛夫在談到"心理活动是高級神經活动的机能"（"条件反射演講集"，第426頁）或"心理活动是一定腦質的生理活动的結果"（"巴甫洛夫选集"，第151頁）时，就是把它們当做有区别的概念来使用的。

巴甫洛夫从来沒有說过，高級神經活动或人的高級神經活动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这样类似的話。然而他却不止一次的明确指出："心理活动老早（不仅一千年）成为一种特殊的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巴甫洛夫选集"第151頁）我們都知道，如果心理学家光去研究神經过程或行为，而总也不去或不敢去接触意識現象，不去說明意識的积極作用，不管他們有多少借口，他們所走的道路只不过是行为主义者的行徑。当然，丁瓚同志并不是这种人，因为他認为心理学要研究"人怎样进行高度發展的抽象概括思惟，人怎样进行創造性的思想与想像……。"既然如此，我們說心理学的对象就是心理、意識活动不是更明确嗎？把心理学的对象說成是人的高級神經活动，而又不加以进一步說明，如果在主观上不是要求人們对心理活动作生理学上的探求，那末，至少在客观上就会使得一切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一切心理学取消派、甚至于一切心理学形态学派就可能在这样一个寬闊無边的盾牌之下得到立足的机会。

当然，巴甫洛夫本人是沿着高級神經活动动力过程研究的道路来探討心理現象的秘密而取得成功的。不可否認，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的实驗研究对于心理学的發展开辟了一条嶄新的道路，巴甫洛夫学說不仅过去、現在、就是將来也总是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基础。但是，必須指出，巴甫洛夫是从生理学家的立場出發的，因此，他就着重于把心理現象当作自然現象来加以研究。他自己就說："从生理学方面說，心理活动也应当像現在有成效地研究有机体一切其它活动部分一样来加以研究的。"（"巴

甫洛夫选集”，第151頁。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当然，現代心理学家运用巴甫洛夫学說或部分心理学家逕直从事人类高級神經活动生理現象的研究来揭露心理現象的生理机構及找出心理現象所賴以实現的腦的規律，这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心理学当前阶段所急迫需要的任务之一。但是，如果在研究人的高級神經活动的借口下而只把高級神經活动的动力現象当作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尽管人們是如何的辛勤劳苦，但是实际上这些心理学家所做的只不过是生理学家所应作的事情。而心理学，它不仅要研究感覚、知覚、表象、思惟等心理活动的机構和产生的过程，而且还要研究作为一个具体的人的意識傾向、个性的心理特点形成的过程。这也就是說，心理学在研究映象时不光研究映象活动的形式与机構，同时也要顧及映象內容及揭露其产生的具体原因。这就要求心理学家不仅仅單純根据高級神經活动生理学埋首于条件反射生理实驗室，而且也必須要掌握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广大的生活中去！去揭开如下的秘密：人在什么样的具体社会生活条件下就会形成什么样的具体心理內容，而具有什么样的具体心理內容就可以促进社会生活的發展？

我們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如果有人故意把我們的研究对象扩展开来，模糊起来，因而使得許多心理学家以及年輕的心理学工作者所从事的是生理学家的工作，这对心理学的迅速發展又將有什么意义呢？

心理学底对象正如其它科学的对象一样，它不是为个别科学家个人的爱好、願望以及某些片面的知識来制定出来的，它是为整个社会历史实踐所規定的。如果某一門科学确定了某一对象并且迅速地得到發展，这正是反映了人民对于某一科学对象的研究存在着需要，如果科学家所研究的对象不为人民所需要，那末这种研究也必然得不到支持与發展。我当然不是說人的高級神經活动的生理現象是人民生活中所不需要研究的对象，相反，生活需要对这种对象的研究，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动生理学的形成与迅速發展就是一个有力的証明。但是，这个对象由生理学去研究是比較合宜的，因为它是生理現象；又因为它和心理現象不可分，所以像巴甫洛夫所主張的由心理学家与生理学家合作来研究也是合适的。我只是說，生活要求于心理学家的并不止于此．就拿我們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来說吧！如何使人的个性得到全面發展？如何培养人的性格与意志？如何形成共产主义的道德情感？……这样一些个性的問題不是正在等着心理学家們去解决嗎？在教育事業上，在文学方面，在社会改造事業上要求于心理学来解决的是整个人的心理、意識形成的問題，而决不仅仅只限于作为心理形成的生理机構方面的問題。

有人認为个性問題不能組成心理学全部內容，而心理学主要是研究心理过程的，因此心理学应該屬于自然科学（苏联“哲学問題”1954年第4期所載“論心理学的哲学問題”一文就是这样主張的)。也有人說：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就主張“科学的心理学家应逕直来研究心理現象的物質本体，即神經作用”；如果心理学涉及到心理內容、意識傾向、个性的心理特点，这就要違反列宁的遺訓。其实，上述这些看法并不能成为反对心理学研究个性、涉及到心理內容与源泉的充足理由。在目前心理学課本中个性問題所占的篇章的确是不多的，但是这不等于說，在心理学中个性問題是不重要的。我們在上面已經說过，心理学研究个性問題，是由整个社会生活决定的。心理学家只知道心理产生的一般过程，而不知道每一个具体人的具体意識傾向形成的原因与規律，这就不能滿足实踐生活对心理学提出来的要求。有人說，这个問題应該由倫理学家社会学家去研究。我們不同意这种看法。倫理学家所探討的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人应該有什么样的意識的問題。社会学家所研究的是社会意識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方面的一些問題，而他們并不去涉及作为人腦的机能的某种意識是如何形成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积極作用的問題。而这个問題对于心理学家来說是責無旁貸的。我們既要研究个性，就不仅研究个性形成的一般过程与規律，而且在研究过程中也必須要探討每一具体的个性特点、有关的心理內容、意識傾向及其形成的具体原因．例如为什么有些人会产生自滿、浮夸的傾向，而另一些人就显得謙虛、純厚呢？为什么有些人比較堅定、剛毅，而另一些人就比較犹豫、軟弱呢？为什么一些人具有音乐或戏剧的才能，而另一些人又具有計算或机械設計的才能呢？……。所有这样一些具体人的心理內容与傾向及其形成規律是極为复杂而多样的，当然他們作为腦的产物来說与高級神經活动类型及动型有着極密切的关系，但是，光有了生理学方面的知識还不能对它們作出全面的說明。在这里除了依据高級神經活动学說以外还必須依据社会历史科学知識，一方面根据人在实踐中的具体表

現去确定人的心理傾向，同时又要依据具体人生活的历史条件去揭开这些傾向所反映的現实生活內容。这样我們就找出了一定的現实条件、一定的意識傾向与一定的行为表現之間的联系，从抽象中所得到的这种联系的假設經过驗証，如果它具有一般性，我們說，心理学就找到了个性方面的規律了。尽管意識是主观的东西、而構成意識的源泉的現实、这个反映的过程及作为意識的体現者的行动、言語、外部态度都是客观的，而它們几者之間存在着一定联系，这里也就存在着一定的規律。因此，映象意識、个性形成的过程仍然可以做为我們心理学的客观对象而加以考察与分析。尽管目前心理学在这方面所积累的材料比起心理过程是較少的，但根据解决这个問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来看，个性問題在心理学中所占的位置及篇章是一定要大大增加的，如果把列宁所提示的"心理学家应逕直来研究心理現象的物質本体"一語理解为心理学只能研究腦神經过程而不必或不要过多研究个性涉及心理內容的話，我想这仍然只是"寻章摘句"地对待經典的結果。虽然，列宁并沒有直接說过心理学要不要研究个性、心理內容这样的語句，但是在列宁的著作中当分析与揭露某些人或某一阶級的性格时就經常整段整段的援引了許多著名人物有关个性方面的心理学分析的材料。例如大家都熟悉的列宁在"进一步，退兩步"一文中揭露与批評馬尔托夫的惡劣作風及品質时就引証过关于知識分子与無产阶級不同性格及其形成原因的一些心理学分析材料。列宁認为这些材料是"对于这种知識分子动蕩性所給予的一种燦爛的社会心理学的估計。"列宁認为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对于党內某些人的疾病开出严酷的診断單和找出治疗的藥方。("列宁文选"，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465頁。)有誰能說列宁不重視个性心理学的研究，又有誰敢說涉及心理的內容將会違背列宁的綱領性的指示呢？在丁瓚同志的文章中始終沒有提到个性問題，这难道是一种偶然的忽略嗎？

总之，心理学不应該只把自己局限于研究人腦本身(人的高級神經生理过程)。心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作为腦反映現实的一种屬性的人的心理(意識、主观世界)活动的規律。因为产生心理是特定的反映器官——腦的机能，所以心理学研究人的高級神經活动的机構及揭露产生心理現象的腦的活动过程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心理又是極其丰富的客观現实在人腦中的反映，所以心理学考察現实生活的丰富內容、研究各种主观映象的形成过程及其对現实的反作用等过程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活动既是自然現象，又是社会現象。因此，心理学既屬于自然科学領域，同时又屬于社会科学領域。它既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也需要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它既需要有关腦的科学、特别是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动生理学作为它的自然科学基础，同时也需要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反映論作为它的理論基础。心理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兩者之間的一門特殊的科学。

丁瓚同志之所以把人的高級神經活动当作心理学的对象，是由于过度地强調了心理与腦的关系，是由于过低地估計了反映論在心理学中的指导意义的結果。作者在談到用什么态度对待經典著作时就充分暴露了这一缺点。作者在这里特别强調不能把認識論中的意識范疇同心理学中所談的心理活动簡單地当作同义語来应用。自然，把二者簡單的等同起来是不妥当的，因为在心理学中揭露意識的概念时不仅要根据認識論中所揭露的东西，同时也根据了本体論中所談到的东西，而且还以科学上的最新發現加以具体化。但是利用这句話来排斥認識論中意識概念在心理学中的适用，并因此指責心理学家根据認識論或本体論对意識問題所展开的爭論"是一种思想混乱"，我認为，这不能算是一种很謙遜的态度。

列宁說："把思想叫做物質的，这就向混淆唯物論与唯心論方面走了錯誤的一步"。"物質与精神的差别是相对的，不是过度的"。"这个相对的对立底絕对必然性与絕对眞理性之界限，正就是确定認識論研究的方向的界限，如果超过这些界限，把物質与精神、物理的东西与心理的东西底对立認为是絕对的对立，那就是極大的錯誤。"("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第274—276頁)心理学家关于心理的物質性或非物質性的問題的思考或討論主要是由这段話引起的，这是心理学家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現象。而通过这一学習与討論，列宁的这一深刻思想使我們进一步認識到：就認識論的范圍来說，就科学的抽象来說，物質与精神(或意識)是兩个不同的概念，物質的唯一特性乃是客观实在性；而意識則是意識到的存在，它是客观事物底主观映象。兩者是有区别的，客观存在的面包(物質)是可以充飢的，而主观存在的面包(精神、表象)則無法作到这一点。把物質与意識等同起来，不仅使得唯物論与唯心論的对立失去意义，

同时也將要混乱人們对不同对象的区分与認識，因此，列宁認为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在这样一个界限內，把兩者加以对立，是有絕对眞理意义的。同时列宁又非常辯証地告訴我們，如果把物質与精神絕对化，無限度的对立起来，把它們当做死的抽象在現实中加以分割，把它們当做兩个独立的实体，这又將会歪曲現实，同时就会陷入二元論和唯心論的陷井。因为精神、意識尽管不同于物質，但是它依靠于物質，它是現实作用于人腦而产生的現象，对現实产生这种反映現象是人腦的机能与屬性。因此，列宁認为这种对立又是相对的。丁瓚同志对于心理学家們对心理、物質的复杂关系进行眞理性探求时所發生的思疑表示輕蔑是沒有道理的。事实上，丁瓚同志自己是不是眞正辯証地解决了这个問題呢？并沒有。

丁瓚同志認为列宁旣然都說不能把物質的某种構造的理論同認識論的范疇混为一談，所以把精神与物質加以对立的概念只能适用于認識論中，而对于"作为独立存在的科学——心理学"似乎是不完全适用的，其实，这恰恰是弄錯了，列宁所認为的兩者不能混为一談是指責唯能論者把物理学上对物質的解釋代替了哲学上关于物質的概念，因而得出了"物質消灭了"这样一个唯心論的結論。列宁認为物理学上的物質構造理論只反映客观实在的个别方面，而認識論中所談的物質范疇却是反映整个客观世界，因此恰恰証明哲学上的物質概念概括了物理学上所談的物質理論，并且适用于它們。丁瓚同志却脫开了列宁这段話的"精神实質"，而硬把它解釋为物質与精神在心理学中不容許有任何对立。根据反映論本身的原則，我們知道認識論中所談的概念是現实世界的确切的描述、复写，并不是一种方便的虛構。因此，在認識論中所談的"意識是外間世界的反映"，"意識与物質有区別"这样一些概念对于心理学同样是适用的。承認这些概念会使我們在心理学中除了知道感覚、知覚、表象、思惟、情感、意志、及意識傾向与头腦不可分之外，同时也使我們确定不移的知道它們旣是主观的，而它們的內容与来源又是客观的；人的感知、表象、思惟能把握客观实在，因而人也就可以根据現实的規律采取有效的行动。不承認这些概念將会使我們丧失对一切資产阶級心理学中混淆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这样一个原理的反动理論进行洞察与批判能力，使我們离开了对于映象、意識傾向源泉方面的解釋与研究而仅仅埋头于腦神經过程的生理研究。

我們并不同意用哲学来代替心理学，但是，对于主張以人的高級神經活动学說去代替心理学，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是承認哲学中本体論适用于心理学，而有意地在心理学中抛开認識論的原則，我們也是不贊成的。

列宁認为"新物理学之陷入于唯心論，主要正是因为物理学家們不知道辯証法"（"唯物論与經驗批判論"第292頁）。如果我們的某些心理学家之所以陷入了机械唯物論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是否也可以認为是由于忽視了辯証法的緣故呢？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編后記

在过去的一兩年中，我們先后接到不少的讀者来信，希望本刊能刊載一些有关中国哲学史、哲学家的介紹及其論著的評价一类的文章。在这方面我們虽然也曾作过一些努力，但發表的数量，远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最近我們已商得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同意，將他們編的"中国哲学史講授提綱"分期在本刊發表，希望能引起讀者的注意，并願意听到讀者对它的反应。

* * * *

关于近代历史人物的介紹和評价，也是讀者比較喜欢閱讀的，这一期，我們發表了"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与革命精神"一文。以后，准备陆續刊載这一类的文章，希望历史学界多予支持。

* * * *

这期發表"一得之見"兩篇，字数都在二千以上，和一般文章已無大区別。我們依然希望本欄文章字数以千字左右为宜。

* * * *

关于文学方面的文章，这几期，由于其他方面的稿件拥挤，未能刊出。以后，我們將尽量保持每一期都有这一类的文章。

論　　美

高尔太

美学問題是哲学領域中最扑朔迷离的問題之一，关于这个問題，似乎还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这里，我想就这个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可能是不成熟的，但是如果不拿出来，要待它自行成熟，怕遙遙無期。本着追求眞理的精神，我將虛心傾听各方面的意見。

一

首先要提出来的問題是：有沒有客观的美？美是怎样获得自己的？

有沒有客观的美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客观的美并不存在。

我們知道，生命是物質运动的形态，人类的生命是一切生命現象中最复杂、最高級的。生命發展到这一阶段就不再滿足于物質的滿足，不願自己繼續是一种食宿起居中的、生物学上的現象了，于是必然自發地建成一个抽象世界。这个抽象世界，只是对于思維着的人才存在的。它随着人类思維活动的延續和發展，补充着和扩大着。

这个在物質基础上建設起来的抽象世界，是人类思維活动的总和，它包括了人类观念的各个方面。可是要明确，它是一个乘积，不能把它理解成一个容器。美就是这得数的一部分，在研究美学的时候，如果把它从这个血肉相联的背景上分裂出来，就不可能構成关于美的正确概念。

人設立——不一定是意識地設立——一个美的标准，某客观現象符合于这个标准，人們便說，这是美的。就这样，人把美附加給自然了。这个标准是抽象的、主观的，因为它是人类思維活动的产物。而这"符合"却是具体的客观的，这就容易造成一个錯覚：把这符合于人底要求的存在条件当做美自身，以致模糊了研究的对象。

人不可能憑空获得美。人和对象之間少了一方，便不可能产生美，美必須体現在一定物象上，这物象之所以成为所謂"美的"物象，必須要有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說，美感之發生，有賴于对象的一定条件（例如和諧）。但是，这条件不是美。人們不明白这一点，把这条件称为美，这是錯誤的。这一錯誤，構成了現代美学的主要矛盾。

如果沒有欣賞者，条件只是条件，無法轉化为物之屬性，亦卽無法轉化为美。条件不能自成条件，它之所以成为条件，是因为人符合于它（人往往以为是它符合于人）因而能引起人的美感。

当物的某一方面引起了人的美感，这一方面就被称为条件，如果沒有人，何謂"能引起美感"呢？而沒有了这一点，它又成什么条件呢？

条件是冷漠的，客观的，原始的存在，只有对人来說，它才成了条件，它自身沒有什么条件不条件。它自身是原来就存在的。正因为它自身原来就存在，它才不成其为条件。物質是恒一，它不依賴人而独立地存在着，当它的某一方面和人無意地相符合的时候，人便把它派作了条件。这条件不是它自身的意义。

譬說如，泥土是泥土，不是燒罐子的材料，但是，当地球上出現了人，而人拿它来燒罐子的时候，它就成了燒罐子的材料了。我們可以把事物的某些方面派作条件，就如同我們可以把泥土派作燒罐子的材料一样。但是如果要把这条件在人心中所完成的事物——在这里卽引起美感——反过来作为物之屬性，便是荒謬的。当我們解釋泥土是什么的时候，我們不能說：这是燒罐子的材料。因为这一切"糾紛"都是因为有了人才發生的，因为人心里产生了美感。而美和美感，实际上是一个东西。

美产生于美感，产生以后，就立刻溶解在美感之中，扩大和丰富了美感。（我在說明这一点的时候，是按順序来說的，实际上，这过程不包含时間的因素在內，或者，它只包含着最小限度的时間因素。）由此可見，美与美感虽然体現在人物双方，但是絕不可能把它們割裂开来。美，只要人感受到它，它就存在，不被人感受到，它就不存在。要想超美感地去研究美，事实上完全不可能。超美感的美是不存在的，任何想要給美以一种客观性的企圖

都是与科学相違背的。

如果一定要把美說成是物的屬性，得加上一段解釋：这屬性是欣賞者暫时附加給对象的。

有人会駁道，农民不懂得最美的戏剧难道这戏剧就不美嗎？既然美是一种感受，那么对于那个农民来說，那戏剧确实是不美的，你覚得农民錯了，是你覚得农民錯了，在农民那一方面，感覚不到就是感覚不到，有什么錯不錯呢？

对于非音乐的耳，貝多芬的交响乐和一个簡單的音阶練習曲有么什区别呢？誠然，貝多芬的交响乐是美的，但是这美，是对于有"音乐的耳"的人来講的，所謂音乐的耳，是人类文化發展的結果，按其本質，就是感受。

由此可見，引起美感的条件，是一种人化了的东西，这种东西，应該只把它看成一种可能性。

二

主观不能修改客观。当我們覚得某事物是美的，就把这感覚派作物的屬性，实际上就是主观决定客观，这种企圖已被無数次的失敗証明了它的虛妄。这种陈旧的观点，使美学問題扑朔迷离，就像灰塵使油画显得模糊一样。

我們說"牽牛花是美的"，这是人的意識在發表意見，是感覚在表示自己，而不是对牽牛花的說明。生物学家在研究牽牛花的时候，决不会在它的化学成分中分析出"美"这一元素来的。

色彩的和諧与鮮明可以引起美感。但是色彩自身只是光的吸拒作用，它不依賴人而独立存在，也無所謂美不美。当光波的長度是零点七——零点六时，我們便名之曰紅，假如我們不名之曰紅，这种情形依旧存在，我們創造了紅这一个名詞，就是为了代表这种情形，甲虫也看見山茶花的顏色，只是它們不能名之曰紅罢了，既然我們名之曰紅，那么"紅"这个詞及概念所代表的那种东西，就是一种客观存在，这存在不論是否被人感覚到都是不变的。

有人把美看做也和色彩同样是物的屬性，这是唯心主义的或者二元論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承認有一种观念，和物質一样絕对，一样永恒。

光有波动和微粒的二重特性，許多生物根据这种特性給自己創造了視覚，以反映周圍的色彩，明暗和形象，声音有波动的特性，許多生物根据这种特性給自己創造了听覚以反映周圍的声音，美如果和声音、色彩同样是客观物質，或客观物質的客观現象，那么它也必定会具有一个具体存在的物所具有的这种的或那种的特性，我們不是也可以根据它創造一种美覚器官，来感受所謂"美"么？假如眞是这样的話，那么凡是对一个人說来是美的事物，不是对一切人都是美的，像草对一切人說来都是綠的一样了嗎？那还有什么美的阶級性，美的历史性呢？

有人說，美的东西虽然不是对于所有的人都是美的，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是美的，假如沒有客观的美，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一事实，不能用美的客观性来解釋，这个問題的正确答案，仍旧只有到人的內心去找，人，作为同一个世紀的同一种生物，在对事物的态度上即使有很大的出入，都是出入在同一發展水平的范圍內。美学观当然也不能例外。

大自然給予蝦蟆的，比之給予黃鶯和蝴蝶的，并不缺少什么，但是蝦蟆沒有黃鶯和蝴蝶所具有的那种所謂"美"。原因只有一个：人覚得它是不美的。在这个例証中，美的主观性就充分显現出来了。

有一种看法以为美存在于人和物的关系中，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因为把人和物联系起来的还是人腦。

当然感覚有其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但美不等于感覚。感覚是一种反映，而美，是一种創造，就感覚的內容来說，是客观事物，而美的內容，是人对客观事物的評价。沒有了感覚，物体和它的現象屬性依旧存在，但是沒有了美感，美就失去了自己。

美發生在人腦中，我們無法把它移植到物那一方面去。美感不是一个簡單的反射过程，它更深刻，更复杂，永远和理智密切联系着。美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感覚（如香，柔軟等）也就在于这一点。

太陽的光和热是誰都可以感覚得到的，但是太陽的美不是对所有的人都存在。夏天的太陽，对于詩人来說，是美的，但是对于路上的商販来說，却是討厭的。而这美与討厭，同样是由于它的光和热。

不論人們如何反映它，太陽是一个，人們由于它的光热而感受到它的存在。它自身只是一个化学原素的巨大集团，按照質光定律放射着光和热，人們对它的感覚并不影响到它，詩人把它作为力的象征說它是美的，并沒有給它增加了什么。

"美"是人对事物自發的評价。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主观，就沒有美。因为沒有了人，就沒

有了价值观念。价值，是人的东西，只有对人来說，它才存在。

所謂主观地，只是人們自覚地运用自己的意識，去認識世界，認識圍繞在我們周圍的眞实。眞实是"一"。当意識达到这个"一"的时候，就达到主观的充分發揮。

主观力求向客观去！而当它达到客观的时候，便完成了自己。在这中間，人一面認識着自然，一面自發地或自覚地評价着自然。在这評价中，人們創造了美的观念。

由此可見，美底本質，就是自然之人化。

我們凝望着星星。星星是無言的，冷漠的，按照大自然的律令运动着，然而我們覚得星星美丽，因为它純潔，冷靜，深远。一只山鷹在天空盤旋，無非是想寻找一些吃食罢了，但是我們覚得它高傲、自由"背負蒼天而莫夭閼者，摶扶搖而上者九万里"……

实际上純潔，冷靜，深远，高傲，自由……等等，与星星，与老鷹無关，因为这是人的概念。它們自身原始地存在着，無所謂冷靜，純潔，深远，高傲，自由。它們是無情的，因为它們沒有理智，它們是自然。

对于那些远离家园的人們，杜鵑的啼血往往帶着特别的魅力。"一聞一嘆一沾衣"。因为这种悲哀的声音，帶着濃厚的人的色調，易于人化。但是如果它不被人化，它仍旧不会感动听者的。农民不知道关于蜀帝的悲慘故事，他們称杜鵑，为"布谷鳥"，因为杜鵑在春播的时候啼叫，声音好像是"布谷，布谷"。而我，直到現在，还对杜鵑的鳴声保持着一种亲切的回忆，因为当我想起这种叫声，我的腦海中就浮現出一片無垠的水田，泛濫着初春的气息，潮湿的泥土的气息。

在明月之夜，靜听着低沉的仿佛被露水打湿了的秋虫底合唱，我們同样会回忆起逝去的童年，覚得这鳴声眞箇"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其实秋虫夜鳴，無非是因为夜底凉爽給它們帶来了活动的方便罢了。当它們在含露的草叶底庇蔭下，兴奋地磨擦着自己的翅膀的时候，是万万想不到自己的声音会被塗上一層悲愁的色彩的。

白居易写琵琶："小弦切切如私語。"弦和私語毫無因果关系，声音的产生是由于物体的震动，音色决定于震动的形式，这是自然現象，和人的私語無关。但因为它和私語外形上近似，人便把它私語化，亦即人化了。于是覚得它是美的。

这一原理貫穿在一切之中，所有的事实可以拿来做例子，不过这一切都必須有主观条件为基础。

主观要人化客观，不仅要有客观条件，而且要有主观条件，前一点我們已經分析过了。主观条件的基本范疇，根据事实来看，是善与爱的范疇。

爱与善，这是美学上的兩个基本原則。美永远与爱，与人的理想关联着，黑夜的星，黑夜的灯，黑夜的螢光，在我們看来是美的，甚至美到詩的境界，因为我們爱黑暗中的光明，因为它們裝飾了温柔的夜。但是，当我們知道了那是对于狼的眼睛的錯覚的时候，我們就不再爱它，同时，它也就因此消失了一切的美。同是一个現象，黑暗中幽微的亮光，从形式上、直覚上来說，它們是相同的，但是，人憑自己的理性，自己的主观爱憎、修改了它的美学意义。

在人和物的关系中人們很难設想出一种东西：当它在和人沒有利害关系的情形下，我們覚得它是丑陋的，同时又爱它，或者反过来，覚得它是美的，却憎恶它。

我們爱大自然，就是因为大自然的美。

我們爱某人，如果不是因为那人的外貌是美的，便是因为那人的灵魂是美的。反过来，如果我們覚得某人的外貌或者灵魂是美的时候，我們便会爱某人。

这些例子是平凡的，淺显的、簡單的、但是它的內部邏輯，却有着很重要的价值。

人，永远是社会的成員，是生活中的人，他所感受的不仅是大自然，也有社会生活，因此，当美感的对象是社会生活或类似社会生活的現象的时候，它便不能不染上倫理学的色彩。

美是与善相联系的，恶的东西总是丑的。

任何东西，只有在不和至善相違背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美的东西。在艺术中，恶的形象总是否定着自己，也只有在自己的否定中，它才能获得美学上的地位。美的东西总是体現着人的理想，善与爱概括着一切人所要追求的东西，也就是概括着人的理想，因此，美如果离开了善与爱，便無法获得自己的意义。

許多人錯誤地把美看做客观的东西，因此当他們在研究美底規律的时候，到对象上去寻找答案，尽在一些毫不相干的事物上轉来轉去，看不見眞理，有人說，美的东西，是在个别中显現着一般的东西，有人說，美的东西是"最完滿地体現了那在生活中支配它的規律的东西"……等等，这些理論

都是經不起分析的。要駁倒前一点，只要指出一个事实就够了，有許多丑恶的东西，都是典型中的典型，在个别中显現着一般。

宇宙間并沒有一种自然存在的东西，不体現着自然的規律，不体現着自然規律的东西就不会存在到这个大地上来。假如按照季莫菲叶夫的說法，不是凡普天下的东西，沒有不美的了嗎？显然，事实并不是这样。

这种錯誤研究的結果，出現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規范：对称均衡，多样統一，和諧鮮明……之类，不必枚举，構圖学上更出現了一种叫做黃金律的东西，說是物体按照一比一点六一八的比例安排，就会是美的，等等。事实上，这些都不是美的依据。有些毒蛇身上的圖案是組織得很好的，既和諧，又鮮明，不仅对称均衡，而且多样統一（多样統一中有着黃金律所追求的东西）。但是，我們不可能对蛇發生美感。因为人是不爱蛇的，而且，蛇的行为使人想起杀害，又和善相矛盾。違背了这兩个基本的美学原則，虽然在外部形式上無可指摘，蛇却不可能因此获得美。

事实上，只要違背了这兩个互相关联的基本原則，任何事物都不会被人化为美的事物的。

正确的答案永远包涵在問題中，美既然是主观的东西，美的規律也只有到主观中去寻找。

善与爱的原則，是唯一正确的原則，因为只有它适用于一切場合。

人們会問，难道在忘情时人也傾向着善或爱嗎？

在很多情形下，美的感受可以使人忘記一切，忘記生活，在美感底最緊張的高度（这緊張往往最不易被覚察），一切别的东西都会消失得無影無踪。这种情形，通常被称为忘情。但是，在事实上，人永远不会完全忘情。如果眞的竟完全忘情，美就不再存在了，所謂被美所陶醉，或所謂忘情，实际上就是美的感受压倒了其他一切心理活动，这时候，我們往往并不使用任何詞彙，只是惊訝地嘆賞着。这是一种無辞的贊美，这無辞之詞滲透着爱的眞义。

这贊美，永远是人的贊美。

三

雄偉的概念就是美的概念。这里特别提到它，是因为有人把这兩个概念分开。車尔尼雪夫斯基說，雄偉和美是兩回事，这是不对的。

雄偉是美的外部形式之一，把雄偉和美分开，就取消了雄偉。太陽，大雷雨，風暴的海，獅子，金字塔，喜瑪拉雅山，迎風招展的大旗，斯芬克斯，悲剧，正义的憤怒……都是美的，因为它們雄偉。

既然雄偉的概念就是美的概念，那么雄偉也必然体現着善与爱。

傳說中的惡煞有时往往比巨人更加声势洶洶，但是人們不可能在惡煞身上获得雄偉的印象，因为人們对惡煞憎恨，恐惧的观念，驅逐了雄偉的观念。

車尔尼雪夫斯基美学因为还帶着一些形而上学的色彩，以致在这一个問題上被形式邏輯逼进了牛角尖，無法把雄偉的概念和美的概念統一起来。为了一个狹隘的理論底完整性，便把珍珠說成宝石，未免有些不当。

四

不被感受的美，就不成其为美。艺术把掩盖在生活中的美之条件表面化，讓更多的人感受到它，这就給了这条件以美之生命。

所以，事实上，艺术在創造着美，这美不是在艺术家的劳动过程中，而是在讀者受到感动的时候产生出来的。

只要是有丰富的內心生活，有深刻的感情的人，有誰站在高山上眺望着藍灰色的大地，無动于衷呢？或者，他会"登泰山而小天下"慷慨激昂"气吞万里如虎"；或者他会在广闊的大地面前感到生命的渺小，喟然太息，或者，他会被这古老，美丽的土地所感动噙着滿眶的热泪罢？或者会有别的，不能尽述。且讓我們来分析一下我們的大地罢；它是田塍、道路，叢林，池沼，山崗，村庄，塚叢……組成的一个广大的、赤裸的平面。在这平面上活动着的，是生活：人的生活，动物的生活，池沼中的生活与叢林中的生活……一切按照它不得不按照的規律完成着自己，一切眞实沉沒在眞实中。这就是一切。可是，当薄霧無声地升起，一切披上藍灰色的輕紗，显得朦朧而模糊的时候，詩人在自己的高峰上就会被这平凡感动了。也許，灵感会像一支受惊的小鳥似的，在他的腦中突然出現罢，誰知道？如果眞是这样，誰能說，这灵感原先就生活在这原野上，如今落到詩人的罗網里了呢？

把这灵感孕育成詩，把它翻譯成文字，就成了艺术。所以我們可以說艺术是艺术家灵感的再現。而艺术灵感的內容是美，因此，善与爱的原則，也

就是艺术的原则。

艺术教人去爱，教人从"美"的角度去看大自然，去看圍繞在自己周圍的眞实世界。

艺术是人道主义的武器，它教人不懈地向善努力。它教人行动，勇敢地、热情地建設自己的生活。

艺术中的反面形象总是包涵着否定的意义，艺术中的乞乞科夫否定着現实中的乞乞科夫，艺术中的答尔丢夫否定着現实中的答尔丢夫。也只有在这种否定中，形象才能获得美学的意义。这种否定性，在現实中并不存在，所以艺术中的人往往具有生活中的人所沒有的美。

現实中的罗亭只会發議論，屠格涅夫的罗亭叫人去行动，而屠格涅夫的罗亭之所以能叫人去行动，就因为他自己是不行动的。我們贊美"罗亭"，是把它作为号召人們积極行动的号角来贊美，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健談者的写照来贊美的。

車尔尼雪夫斯基把艺术看做現实底蒼白的复制，这是錯誤的，艺术是灵感底再現，它創造着美，創造着現实中所沒有的东西。我們不能欣賞現实中的乞乞科夫，但是能欣賞艺术中的乞乞科夫，就因为艺术中的乞乞科夫包涵着自己的否定，这否定体現着作者至善的願望，体現着美。

有人会說，把艺术看做灵感底再現，不是把創作活动变成一种翻譯工作，取消了艺术家的劳动嗎？不。艺术家的全部劳动（包括主題的孕育在內），在于努力完滿地表現自己的灵感，亦即表現那激起他全部創作热情的东西。思想，灵感不是在創作过程中"形成"的，它們是刺激創作动机的东西，是先有思想，而后才有創作欲望。不是先有一种空洞的热情，这热情使人开始了工作，为这工作才产生了內容的。

艺术和現实关系的全部复杂性，反映着人类思維活动的全部复杂性，車尔尼雪夫斯基簡單的結論："艺术是現实蒼白的复制"就否定了这种复杂性。所以这个結論是錯誤的，把这一錯誤加以發揮，車尔尼雪夫斯基又說：生活的美高于艺术的美。虽然生活和艺术不是对立的，但畢竟还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不应該互相放在之上或之下。

艺术的美和生活的美是一个內容，虽然它們体現在兩种不同的东西上，当人感受着美的时候，他的心里活动永远是用同一方式来进行的。不被感受的美，就不成其为美，而美，作为感受，它永远是眞实的。誰也無法說明，什么感受是眞的，什么感受是受了欺騙。因此，我們就無法把这一种感受和那一种感受拿来作比較。感受就是感受。無所謂"这一种"和"那一种"。我們黃昏到河边去散步，为自然所陶醉，与我們讀一首詩，为詩情所陶醉，有什么区别，什么相干呢？同样是感受，同样是陶醉，如何比較呢？

五

哲学用概念来說話，而艺术是用形象来說話的。艺术作品的深度寓于形象的深度，而形象，作为美的材料，也不能違背善与爱的原則。

只要是体現着善与爱的形象，就是美的形象，我們在評价艺术劳作的时候，首先要看它是否督促人們向善努力。这种願望是否表現出来。表現得充分不充分，要看它是否教导人去爱自然，爱人类。

善于爱，这就是艺术批評的原則，这原則是从美感产生的規律中寻找出来的，不是人为的，因此它适用于任何場合。

过去，在許多場合，人們往往不能得到一致的結論，便說別人的感受是錯誤的，否定別人的感受，互相否定的結果，反而使問題更加問題化。

托尔斯泰在讀了契訶夫的短篇"宝貝兒"以后指出这个短篇收到了与作者的企圖相反的效果，但是我看了这个短篇却完全同意契訶夫的态度。我和托尔斯泰是誰錯了呢？誰也不錯，对于托尔斯泰来說，这个作品事实上收到了反面效果，就和对于我来說，它收到了正面效果一样，我們尽可以說，托尔斯泰錯了，因为他帶着宗法制农民思想的有色眼鏡……等等，但这是我們在說。在托尔斯泰那一方面，他只是指出一个事实：这篇小說在他那里收到了反面的效果，事实就是这样，有什么錯不錯呢？如果我們要来否定事实，我們就錯了。已經發生的事不可能被否定，我們不可能憑我們的意志去修改客观事实，就如同不可能修改历史一样。这里，各人指出各人的感受，誰也不錯，誰都是說的事实。誰也不能否定別人的感受。

唐·璜和吉訶德是作者鞭撻和諷刺的对象，但是，在魯道夫、洛克尔的笔下，他們又获得了某种肯定的意义，这是事实，在这样的事实面前，离开了善与爱的原則，便無法解决它的矛盾。

事实上，奥蓮卡、唐·璜，吉訶德，都是美的形象，因为無論人們如何理解他們，他們都教人行动、教人爱，教人向善努力。

有誰說过"如果不指出方向，同时向一个修道

士和一个革命家叫道，前进，他們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走。”我的美学是不是会像这沒有方向的前进令一样呢？不，因为至善的方向，只有一个：爱人类，爱整个大自然。

这个原則是否太抽象了呢？不，它适用于艺术，就像时鐘适用于时間一样。鐘是根据时間制造的，同样这原則是从美底規律中寻找出来的。算盤和尺固然具体，但是尽管具体，它不适用于时間。

艺术反映着人类內心生活的全部复杂性，把这复杂性簡單化，物質化，規律化，就不可能了解艺术的全部涵意，就会歪曲了艺术，降低了艺术，虽然这种歪曲和降低不可能損害艺术家本人，就如同尺和算盤不能損害时間一样，但是却对人类文化的發展極其不利。

六

在文学和艺术的領域中，詩占着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和美一样，詩也是一种感受，不过它比美更深微，更复杂，更辽远。

詩沒有自己的物質形式，就像对事物之一般性的認識用概念的形式存在于人的腦中，詩也只是用詩意的形式在感受中产生出来，詩意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現象，它主要地是屬于感情的范疇。

但是，詩的概念已經被形式的概念修改了，在許多地方，甚至已經被代替了。人們看到“詩”这一个名詞，总是想起某种文体。漸漸地把这种文体和詩的概念結合在一起，終于掩盖了詩的本質。

文学史上曾經出現过一种叫做“哲理詩”的东西，的确，也有人用这种形式表現过許多輝煌美丽的思想，像泰戈尔永垂不朽的詩篇就是一个例子。但是，絕大多数的所謂“哲理詩”，只是穿着一件詩的外套，而肉体却是一些渺小的哲学思想，詩虽然比之于美更为理性化，但畢竟和赤裸裸的思想有本質上的区别，如果那些东西也称做詩、称做艺术的話，就得修改詩，修改艺术的定义。

形式的概念就是物質的概念。詩与它的外部形式的关系，就和人的思想与肉体的关系一样。許多东西虽然借用了詩的正常表現形式仍旧不等于詩，就像“悉如生人”的腊人不等于眞人一样。

老是在形式的問題上兜圈子，便無法接触到詩的本質，形式主义在我国曾經發展到这种程度，甚至有人提出要求詩的建筑美，这种現象是一种病态的現象。

美感發展到最高阶段就成了詩。美是詩的基础。和美一样，詩永远体現着善与爱，不体現着善与爱的就不成其为詩。

果戈尔的叙事詩，伊凡·伊凡尼奇和伊凡·伊凡佛罗維奇吵架的故事，从外表上看，只是一片灰色，可是，你細細咀嚼一下罢，这灰色中躍动着多么强烈的生活底渴望啊，就是这渴望賦給了这个短篇以濃厚的詩的特質，如此眞实，如此强烈。

最朴素的語言，就是最美丽的語言，因为語言愈朴素，它就愈接近于眞。抒情詩最珍貴的特点就是眞摯，沒有了这一点，其他的都談不上。民歌之所以可貴，主要就在这里。

因此評价詩首先就要看其中有多少詩。

好罢，这篇論文就此結束了，这里全部美学理論，尤其是关于詩的理論，似乎太抽象了，但是对于本身是抽象的东西，我們只能抽象地說到它，否則就会損害它。对与不对，讓时代評判罢。

編者附記：本文基本論点是：美是主观的东西，客观的美是不存在的。我們認为：这样的論点是很值得商榷的。不过，本文尙能言之成理，而且还代表着一部分人的看法；因此，本着“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精神，我們把它發表出来。我們还打算在下期發表和本文論点相反的文章。希讀者注意。

訂　　正

本刊上期第24頁右欄第17行“中古代”应为“中国古代”，第54頁右欄第20行“表象或观点”应为“表象或观念”。特此訂正。

一得之見

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名称問題

王　瑤

我們的文学史应該命名为"中国文学史"呢，还是应該叫做"汉文学史"？目前对此是有不同意見的。我以为"汉文学史"的名称很不妥当，应該仍命名为"中国文学史"．而在內容上把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史的材料适当补充进去。

为甚么"汉文学史"的名称不妥当呢？如果"汉"指汉語，則由汉語写成的文学作品在日本、朝鮮、越南都有，是否也应該成为"汉文学史"的对象？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文学虽然是語言的艺术，但它反映的是各时代的人民生活，帶有很显著的时代的和阶級的特点；我們不能把語言工具来当作文学作品的本身，取消了一切思想內容和形式風格的特征，取消了各时代文学和人民生活的联系。过于强調語言的重要性，則是否譯文优美的翻譯作品也可以算作是汉語的文学創作呢？这是不能不連帶引起的問題。如果"汉"指汉族，則首先牽涉到汉民族的形成的时代問題，而上古的一些作品也只好权且归于汉民族所独創，这已經不大妥当，但困难还不只此．我們还須从現有的文学史材料中剔除一些过去所常講的东西。不要說北朝的民歌（如"敕勒歌"等）了，就是作家也在所不免，譬如元代著名的散曲作家貫酸齋，就不是汉族人。这样的作家和作品早已成为我們文学史的有机部分，現在是否应該因为作者的民族成分而被排斥呢？过去我們曾批評过那种不从具体作品出發，而由作者的阶級成分来肯定作品的企圖，認为那是一种庸俗社会学傾向，現在則要求首先审查作者的民族成分了．这又算是甚么傾向呢？而且有些作家的民族出身是向有歧說的，譬如李白这样偉大的作家，究竟是否能确定为汉族人，也还不是沒有問題的。表面上看，这样做是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思想，貫徹了民族政策，实事求是的处理問題；其实不然，我們文学史上产生了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魯迅等这样偉大的作家，应該說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驕傲，他們的作品也是大家共有的財富，而不应該視为是汉族所独有的。可以設想，如果我們在講壇上大講其我們汉族詩人如何地偉大等等，而听講者当中有各兄弟民族的学生，他們將如何感想？因此說，这不是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思想，反倒是宣揚了那种思想。我們除过充分尊重各兄弟民族的文化傳統以外，也应該承認中国各族人民所創造的文化是有它的共同特色的，我們不能以为过去的优秀傳統仅为汉族人民所独有。如果把"汉文学史"的"汉"字确定为兼指汉族、汉語二者，即汉族作家或人民用汉語所創作的文学發展历史，問題也仍然沒有解决；因为它不只排斥了非汉族作家的作品，而且也强使汉族作家为汉族所独有，而这是很不恰当的。我們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因为他的坚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是有利于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解放事業的，因此我們絕不能說魯迅的方向只是汉族新文化的方向。有人还举出魯迅的"汉文学史綱要"来作为主張"汉文学史"这一名称的理由，但不只他同时还有"中国小說史略"的書名，而且这些都是他早期的著作，他根本沒有考虑到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問題，这是很难作为論点的依据的。

为甚么像中国哲学史、中国科学史等学术部門不發生这样的爭論呢？它們所講的哲学家或科学家的民族成分和所用的語言工具都与文学史所講的大致相同，但似乎沒有人主張命名为"汉哲学史"或"汉科学史"的爭論。这就牽涉到文学和語言的关系問題；就語言說，它是民族構成的要素之一，汉語就是汉族人民所用的語言；我們不能說汉語就是中国語，因为各兄弟民族都有他們自己的語言。但这是否也适用

于文学呢？就不尽然。文学虽然是語言的艺术，但它与語言本身不同，語言仅只是文学創造的工具或材料；在性質特征上它倒是与哲学相似的，例如都有阶級性、思想性、革命性等等問題。文学作品可以反映各族人民所能共同理解的現实生活和思想感情，也能同样給他們以艺术的享受和滿足。当然，閱讀文学作品是必須首先要通曉語言的，但閱讀哲学著作也一样，而且它們都可以經过翻譯而为不懂汉語的人所接受和理解。偉大的作品經过好的翻譯仍然能給人以强烈的感染，使讀者完全理解它所表現的內容；而这一点，就与語言很不相同。汉語經过翻譯后就再也不是汉語了，要理解汉語的本身就不能通过翻譯。由此可見，由于"汉語"名称的确定，而以为必須把文学史也改为"汉文学史"的那种意見，是只注意到文学与語言之間有密切关系的一面，却忽略了文学史的对象是文学，而文学在性質上是与語言根本不同的。

当然，無論过去或目前，許多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和大学的講义，內容都是有缺陷的；它們大都对各兄弟民族的文学發展情况講得过少，而这是不应該的。由于長期的历史隔閡，目前要弥补这一缺陷的确有实际困难，大家掌握的材料都非常不够，而这又不是馬上就可以解决的。但逃避問題并不等于解决問題，如果把"汉文学史"的名称确定下来，反而使大家安于現狀，不积極去搜求和研究各兄弟民族的文学史材料了，这对目前的缺陷是毫無补助的。反之，如果大家都認为名称应該是"中国文学史"，內容应該包括各兄弟民族文学發展的历史，那倒可以推动大家积極地展开对各兄弟民族文学的研究工作；那么經过一定的时間，目前这一缺陷就可以得到补正，而后来的学習中国文学史的人也就可以比較全面地了解中国各民族文学發展的面貌了。

一部文学史著作的內容是否可以包括不同民族用不同的語言所写的作品呢？这样做是否适当呢？应該說这是不成問題的。譬如我們見到过許多种的欧洲文学史，那論述的对象就是不同国家用不同語言所写的作品，但在文学史的發展上又都是彼此有連系的。就我們国家說，我們的文化和古典文学应該視为全民的財富，用不同語言所写的好作品也应該通过翻譯尽量使各族人民都能閱讀；因此把"中国文学史"的內容扩大化不只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是适当的。

基于上述理由，我不贊成采用"汉文学史"的命名，而主張仍用"中国文学史"的原称，將其內容加以扩大。

1957年1月9日

定息与对抗

澤厚　亦讓

討論当前中国工人阶級与民族資产阶級的矛盾性質是否对抗的問題，不能从抽象的对抗概念的形式邏輯式的演繹出發——（如先下一个对抗的定义然后据之以作推論），而应該从分析具体的定息問題的矛盾着手。定息是解决对抗問題的关鍵。

为什么呢？因为定息是今天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个性所在。定息是今天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区别于它的过去、区别于一切外国的資产阶級、也区别于今天国內的一切其他的阶級的地方。定息是今天中国民族資产阶級作为阶級存在的根据和本質。所以，只有具体地分析定息的来龙去脉，才能眞正地了解当前阶級矛盾的情况、性質及其發展前途。

定息是否剝削是否剩余价值？这是爭論得很热鬧的問題。我們的意見是：它是剝削（剩余价值），又不是剝削（剩余价值）；它是过去剝削的成果，而不是現在的剝削；它是过去的剩余价值（資本）的轉化形态，而不是現在的剩余价值。因此，現在爭論的双方是各抓住了一个片面。

定息是国家"贖买"的一种方式，即通过利息的支付，去兌換作为資本家生产資料所有权的

資本（定股金）的过程。定息的特点在于：它是通过肯定資本而去否定資本。肯定資本，是它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否定資本，是它存在的必然結果。对資本家一方来說，他的資本仍然存在，但已轉化为凝冻的定息；对国家一方来說，承認了資本家的資本的合法存在，但用定息去兑换即贖买它。資本家取用定息，是取用自己的資本，消費自己过去的剝削成果；国家付出定息，是付出兑换資本（生产資料所有权）的贖金。贖金当然有兑完的一天，从而定息也必然有期限。

很明白，定息在这里就并不是今天的剩余价值或剝削，否認这点就無法理解現阶段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存在的特征及其必然消亡的不远的前景，就会得出定息前后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經济地位并沒有什么質的变化的錯誤結論。同时，另一方面，因为定息是資本的贖金，对資本家来說，就仍然是过去剝削成果的体現物。否認这点就無法理解現阶段中国民族資产阶級仍作为阶級存在的根据，就会得出今天資产阶級已完全消灭的錯誤結論。

在实行定息办法以后，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本質有了根本的变化。因为，在以前，資产阶級的存在是以剝削工人阶級为基础。它与工人阶級的矛盾的性質是一方的存在以压榨、損害另一方为必要条件。所以，撇开矛盾的形式不談，即以这种矛盾的性質来說，就显然是产生对抗的基础和本質，因此也可以說这种性質本身就是对抗的。有些同志因为看到当前矛盾，已非对抗，便只就形式来論对抗，这就等于取消問題。因为資产阶級与工人阶級的矛盾無論如何在性質上就根本不同于农民阶級与工人阶級的矛盾。

所以，我們認为当前中国民族資产阶級与工人阶級的矛盾的非对抗性，所持的理由与这些同志不同：我們主要是具体地从今天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經济地位的特点出發：今天民族資产阶級只是依靠定息过活，即它的阶級存在只是因为它有定息的收入。而定息如前面所說，并不是現在的剩余价值的剝削，而只是資本的兑换物。所以，今天中国民族資产阶級就已經不再是依靠剝削工人过活，而是依靠它过去剝削得来的成果过活。而这种过去的剝削成果，是工人阶級为了自身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自动地予以承認并用贖买来换取它的。很清楚，这样今天中国的民族資产阶級的阶級存在就已不再以剝削、損害工人阶級的利益为必要条件，而以承認和接受工人阶級的贖买为特征。它与工人阶級的关系就已是一种等价交换的买卖双方的平等、互利的关系。所以，这里的矛盾当然就不成为对抗性的了。馬克思說得好："資本只要不發生机能，也就不剝削劳动者，不是与劳动相对立出現的。"（"資本論"第三卷，第476頁）

从而，在这里开始了中国民族資产阶級的質变：它开始具有二重身分。这二重身分不同于以前的所謂二重性。因为后者的积極面与消極面都不脫資产阶級的本質和范疇，而前者却已超出这范疇。这就是說，一方面，只要資本家还領取定息，它仍然是依靠了剝削收入（即使是过去的剝削成果）过活，就仍与劳动人民在經济地位有根本的不同从而構成阶級的差异和矛盾；但另一方面，現在資本家在企業中工作，已不再是为了自己的利潤，而与一般劳动人民一样，是为了全民利益在工作，因此，这就使資本家获有了劳动者的身分。而且在許多中小資本家那里，作为劳动者的薪金收入常远远大于定息的收入，即他們的生活主要是依靠薪金而不是依靠定息，所以这些資本家就可以算作以劳动为主的小資产阶級。在这里，当然就更談不上什么对抗了。然而，我們許多同志却看不見資产阶級經济地位这种具体的变化，而抱住一个"剝削就是对抗"的抽象、空洞的大前提，通过形式邏輯三段論式的演繹——"資产阶級現在仍有剝削"，所以"資产阶級与工人阶級仍是对抗"——，得出了錯誤的結論。

所以，如果說，感覚到了当前矛盾的非对抗，但不能从理論上来認識其本質和規律从而簡單地取消性質問題，是一种經驗主义的表現的話；那末，抱住一个"剝削＝对抗"的公式而不問倒底当前是怎样的剝削便急急地来作理論演繹，这就只能是脫离实际的書房里的教条主义。

学术动态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討論尚鉞主編的“中国历史綱要”一書

尚鉞同志主編的“中国历史綱要”，自1954年出版以后，受到广大讀者的注意和欢迎，在报章杂志上出現过不少介紹和評論文章。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为配合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修改自編教材，在去年12月27日召开教研室全体教师会議，由邓广銘教授主持討論这本書。

在討論时，大家首先感到在过去乃至目前情况下，編写一部中国通史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因为它沒有大量專門性著作和論文可供参考，許多重要的历史問題尙在爭論和研究之中，很难一下做到完善無缺的地步。因此，这本書虽然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优点，例如，它比較系統地闡述了中国历史的發展，提出若干新的論点有助于中国古代史分期問題和資本主义萌芽等問題的討論，并且文字簡潔扼要，……但同时它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不少缺点，根据到会同志的發言，这些缺点大致可以分作对历史問題的看法、在处理史料和叙述史实方面的錯誤。而史实的錯誤，在这本書中尤为严重。

同志們在討論会上發言的全部內容將另有專文發表，这里介紹的只限于到会同志对書中某些历史問題的看法所提出的一些意見：

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很多重大的历史問題，其中有一些問題，如古代史分期問題和資本主义萌芽問題等，因为內容比較复杂，需要組織專門性会議进行討論，在这次会上大家沒有也不可能开展深入的爭辯。这次会議的討論中心，集中在这样問題上，如对先秦文化的估計、关于書中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問題的处理、关于秦汉时商業資本的作用、关于汉代的奴隶問題、唐宋庄园制的問題、有关資本主义萌芽的一些問題和書中存在的大汉族主义問題等。

对先秦文化的估計問題　書中对先秦文化的估計，有很多人認为是过低的。翦伯贊教授指出編者把周武王攻商解釋为血族复仇（第10頁），認为春秋时代的盟会是“各大国利用过去部落酋長会議来解决小国朝聘的問題”（第19頁），都很不妥当。張政烺教授也不同意編者在叙述“仰韶文化”时，說当时人过着“已經脫离了‘原始人群’的流浪生活”（第3頁）。因为在距今十万年前的旧石器中期，原始人群即已不存在，而仰韶文化离开現在不过几千年。書中說周族到古公亶父时代（約为公元前1300—1200年間），还过着“穴居野处的游牧生活”（第9頁）。这是一种誤解，因周人“陶复陶穴”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至今陝西黃土高原上的人还住土窰洞，至于当时周人的經济生活，則早已在公刘时，就“徹田为粮”了。其他如書中說战国时秦孝公以其大氏族家長的地位，强制实行各种改革，并把商鞅变法的一些內容看作“廢除旧氏族社会聚族而居的土地上的阡陌封疆”，“划一各氏族部落的斗桶、权衡、丈尺”（第22—23頁）。也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同时，書中述說先秦部分过分簡略，也是对它估价不足的表現之一。陈仲夫同志認为編者不应过于机械地貫徹“詳今略古”的原則，先秦文化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占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它最足以使生活在这一个古老国家的人民感到自豪，書中沒有用足够篇章来叙述它在政治上、經济上、文化上的貢献和成就。自然，書中在叙述这一段历史时，也有一些应該提出的优点，吳荣曾同志認为書中推断：殷和西周的农具仍然是木、石器具，是很正确的，只有对古代生产力作出正确的估計，才能对古代历史的發展有正确的理解。他还同意編者这种意見：即周初的分封具有部落殖民性質，不能說当时分封諸侯就意味着出現了新的生产关系。

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問題　在处理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問題上，編者为照顧目前历史界对这一个問題爭論情况，曾表示在这本書不作“盖然性或臆測式的判断”（“編者的話”），力求从具体

事实出發来說明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發展，而实际上書中还是一直坚持自己对古代史分期問題的意見的。在編者根据自己意見来叙述这一段历史时，由于考虑不够严密，产生許多前后矛盾和混乱現象。張政烺教授指出：編者本意是把秦汉当作奴隶社会来描述的，可是書中从西汉建国时起，就說：人民"被飢餓强迫着，淪落为农奴或奴婢"（第34頁），以下終西汉之世，都是农奴与奴隶并書。如書中說："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主要表現在土地的侵占和农民、农奴、奴婢的反抗斗爭上"（第45頁），到了东汉，农奴的名称不見了，农民和地主的名称到处出現，如說刘秀能完成統一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他能团結大部分地主武裝"，东汉政权是"由地主阶級支持起来的"（第52頁）。和帝时，"小农被地主殘酷压迫和剝削而被迫逃亡"（第54頁），从汉明帝到和帝时，东汉政府有許多措施"促进封建經济發展"（第54頁）。但接着，又把黄巾起义說成是"农民奴隶起义"（第63、64、65頁），似乎奴隶又成了阶級斗爭的主要力量了。到曹操屯田許昌时，書中又說这些屯田者"变成了农奴"（第67頁），西晋实行占田制后，"使基于土地等級占有的农奴制經济获得确立"，"課田的收获物全部归朝廷——这是劳役地租的性質"（第76頁），也就是說，西汉初年的农奴制，經过西汉一代农奴和奴隶并存时期、东汉的封建地主和农民的对立阶段，和东汉末年的奴隶制社会，到三国西晋又重新回到农奴制时代了。这种扑朔迷离的写法不仅使讀者难以抓住这一段历史發展的綫索，甚至連一些贊成尙鉞同志对于古代史分期問題看法的同志也不能同意。編者必須对这些混乱現象設法加以澄清。

秦汉时商業資本的作用問題　由于書中沒有很好地去分析这一段历史中的社会現象，因此对于秦汉时代的商業資本的作用問題也連帶作了不正确的估計。張政烺教授、汪籛副教授和田余庆同志都認为这本書把秦汉时商業資本的作用夸大到歪曲事实的地步，例如書中說秦的"統治政策，首先在經济設施上为商業資本的活动开辟道路"，秦始皇"修馳道"是"为便利工商業的發展"（第27頁），以至"書同文"也被列为經济措施之一。为了减低秦汉时政府实行"崇本抑末"政策的作用，編者就把当时商人分为大商人和中小商人兩种，硬說大商人受到政府的扶植，而被政府打击的則是中小商人。例如，書中把商鞅对"事末利"者的懲罰解釋为仅仅是对"做小生意的"懲罰；又把汉武帝推行算緡錢的財政經济措施的結果："中家以上大氐破"，顚倒过来解釋为："于是中小商人也多破产了"（第45頁）。商業資本曾經为各种形态的社会服务过，編者在这里任意强調并歪曲商業資本的作用，对于編者所持的秦汉是奴隶社会这一意見是并無裨益的。

汉代的奴隶問題　对于汉代的奴隶問題，聶崇岐教授發表了一些屬于学术爭論的意見，就是他不同意把汉代社会看成奴隶社会，并举出三点理由：第一，汉書百官公卿表說武帝时刺史以六条問事，其中第一条是"彊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彊凌弱，以众暴寡"，这里所謂强、弱与众、寡不能解釋为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第二，汉書刑法志記載汉文帝除肉刑、定律："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鉗为城旦舂……罪人獄已决，完为城旦舂，滿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舂，隶臣妾一岁免为粲人"，如果汉代是奴隶社会，那么代表奴隶主利益的政府为什么会除肉刑，会免隶臣妾为庶人呢？第三，書中把徒釋为奴。徒的古义是奴，但春秋以后，含义就变了。孔子称他的門人为徒，曾說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这里所称的徒，自然不是奴隶。又如刘邦送徒到驪山去，中途釋放他們，并說："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可以被称作公，当然也不是奴隶。但有的同志对聶崇岐教授的意見持不同看法：第一，"以彊凌弱，以众暴寡"是否为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这一問題，并不能作为論証汉代社会性質的根据，因为这里只能显示出阶級关系的一部分，同时这一材料也并未說明完全不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第二，在一定条件下免罪犯为庶人，在奴隶社会中并非不可能，而且免为庶人的人数，比起庶人轉化为徒的人数来，总是少数；第三，称門人为徒，是徒字的另一涵义，与罪徒身分問題沒有关系，刘邦在釋放罪徒时称他們为公，并不意味着罪徒在服刑期間也会受到身分上的尊重。

唐宋的庄园制問題　到了唐宋这一部分，大家主要討論的是庄园制問題，邓广銘教授指出，書中說到中国庄园制的"早期形式为官僚、地主的别墅、别業和山庄等，与西欧胎源于农村公社的庄园制度不同"，但这里所謂"早期"很可能是指"萌芽于东汉，而在东晋、南北朝逐漸形成"的"庄园制的土地占有形态"（第146頁）而言，因为編者所描繪的唐宋庄园制和西欧庄园是非常相似的。例如書中說：唐代"大多数庄园除庄宅及其附近的田地之

外，还包括有果园、菜园、碾磑、店鋪、茶园、鹽畦、車坊以及山澤森林"；"如楚州淮陰的'农者'（普通地主），其庄园中設有'家机'，織造綢絹，有銀匠打制銀器，有庄客耕种庄田"（第148頁），这表明：庄园中有多种多样的生产，是一个自給自足的單位。又說："佃客在当时虽不能被任意买卖，但在經济和政治上所受的剝削和压迫，与农奴几無区别。他們是庄园主的"私屬"，被束縛在土地上，对庄园主構成人格上的依存关系……甚至女兒出嫁或佃客'身故，其妻改嫁'，也都不得'自便'，要听庄园主的主宰和支配"（第150頁），这表明：当时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非常强。关于这种庄园在唐宋社会經济中的地位，編者的估計是：中唐以后，"庄园制便成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經济的主要形态"（第146頁），北宋时，进一步"成为土地所有制的絕对支配形态"（第200頁），于是唐宋时代的社会經济就不能不和西欧中世紀的中期相似了。邓广銘教授認为庄园名称在唐宋时代是存在的，問題在有什么材料可以証明唐宋庄园是像編者所描述的那样呢？又有什么理由可以說当时那样的庄园已"成为土地所有制的絕对支配形态"呢？他不同意把唐宋庄园描述得和西欧一样，認为編者在引用和解釋史料方面，不够愼重，并且輕易下結論。例如書中介紹庄园情况之一："官庄租額每亩約为谷三斗、草三束、脚錢一百二十文"（第149頁），这段話的根据是"元氏長庆集"第三八卷"同州奏均田狀"中的"当州京官及州县官职田，公廨田并州使官田、驛田等"一条。可是我們从元稹那篇文詞里，并看不出什么官庄，看到的却是"州县逐年抑配百姓租佃，或有隔越乡村，被配一亩二亩之者，或有身居市井，亦令虛額出税之者，其公廨田、官田、驛田等，所税輕重，約与职田相似，亦是抑配百姓租佃"，那些被抑配租佃一亩二亩田地和身居市井的人，是不会和国家發生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如像書中所描述的那样。書中介紹庄园情况之二："至（宋）英宗时則全国垦田三分之二左右掌握在庄园主手中"，"到了宋英宗时，全部田賦的負担几乎都落到耕种不足全国三分之一的垦田的貧苦农民肩上了"（第200頁），我們从"文献通考"卷四："田賦四"中"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一語，就可知道編者是把"賦租所不加者"完全归到庄园主的名下，而庄园主又被認为几乎是全都不納賦租了。編者沒有注意唐宋的"庄田"只是对"桑田"而言的，也完全沒有看到唐宋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租佃关系，而把自耕农以外的土地，包括几乎所有官田和地主私田都一律說成"庄园制"的。汪籛副教授基本上同意上面說法，他認为編者沒有充分認識中国社会，特别在土地占有关系方面的复杂性及其特点，区别各种类型的土地所有制，从它們的發生、發展和衰落过程中去認識各个时期历史發展总的趋势。例如在唐宋时期，不仅有庄园，而且还存在屬于地主所有的比較細碎庄田和自耕农民的田地，在地主和农民之間存在着租佃关系，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或强或弱。同时，編者在叙述自己所提出的庄园制时，对于当时庄园制究竟处在發展狀态，还是稳定狀态，或是走向衰落狀态，当时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在逐漸增强中，还是基本上稳定或是在开始松弛，这一类問題也考虑得比較少。从唐代的詔令可以看出編者是把一些官府的产業当作一个大庄园的內容来描写，甚至还作出"大多数庄园"都是如此的結論。此外如劍南东、西川是中唐以来的"宰相迴环之地"而書中引用严礪侵占百姓庄田的事例来說明庄园地主和封建割据的关系，也显然是不恰当的。

資本主义萌芽問題　資本主义萌芽問題，在这本書里占有相当多的篇幅。因为这个問題目前尙在爭論之中，討論会無法对編者的看法和分析作出确定的估价，只是就書中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問題提出一些疑問和意見。翦伯贊教授的意見是：書中認为宋代已为資本主义萌芽的發展准备了条件，到明代資本主义因素不断增長起来，当它無法解釋資本主义萌芽从宋到鴉片战爭以前这样長期而緩慢發展的原因时，就强調外因作用，認为"在元蒙統治时期，中国社会經济遭受严重破坏"（第266頁），清王朝"阻滯了中国民族資本主义生产的發展，延續了中国垂死的封建社会"（第388頁），簡單地用外力的破坏代替对封建社会內部發展的分析，这种做法不能說沒有問題的。同时事实也已經告訴我們，清初在恢复与發展社会經济方面是起了积極作用的，沒有也不可能完全"阻滯"中国社会的發展。聶崇岐教授認为編者为替南宋时資本主义因素創設条件，將临安城市人口夸張为一百万，实际上这一个数字是临安全府人口的总数，并非临安城中的人口数字。袁良义同志也認为書中有点高估明代資本主义的因素和过分夸大清軍入关时的破坏作用，对于清初社会經济的發展沒有作出适当的估計。目前有許多論文已得出比較正确的結論，清初虽然有一些破坏，但康熙以后，不論在农業生产，

还是手工業、商業方面都比明代有显著的进步，应該說，清初資本主义因素要比明代显明得多。其次，他还認为在編者述說中国封建制度解体和資本主义萌芽的过程时，比較忽視对这些問題的分析，如封建依附关系的逐漸消除，土地制度和地租形态的变化以及阶級关系的变动等等。書中曾强調明代生产力的發展，說："(明代)在兩宋及前代丰富的經驗与創造的基础上大有發展，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显著提高"，"明代农業生产眞正达到'深耕細作'的水平"（第326頁），而他的看法是：明代和宋元时代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的变化是并不很大的，直到清初，一般农夫所用的主要农具如犁、耙、鑱　鋤等不仅和宋元差别甚微，恐怕和唐代以前也不会有很多的区别。在手工業方面，明代紡織用的腰机、花机等在元代王禎"农書"中早記載过，虽然明代有一些改进，种类也加多了一点，但很难說有显著的提高。明代农業生产应該比以前有發展，但是否"眞正达到'深耕細作'的水平"还是有問題，至少要确定一定地区，不能泛泛言之。据記載明代中原一帶很多地方都是淺耕、南方如今天皖南、江西等不少州县还用刀种火耕，甚至东南最繁盛的地区松江府，也有一部分貧民是用刀种的，这种情况到清初还部分地保留下来。許大龄同志指出，編者似乎有意在夸大明代商品經济的發展和資本主义因素增長程度，例如書中所說明代南京和景德鎮的人口数字显然不确实，又例如書中不分别官工業和民营工業的性質，把遵化的官营冶鉄手工工場混在資本主义工場手工業一处講，根据当时記載中苏州"机戶出資，机工出力"这一句話，就認为所有机戶都是資本家，根据"醒世恒言"和"松窗夢語"中的一兩个例子，就認为"从小作坊發展的手工業工場，已經不是偶然的个别的現象"（第322頁），根据一篇記盛澤鎮的小說，在这里面并沒有任何有关手工業工場和場主控制小生产者并以小生产者为其場外部分的記載，就說："在这个絲織業中心，不仅手工業工場林立，而且还組織着'远近村坊'的农村家庭手工業"（第322頁），根据小說中記載雇工数百的情况，就認为"这里，农場主对农民的榨取已与封建地租不同，而是从农業工人劳动中榨取其剩余价值　（第330頁），而沒有仔細研究这些雇工人的身分。書中有一段話是描写农業中資本主义萌芽的成長的："明代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产棉区和棉織業中心的分工，手工業原料需要的增多，賦役和其他税收的改征銀幣，农業中大批雇工的出現，都說明了明代农業上資本主义因素在显著增長。广大的农村和农民被日益卷入到交換經济中去"（第327頁），这里不仅沒有对农村中資本主义因素本身提供任何具体內容，而且把商品經济的概念和資本主义因素的概念混淆在一起。周良霄和顧文璧兩同志認为書中一面过低估計元清兩代，一面就主观地加速明代社会生产的發展。对于清初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經济設施和賦税制度，如地丁合一制度等在書中沒有加以很好的說明。

对历史人物的評价和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問題　在討論各段历史时，大家还提出書中对历史人物的評价問題和在处理汉族和其他民族关系上存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問題。有些同志認为書中在評价某些历史人物时，多少脫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善于正确处理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張政烺教授等指出，書中抹煞了秦始皇在完成和巩固統一国家过程中所起的进步作用，把他的政治措施归納为"野蛮統治政策"的四大罪狀，而廢封建，置郡县，中央的宫府分治，竟成了第一条野蛮罪狀。徙六国貴族豪富被列为第二条野蛮罪狀。（第27—28頁）这样編者就不能回答这样一个具有鮮明立場的問題：究竟是統一国家对人民、对發展社会生产好呢？还是旧貴族的分裂割据好呢？商鴻逵副教授則認为書中在明帝国建立后沒有正确处理朱元璋、一般地主士大夫和农民之間关系，朱元璋虽然对农民作过很多讓步，但他畢竟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級的代表　是为巩固封建政权这一目的出發的，書中过分强調朱元璋对农民的同情和"爱护之情"（第294頁），好像朱元璋做皇帝后还代表农民利益似地，就很不恰当。書中以張昶和胡惟庸二人为例，說旧地主士大夫对朱元璋政权"怀有阶級仇視的敌意"（第297頁），也显然有些問題，因为朱元璋和張昶、胡惟庸的斗爭只能說是統治阶級內部的矛盾，不能認为他們对朱元璋"怀有阶級仇視"。袁良义同志認为書中把朱元璋的个人作用（主要表現在他推行的政策上）当作明初社会經济發展的主要原因，根本漠視了广大人民群众自元朝中叶到明初时期所进行的生产斗爭和元末农民战爭在改进生产关系上的决定作用。

使到会同志一致感到最有問題的还是書中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残余。書中單純强調汉族在历史上的貢献和成就，忽視了少数民族在建設古代中国文化上也有許多不可抹煞的功績，以致在書中能看到的只是少数民族的落后、野蛮、破坏、掠夺等等。翦

著中
义概
顧面
些一

問
史存
書社
关完
的而
条罪
个对
？确
元建
發之
农二
級因
級仇
用济
朝爭

大
的化
的翦

伯贊教授認为書中完全否定元、清兩代的历史地位，是最突出的例子．特别是对待清朝，編者只願写坏的东西，不願写好的东西。并且还在“滿清”之外制造了“元蒙”这一个很特别的名詞。向达教授指出，这本書在說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方面，在說明各个民族的历史發展及其在整个多民族国家历史建成的貢献方面，都是很不够的；而汉族中心的思想特别濃厚，例如，書中第109頁提到酈道元的“水經注”时，大汉族主义的情緒不知不覚地在文字上流露出来了。邓广銘教授举辽、金史为例，兩者各有專史，并且前人有不少研究成果，它們統治北中国的一部或全部土地达二百多年和一百多年之久，不能說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發展沒有相当影响，而書中显然沒有用足够篇幅来叙述这兩个王朝的活动，如果有，也只是一些屠杀汉人，掠夺汉人財富的記載。元朝、清朝統治整个中国，影响自然更大，但書中也基本上粗暴地采用描写契丹和女眞的办法来对付蒙古族和滿族（女眞族），把它們都說成横暴野蛮，只会破坏而無建設的民族，这样就很难使人相信这是一本包括各民族历史的中国通史。許大龄同志表示不同意編者全面否定元朝的作用，認为在蒙古統治的一百多年中，仍然有一些有利于生产的积極措施，如忽必烈的奬励农桑和兴修水利，这些成績在“农桑輯要”和“农書”中都可以看出。書中过分夸張蒙古統治者的破坏和掠夺，說当时“北中国的农民大半淪为驅丁或奴隶（小部分是自耕农和佃戶）”（第269頁），这是沒有充分根据的，蒙古初期掠夺和破坏較大，而当时情况据“元文类”五十七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寫道：“（窩濶台时）河南初破，被俘虜者不可胜計，及聞大軍北还，逃出者十八九”。又說：“时諸王大臣及諸將校所得驅口往往寄留諸郡，几居天下之半，公用奏括戶口，皆籍为編民”。很明显的指出当时的奴隶是随时在逃亡的，并且在元人文集中記載逃亡或被解放的奴隶也非常多，特别是在忽必烈以后，政策有了改变，俘虜奴隶的事也日漸减少，因此也就不能說当时北中国的农民大半淪为驅丁和奴隶。書中又提到在元朝，江南的地主仿效了蒙古統治者剝削和压迫驅丁的落后形式以剝削佃戶，認为“在元代表面上的租佃关系，仍掩盖不住初期封建主义农奴制的倒退实質”（第270頁），編者根据“元典章”五十九“刑部”各条中有关“佃戶有可被典卖，佃戶生男供地主奴役，生女便为婢妾”等資料来論証这一問題，实則佃戶的兒女被地主奴役的現象在宋代就已存在，見“宋史食貨志”上，至于典卖佃戶之事，“元典章”中明显指出“前項事理，即系亡宋事理，至今未能改革”，編者把这些現象都归之于蒙古統治者所造成，当作一項罪狀，显然是与事实不符合的。周良霄同志認为書中只强調元代的“种族压迫”、“經济的破坏”和“屠城”等等，不作任何肯定，这样不但不能全面估价元朝的历史地位，而且也不能正确解釋明初社会經济的繁荣和發展。袁良义同志的意見是：少数民族对中国社会的發展是起过一些消極作用的，但它們在历史上的积極作用，它們的貢献和成就应当得到肯定，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汉族文化从来就不能和許多少数民族文化截然划分开，只有从它們的互相吸收，互相融合之中才能眞正理解古代和近代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同时对历史上許多少数民族所起的作用还应該根据各个民族活动的具体情况加以闡述，某一个少数民族在某一个时期內可能主要是起消極作用，在另一个时期內主要則起积極作用。書中对清朝的否定显然过分一些．今天我們应該基本上肯定清朝在乾隆以前一段时期的活动。因为清廷在这段时期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产生的惡果，比起它完成統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功績，畢竟是次要的，不然我們就会由反对清朝民族压迫得出反对清軍在入关前后統一东北、內蒙、中国內部汉族地区，新疆、青海、西藏等，正式确定近代中国疆域的結論。清軍入关时的破坏（書中利用一些不很确实的資料夸大了破坏程度），比起康熙以后清朝在經济上和政治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显然是次要的，不然我們就会由过分强調清初的破坏以致根本否定了或掩盖了清初社会經济的發展情况。自然清初社会經济的發展不应該完全归功于清廷在經济上、政治上所实行的种种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政策和措施，主要还应归功于广大人民在生产斗爭和阶級斗爭上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上面是到会同志發言的簡單情况，这些意見只代表他們对書中一些問題的看法，提供尙鉞同志修改这本書时参考，并不能当作对这本書的全面估价，至于这些意見是否正确，还望尙鉞同志和讀者們多多指教。（袁良义）

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四季初、重版書籍

中国过渡时期資产阶級与工人阶級
矛盾性質問題討論專輯
賀善徽 馮 定 关 鋒等著 0.95元（京）

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論与中国人口
問題 王亞南著
道林紙本0.60元 报紙本0.42元（京）

奴隶制时代 郭沫若著 0.84元（京）

十批判書 郭沫若著 1.88元（京）

汉文文言修辞学 楊树达編著 1.10元（滬）

汉語語法論文集 吕叔湘著 1.60元（滬）

切韵音系 李 榮著
道林紙本3.10元 报紙本1.40元（京）

方言校箋及通檢
周祖謨校 吳曉鈴編
报紙本3.50元（滬）

阿細民歌及其語言 袁家驊著 1.80元（京）

殷虛卜辞綜述 陈夢家著
报紙精裝本6.10元

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
丁山遺著 报紙本1.20元（滬）

苏維埃民族学的發展
C.Л.托尔斯托夫等著
历史研究編輯部編譯 0.55元（京）

封建农奴制时期俄国的商人資本
B.H.雅可夫柴夫斯基著
数文初譯 0.95元（京）

埃及古代史 A.費克里著
高望之等譯 1.90元（滬）

关于考古和第四紀地質工作上一些
新方法 裴文中編著 0.36元（滬）

汜胜之書今釋（初稿） 石声汉著
精裝道林紙本1.40元 报紙本0.36元（京）

华北經济植物志要
崔友文編著 3.40元（滬）

华南經济禾草植物
賈良智著 0.95元（滬）

棉花黃萎病 尹莘耘著 0.80元（滬）

关于荔枝龙眼的研究 李来荣等著
道林紙本0.90元 报紙本0.65元（京）

东北中部果树資源的調查
顧 模著
道林紙本0.65元 报紙本0.46元（京）

西北的果树 孙云蔚著 1.00元（京）

南方的果树土山 李来荣等著 0.95元（滬）

南京民間藥草 周太炎等著
报紙本0.85元（滬）

糖甜菜 董一忱著 0.48元（京）

家禽 赵希斌編著
道林精裝本2.40元 报紙平裝本1.30元（京）

祖国优良家畜品种 第1集
湯逸人等著 1.30元（滬）

三河馬調查报告 0.75元（滬）

新 华 書 店 發 行

本刊每月三日出版 零售每册三角五分